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国际金融论坛 2019 中国报告

深度解读中国金融改革
战略与思路



- ◆ 新全球化：未来之路
- ◆ 重塑国际贸易与货币体系
- ◆ “一带一路”倡议
- ◆ 深化金融改革、发展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
- ◆ 大湾区发展

联合出版方

**CENTRAL
BANKING**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16届全球年会 (F20峰会)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19 ANNUAL MEETING
(F20 SUMMIT)

中国 · 广州
2019.11.22-24

中美关系： 全球经济繁荣的关键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本期《中国报告》的发布，正值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间贸易和投资关系进入一个重要关头，尤其是中美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曾齐心协力，一度诞生了积极主动的 20 国集团和默契配合的政策行动，现在这些都正在渐渐消退。全球增长放缓，不平等程度加剧，特别是在各国内部，民族主义抬头，内向型政策倾向日益滋生、发展。

美国，作为传统的全球规则制定者，认为现有的贸易关系不公平，采取了一系列重建措施。中美贸易摩擦，具体表现为美国在 2018 年 9 月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征收 2000 亿美元关税，如同阴云一般笼罩着全球经济。

两国许多官员都认为，在美国下一次提高关税之前，两国有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尤其是美国推迟了原定于今年 3 月 1 日的关税升级最后期限。然而，潜在的障碍仍然存在，包括美国是否准备降低现有关税，以及中国能否真正开放市场，尤其是在技术领域，以及部分金融服务领域依然存在一些难题。

贸易协议或许能重置最近的中美关系，提振人们对全球经济的信心；然而，即使达成协议，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有可能在未来再次爆发，因为双方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国家补贴和国家安全等领域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和平而富有成效的方式解决争端是向前迈进的关键。为此，多边机制必须要有新的面貌。

IFF《中国报告》就部分全球关切问题，集聚了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见解和观点。《报告》分为五个部分：新全球化：未来之路；重塑国际贸易货币体系；“一带一路”倡议；深化金融改革、发展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今年的《中国报告》还发布了对各国中央银行的第二次“一带一路”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8 家受访的中央银行对过去几年里出现的一些有关“一带一路”的言论，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受访者一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全球化的重要举措，并表示他们所在的国家内，“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没有受到“政治”和“财政”压力。

事物的发展处于变化之中。今年 3 月，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签署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旨在提高意大利的参与度，成为首个正式签署“一带一路”的 G7 国家。美国对此持负面态度，或成为导致未来紧张局势的一个原因。

最后，我们再次对全球领导人、政策制定者、金融专家、商界领袖、政治家和学者对《IFF 中国报告》的完成所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相信该报告一定会为各位读者提供重要的见解及全新的视角。



张继中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首席执行官兼秘书长



Christopher Jeffery
《中央银行》杂志总编



周小川
IFF 主席
中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陆克文
IFF 联合主席
澳大利亚前总理



范龙佩
IFF 联合主席
欧洲理事会前主席
比利时前首相



巴罗佐
IFF 联合主席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
葡萄牙前总理



韩升洙
IFF 联合主席
韩国前总理
前联合国大会主席



肖卡特·阿齐兹
IFF 联合主席
巴基斯坦前总理



黎晓宏
IFF 副主席
中国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



朱光耀
IFF 副主席
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原副主任



辜胜阻
IFF 理事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民建中央副主席



姜洋
IFF 副主席
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中国证券博物馆筹建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



陈文辉
IFF 副主席
全国社保基金副理事长
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



周汉民
IFF 副主席
中国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祝 宪
IFF 副主席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兼首席
道德官



梁锦松
IFF 副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原
司长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IFF 副主席
欧洲 50 集团主席
法国前财长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IFF 副主席
意大利前财长
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



苏瓦迪
IFF 副主席
阿联酋中央银行前行长



詹妮·希普莉
IFF 理事
新西兰前总理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Edmond Alphandéry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
欧洲 50 国集团主席
法国前财政部长



苏丹·本·纳赛尔·阿尔·苏瓦迪
Sultan Bin Nasser Al Suwaidi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
阿联酋中央银行前行长



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Gloria Macapagal Arroyo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理事
菲律宾众议院众议长、前总统



陆磊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罗扬
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



马儒沛
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肖卡特·阿齐兹
Shaukat Aziz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
巴基斯坦前总理



迪帕克·班贾德
Dipak Banjade
尼泊尔驻广州代总领事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
葡萄牙前总理



沙基卢登·阿德瓦勒·欧洛卡
Shikirudeen Adewale Oloko
尼日利亚驻广州总领事



邱亿通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哈利·赛亚丁
Harley Seyedin
乔治·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
主席特别顾问



蔡朝林
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



哈维尔·古兹曼·卡拉费尔
Javier Guzman Calafell
墨西哥银行副行长



南安可
Nadav Cohen
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



孙时联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



马克萨特·伊申别科维奇·坚季米舍夫
Maksat Ishenbekovich Tentimishov
吉尔吉斯斯坦原驻广州总领事



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马西莫·达莱马
Massimo D'Alema
意大利前总理



戴璞
Denis Depoux
罗兰贝格亚洲区联席主席



韩升洙
Han Seung-soo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
韩国前总理
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亚当·尤素福
Adam Yousof
苏丹驻广州总领事



郑之杰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周诚君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尼古拉斯·霍普
Nicolas Hope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
斯坦福大学原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世界银行原中国项目负责人



姜洋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
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中国证券博物馆筹建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



阿什法克·哈桑·汗
Ashfaq Hasan Khan
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
巴基斯坦前财长



朱光耀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
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原副主任



祝宪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兼首席道德官



李铁石
Ri Chol Sok
朝鲜对外经济部经济开发指导局
局长、朝鲜经济开发协会会长



梁锦松
Antony Leung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财长



李东荣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金铁龙
Kim Chol Ryong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18 号室副室长



徐正灿
So Jong Chan
朝鲜对外经济部条约法规局局长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主编
Christopher Jeffery
chris.jeffery@centralbanking.com

副主编
Rachael King

责任编辑
Stuart Willes

副编辑
James Hundleby
Alex Hurrell

《中央银行》主席
Robert Pringle

《中央银行》出版人
Nick Carver

商务经理
John Cook

集团出版总监
Lee Hartt

英孚数码公司总经理
David Pagliaro

发行及印刷
Oliver Auckland
Ben Cornish

《中央银行》杂志
28-29 Haymarket House Haymarket
伦敦, SW1Y 4RX
英国

IFF 主席
周小川

IFF 联合主席
赫尔曼·范龙佩 (Herman Van Rompuy)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韩升洙 (Han Seung-soo)
肖卡特·阿齐兹 (Shaukat Aziz)
陆克文 (Kevin Rudd)

IFF 副主席
黎晓宏
朱光耀
姜洋
陈文辉
周汉民
祝宪
梁锦松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Edmond Alphandéry)
多梅尼克·西尼斯卡尔科 (Domenico Siniscalco)
苏丹·本·纳赛尔·阿尔·苏瓦迪 (Sultan Bin Nasser Al Suwaidi)

IFF 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张继中

IFF 研究院执行院长
陈炳才

IFF 研究院副院长
王燕

IFF 投稿编辑
张继中
庄珏
陈炳才
周诚君
夏乐
陈兴动
孙铁颀

其他亦有贡献:
唐嫣, 刘丝雨, 刘江, 申永冬, 黄露, 符亚因,
郑静杏, 刘小敏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北京总部紫云台书院
海淀区
北京 100095
中国

新全球化：未来之路

文章

 新型的全球化将从东方再次崛起 8-9
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Gloria Macapagal Arroyo)

新时代、新秩序、新未来 10-11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新型多边主义的必要性 12-14
韩升洙 (Han Seung-soo)

重塑全球经济需要更大格局的解决方案 15-17
肖卡特·阿齐兹 (Shaukat Aziz)

朝着开放全速前进 18-19
郑之杰

重塑国际贸易与货币体系

文章

 坚持规则导向 改革全球经济治理 22-23
祝宪

中欧合作是坦诚相对的友谊 24-26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风暴之后的全球金融 27
李扬

香港应发挥核心作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28-29
周诚君

中国的明智之选仍是积极支持全球经济一体化 30-32
尼古拉斯·霍普 (Nicolas Hope)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对面临的动荡考验 33-37
哈维尔·古兹曼·卡拉费尔 (Javier Guzman Calafell)

贸易争端应通过公平的机制来解决问题 38-39
哈利·赛亚丁 (Harley Seyedin)

一带一路倡议 2019 “一带一路”调查报告

文章

 2019 “一带一路”调查报告 42-51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为全球化的新动能
张继中、Christopher Jeffery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 52-53
孙时联、熊柴

沿着“一带一路”追随先人的步伐 54-55
马西莫·达莱马 (Massimo D'Alema)

“一带一路”下的期货市场 56-57
姜洋

中国倡议的新型全球化 58-59
马儒沛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金融合作 60-61
罗扬

中巴经济走廊不止是双边协议 62-63
阿什法克·哈桑·汗 (Ashfaq Hasan Khan)

团结合作 共同发展 64-67
苏丹·本·纳赛尔·阿尔·苏瓦迪 (Sultan Bin Nasser Al Suwaidi)
沙基卢登·阿德瓦勒·欧洛卡 (Shakirudeen Adewale Oloko)
亚当·尤素福 (Adam Yousof)
马克萨特·伊申别科维奇·坚季米舍夫 (Maksat Ishenbekovich Tentimishov)
迪帕克·班贾德 (Dipak Banjade)
南安可 (Nadav Cohen)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与英孚数码公司 (Infopro Digital) 联合出版, 《IFF 中国报告 2019》中文版权归国际金融论坛 (IFF) 持有。

除重要文章或评论的简短引用外, 此刊物任何内容未经国际金融论坛 (IFF) 或《中央银行》出版有限公司书面允许, 不得转载发表, 转换成其他格式, 或通过任何方式印刷或收入检索数据库系统。违反者须被追究并承担法律责任。



深化金融改革、 发展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

文章

 进一步融入世界：中国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孙时联、熊柴	70-72
走向繁荣——历史从 1978 年转身 朱光耀	73-74
中国应建立并开放大宗商品期货市场 姜洋	75-77
全球视野下金融科技的影响 李东荣	78-79
改革开放再出发 祝宪	80-81
金融科技：第一次金融革命 韩升洙 (Han Seung-soo)	82-83
碳定价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Edmond Alphandéry)	84-85
金融机构的改革是进行时 陆磊	86-87
中朝经济合作：朝鲜经济开发区的发展现状 与中国经验的启示 李铁石 (Ri Chol Sok) 金铁龙 (Kim Chol Ryong) 徐正灿 (So Jong Chan)	88-90

大湾区发展

文章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的三方面思考 蔡朝林	92-93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应在人才、金融、科技三方面 做重点工作 梁锦松	94-95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金融工作 邱亿通	97
不断发展的中国城市群 邢自强	98-99
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戴璞 (Denis Depoux)	100
走向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海拥抱世界 孙时联、熊柴	101-102

新全球化：未来之路

新型的全球化 将从东方再次崛起

国际金融论坛（IFF）理事、菲律宾众议院众议长、前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认为，古代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全球化的雏形，现在中国也将成为新秩序的开创者和领导者。

英国历史学家霍普金斯认为，全球化的历史可追溯到2000年前汉朝的丝绸之路。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的第一个分水岭事件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该会议试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计全球金融秩序。这场战争见证了西方内部的政治分化，其中一些大国如英国和美国推崇自由政治哲学和自由贸易经济体系，而另一些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则倾向于右翼政治哲学和中央集权式的经济体系。

随后，美国从战争中崛起，成为西方的主导力量，因此其经济理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的精神体现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以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中。

接下来是冷战时期，西方受到了一个来自东方的全新挑战，崛起的东方不再是西方的殖民地，其政治和经济思想与西方有着显著的区别。“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在1961年的词典中，虽然在之后的30年内鲜有提及。

1978年，中国启动了大胆且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改革开放政策。1984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他简洁明了地说道：“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

后殖民时代全球化的另一个分水岭事件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自此之后，西方体系，尤其是商业和经济体系，在全世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柏林墙倒塌后不到十年，西方的全球化概念就达到了鼎盛时期，世界贸易组织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组织的成立将这一概念推向了高潮。

无论是政府、多边机构、学术界还是商界，作为参与者，都亲身经历了全球化的全盛时期，每个人都有权描述所经历和感受到的全球化。

全球化在菲律宾的全盛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降低关税的幅度甚至超过了在《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下的承诺。但是当我在2001年担任总统时，1997年的亚洲危机和2001年的911袭击削弱了菲律宾的财政、外交和贸易实力。因此，国内必须采取行动来刺激经济发展，需要减少关税，释放积极信号，鼓励制造业发展。因此，我采取的政策是将贸易自由化计划的速度放慢到东盟自贸区的最低水平，并充分利用所有能够利用的豁免机会，比如建造石脑油裂解炉。

我赞成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处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同一阶段，因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的经验表明，中国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脱离世界其他地区独立发展。”



的理想有时不得不要受到个别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现实的制约。每个国家都必须自己判断如何应对全球化，以及以何种速度应对全球化。菲律宾就是通过不断的调整，在坚持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寻找惠及中小企业的道路。

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前景

展望未来，两个发展趋势让我很感兴趣。从1978年至2018年，40年的光阴见证了中国从首次开放到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成就。我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访问过中国，因此见证了这一惊人的发展历史。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如果说各国最佳发展道路就是一味照搬西方治理模式和全球化经济模式，那么如何看待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

我认为中国惊人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邓小平在界定这一概念时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经验表明，中国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脱离世界其他地区独立发展。”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改革开放。现在，正如霍普金斯强调的那样，东西方皆为全球化的发源地，21世纪的全球化经济学不再仅仅是西方模式。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出现了反全球化或反开放边境情绪，主要源于美国和欧洲一些地区的旧式民族主义。这究竟是一个过渡阶段，还是历史将会摆向另一个方向？美国以前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但反全球化问题出现的原因与其国内保护主义的兴起有关，许多悲观主义者都在探讨经济全球化是否将要落幕。

但习近平主席重申，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美国的保



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

护主义反而让中国相信，必须加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建设，该伙伴关系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

新全球化：未来之路

更为乐观的分析人士指出，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将由东方和西方共同推动。鉴于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从最初的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全球化的历史将会全面展开，一些专家称“一带一路”为“全球化2.0”。

美国大学著名的国际关系教授阿米塔瓦·阿查里亚教授曾说过，“全球化2.0”一词涵盖投资、基础设施和发展等方面，而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贸易范畴。我对贸易和投资的看法与此一致。用现在流行的计算机术语来打比方，RCEP等区域协议下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只是振兴世界贸易和投资框架下的软件。如果国际贸易和投资缺乏硬件的支持，那么经济也无法繁荣，而“一带一路”提供的基础设施就是这样的硬件。

麦肯锡全球咨询公司有一个观点，与其说全球化正在后退，倒不如说它正在转为数字化。在这个新的全球化时代，腾讯和阿里巴巴跻身于世界十大最有价值的公司之列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孕育科技公司的肥沃土壤。

中国向世界表明，将战略眼光、政治意愿与开放和负责的对外关系相结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是可能的。习近平主席的态度是，中国不仅会成为完全现代化的经济体，它将同时努力与邻国建立增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这种开明的态度为新全球化的未来道路奠定了基础。●

新时代、新秩序、新未来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及前外长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认为，国际社会要作出选择，是构建一个以规则为基准的多边、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还是陷入民粹主义和乱战之中。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虽然全球化不是全新的概念，但是新一轮全球化的规模之广、强度之大、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诠释经济全球化的绝佳案例。曾经，全球化只是像工业革命一样将世界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全球融合的速度远远高于以前。

2007年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余威未消，雷曼兄弟的破产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却不是导致危机爆发的唯一原因。金融危机也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称之为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意识到必须从机制建设的角度应对全球化。于是，20国集团（G20）应运而生。

G20峰会自1999年开始，最初只是各国财长之间的交流，国家的政府首脑并没有过多的参与。之后，我作为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联合了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诚邀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华盛顿举办第一届G20峰会。自那以后，G20峰会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并奠定了全球最高级别经济论坛的地位。G20峰会逐渐取代了八国集团（G8）协调全球统一行动，因为G8不足以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原因在于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如中国并不在其中。

在2014年离开欧盟委员会之前，我有幸参加了此前每一届G20峰会。G20峰会的召开意义重大，避免各国再次回到20世纪40年代全面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时期。金融危机期间，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重，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全面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马上全面抬头，形成严峻的形势。

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应该归功于G20峰会在协调领导人统一行动时所发挥的作用。G20使金融系统更加稳定，并在2009年为此设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这样的制度设计旨在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球化的框架。

全球合作的黄金时期

G20峰会提供了一个协调合作的时机与平台，第一次让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政府首脑可以不受拘束的坐下来畅所欲言，

而不是朗读已经准备好的演讲稿。议题包括如何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以及采取何种行动以保护经济增长。欧洲当时深刻的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甚至一度对欧元区的未来表示怀疑。所幸G20带领大家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欧洲与欧盟普遍认为中国在维护欧盟及欧元区金融稳定性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G20当时与中国政府，包括与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最高级别的对话，并坚信中国会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努力。

现在的G20峰会依然传承了当时的精神吗？很可惜，现在的峰会的精神与往日大相径庭。在欧洲，甚至全世界民粹主义卷土重来——有时又将其称作“民族主义”，因为它总是强调自己民族优先，可是我们忘记了如今是一个全球互联互通的世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及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又在我们眼前发生，应对这些危机的化解之道在于开创性的想法和长远的打算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创性的想法必须建立在多边治理的基础之上，各国应当团结在一起，维护多边治理的机制，反对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

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之前，多哈回合谈判就以失败告终。当时由于一些成员尚未做好准备，国际社会并未接受全球贸易协定。而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达成双边协议，有时甚至双边贸易协定都无法继续。

所以需要有一个多边的平台来建立稳定的多边秩序，这也意味着秩序必须建立在一套公认的、能够遵守并执行的规则之上。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现状感到担忧，因WTO正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下，我们对它的实践机构缺乏必要的支持，这将无助于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纠纷冲突。

不仅需要加强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机制，也需要敦促国家的治理机制的落实，因为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无视国内的治理体系——比如依法治国——只将治理体系的失灵原因归咎于没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而试图去解决全球治理机制问题是一种妄想。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在国际社会中，竞争是不可避免。问题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会在可预测并稳定的系统中进行吗？或者我们是否会在全球对抗的背景下看到国家彼此之间的倾轧？

所有坚持开放原则的人都应当争取一个建立在规则之上的稳定体制，一个使决策具有可预测性，能在稳定的框架中运行的体制。这也就是支持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其他多边机构和多边机制的重要原因。

其次，还应该努力增加互联互通，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不仅是运输和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其他领域也应不断加强世界联系。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

但当前国际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处于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因为过去的机制已经失灵了，但是新的框架、新的秩序还没到来。所以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而通常过渡本身都会带来质疑、焦虑和不确定性。

现在的国际秩序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这种不确定性并非源于预期，而是由于缺乏规则引起的。现在全球增长的最大风险可能就是缺乏可预测的规则和稳定的系统。而目前，焦虑和不确定性已经引起了商界和投资者的怀疑，这样悲观情绪的蔓延也会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

最后，必须决定是否想要生活在一个遵循规则的世界中。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一个更广泛的文化问题——

是会支持开放还是站在开放的对立面？无论我自身，还是欧盟都坚持开放的态度。

进入中国

在未来的秩序当中，中国要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当然中国的角色是由中国自己决定的。现在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我认为中国的结构性增长前景取决于是否能够落实市场化改革。中国对改革所作出的承诺推动了其经济的长期增长，而中国的增长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而言都相当重要。所以从欧洲的角度，或者从个人的角度，我呼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包括对外企开放，尤其是金融行业对境外的企业能够进一步开放，这将有助于创造和改善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推动发展、营商以及稳定的全球秩序。

所以尽管现在看来全球化正在经历一些波折，一方面，商品、服务贸易的流动，以及跨国旅游、通讯、人际交往、文化、科技交流持续进行；另一方面，摩擦与阻力依旧存在。应该坦率地直面这些问题，并坚信两者相较之下，未来更强的趋势是一个更加全球化，更互联互通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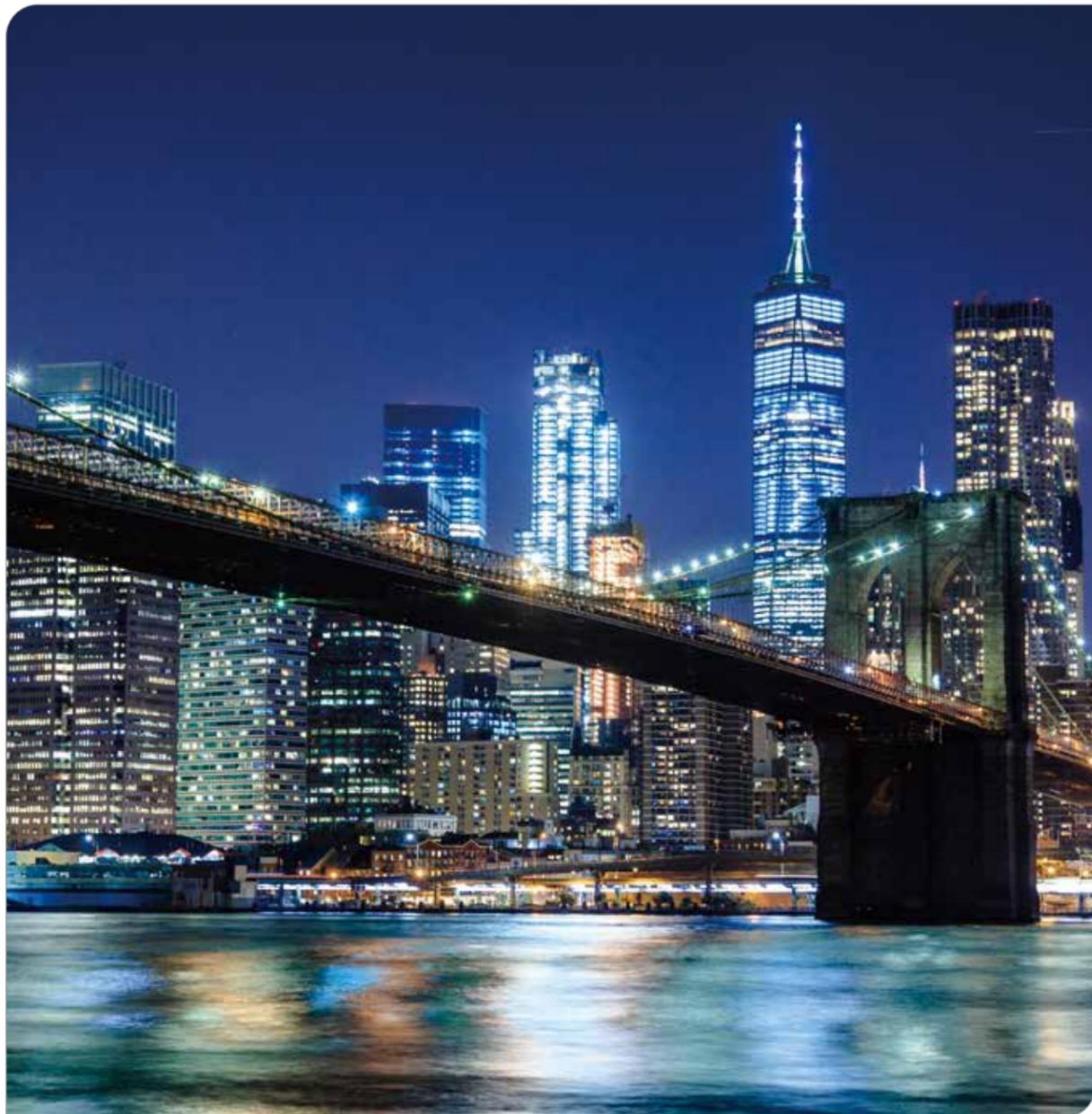
不能用“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方式，割裂地看待这些问题，要知道唇亡齿寒，同舟共济的道理。

从气候变化到金融不稳定性，到贸易摩擦、国际恐怖主义和流行病，这些重要的问题也和全球化密不可分，这要求我们有超越国界的解决方案和机制。不能用“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方式，割裂地看待这些问题，要知道唇亡齿寒，同舟共济的道理。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采取全球化的解决方案来为贸易，投资和可持续增长创造必要的稳定性。当然，也不要忘记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更先进的主要经济体的支持才能得以发展，因为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不仅应该是和平的世界也应该是一个以正义为原则的世界。●

新型多边主义的必要性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 (Han Seung-soo) 认为，全球化让世界更富裕，联系更密切，同时也导致了不平等、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以及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抬头。



全球化的发展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在长时间的积累之中形成的。经过长年累月的发展，全球化于 19 世纪末成为国家关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使得国界对大多数经济、商业和文化活动变得无足轻重。

全球化的驱动力不仅源于运输和通信领域的快速技术变革，还有剧烈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

随着计划经济理论的消亡，自由市场原则和制度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贸易的平台。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市场经济原则意味着自由贸易和开放的资本市场。事实上，自由贸易和资本跨国流动的理念已经迅速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准则。

全球化的根源

苏联于大约 30 年前解体，与解体之前的时期相比，现行的国际秩序原则基本上独立于各国的意识形态，且有利于市场运作。如果我们向前回溯，会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秩序基本上也是非意识形态的，这很有启发性。当时所有的大国都是资本家，甚至俄罗斯帝国也在沿着资本主义路线迅速工业化；用一句老话来说，当时的全球体系“日益相互依存”。

数字革命及其在世界大国的迅速传播，不仅有助于创造网络空间，也有助于将世界缩小为鸡犬相闻的地球村。

根据关贸总协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指导精神，多轮多边贸易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也推动了世贸组织的成立，有助于推进全球化进程。与以前的其他贸易谈判相比，乌拉圭回合对全球化进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多边贸易谈判仅仅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游戏。

乌拉圭回合谈判迫使发展中国家改善其与贸易相关的机构和政策。虽然发展中国家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终结果感到失望，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各国进一步降低了制成品关税，对知识产权的监管变得更加严格，以换取废除纺织品和服装配额这一规定，而发达国家则进一步规范了农业部门和其他方面的补贴政策。

与此相关的是，除了世贸组织和早先的关贸总协定之外，世界舞台上涌现了一大批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



韩升洙 (Han Seung-soo)

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联合国扩大了其职能范围，不再只关注有利于战争与和平的经济因素。几乎所有这些机构都是二战结束后成立的。他们制定了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作为谈判和合作的平台，采取行动尽量减少经济竞争失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欧洲开始推行经济一体化，这是加速全球化进程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欧盟及其前身对世界各地的区域一体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1956 年签订《罗马条约》后，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经历了关税同盟阶段、经济同盟阶段，最后形成了现在的欧盟。1992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生效，标志着一体化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更多的领域，其中也包括政治和安全领域。随着 1999 年共同货币欧元的推出，欧洲一体化终于踏进了金融这一重要的领域。欧盟各种制度和政策的相继协调，使欧洲之间的边界渐渐变得无关紧要，促进了商品和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在欧洲内部的自由流动。

其它区域从欧洲的经验中认识到，一体化所能带来的不仅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有其他非经济方面的好处。于是，亚洲、南美、中美和北美以及非洲纷纷开始构建各自的区域一体化体系，这些体系的激增就加快了全球化进程。

为了仿效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亚洲国家成立了东盟，该组织一直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成员国在其他领域内的合作。此外，诸如 1991 年的南方共同市场和 1994 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全球化的典范。

在亚太地区，亚太经合组织是促进全球化的主要力量。1989年，作为韩国的贸易和工业部长，我同其他领导人一道发起了亚太经合组织。我们希望这个组织可以成为开放地区主义的一个示范。因此，亚太经合组织动员所有成员国积极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推动结果的达成。尽管最初它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论坛，但它一直在扩大其活动领域。

近年来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另一股力量，就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和电子通信技术的广泛使用帮助资本市场迅速实现全球化。数字革命及其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迅速传播，不仅有助于创造网络空间，也有助于将世界缩小为鸡犬相闻的地球村。智能手机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跨国联系的渠道，也是经济和社会文化迅速跨境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福兮？祸兮？

可惜，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在增进全人类福祉的同时，也对各国和每个公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虽然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但全球化红利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配不均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全球化进程中所裹挟的非经济因素也给全球化的有利方面蒙上了阴影。

全球化进程对当今各国之间的互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联合国议程的各方面产生了影响。全球化附带的负面影响对于老年人和儿童等少数群体影响最严重。联合国正在讨论的许多问题反映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和艾滋病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列在联合国议程上；国际恐怖主义也已成为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关键问题，需要通过更密切的国际合作来及时根除。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是全球化不良影响的典型案例。正如“911”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全球化使国际恐怖主义很容易钻我们综合系统的空子——恐怖组织的发展已经跨越了国界，国家层面的对策已经不再有效。现在，国际恐怖分子也很容易在失败国家找到避风港。除非采取全球级别的反恐措施，否则击败国际恐怖主义将极其困难。

全球化负面影响波及的另一个典型领域是信息技术。尽管科技进步加快了全球化进程，但IT技术的发展，也让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出现了深刻的分歧。在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各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区域差距，即所谓的数字鸿沟还在继续扩大。

实质上，全球化和效率是同义词。而全球化的最令人心的一点就是，全球化可能不会促进公平公正。在世界经济史的这一关键时刻，应该肯定近年来全球化的有益影响，但

同时，如果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解决不公平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到贫困国家和个体的主要关切。

不幸的是，近年来我们正在目睹全球化的瓦解。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正在形成，区域一体化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在主要国家，反全球化倾向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支持。例如，英国退出欧盟的决定正在动摇欧盟的基础。世贸组织多年来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很多自由贸易协定的雏形甚至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

这些反全球化进程持续的时间越长，它们对全球总体福利带来的伤害越多。因此，现在是时候让世界领导人重新凝聚智慧和勇气，扭转世界贸易持续几年的倒退趋势。如果呼吁采取行动，就肯定会造福于世界人民以及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

然而，全球化的倒退不仅仅发生在贸易领域。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清洁水资源、海洋退化、网络犯罪、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逃税等方面都受到了反全球化的影响。

所幸近几年来，为解决其中一些全球性问题，各国已经做出了多边努力。2015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一致通过新的全球议程，“改变我们的世界”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¹

成果文件表明，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不仅关乎可持续发展，也关乎自身生存。数十亿人还会继续生活在贫困之中；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正在加剧；巨大的机会差距、性别不平等、失业、全球健康威胁、更频繁和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断升级的冲突、暴力极端主义和人道主义危机，都有可能逆转近几十年来取得的大部分发展成果；自然资源枯竭、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等环境退化威胁、淡水稀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建立新型多边主义迫在眉睫。

此外，气候变化也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其不利影响，如全球温度和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天气模式的日益波动，正在威胁地球的生物生命支持系统。幸运的是，2015年12月，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在巴黎，在《气候公约》缔约方第21次会议上，通过了《巴黎气候协定》，该协定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2摄氏度以内。

新型多边主义需要全球领导人的密切合作。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推动世界在各个领域的互联互通，同时也会使各国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

1. 《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

重塑全球经济 需要更大格局的解决方案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Shaukat Aziz）认为，新的力量格局正在形成。目前缺乏强有力的全球领导力，我们每个人都都要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想在前做在前。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具有全球化性质，全球化对微观和宏观层面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全球化的连锁反应波及范围广泛而深远，市场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创造了许多新的机遇，使数百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全球化有助于构建地缘经济“新常态”，使我们对待国际事务的方式发生转变，也对地缘政治的总体情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和日益复杂的世界中。自冷战结束以来，看到了一种新的全球范式逐渐浮出水面。几十年来稳固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技术进步的到来，这种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地缘政治板块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正在向新的力量平衡转移。

几千年前，亚洲是文明的摇篮，通过丝绸之路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纵观历史，亚洲还将继续为人类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将在大约未来十年的时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也带动亚洲变成世界变化的中心。

除此之外，亚洲的人口结构、经济实力以及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地位意味着，它带来新的技术奇迹，并成为和平与繁荣的推动力。

更广泛的合作之路

无论是在政府供职还是从事其它工作，我的经验告诉我，多极世界比单极世界更好，新的世界强国会成为所有国家的力量源泉。然而，某些本应该看到此机遇的人，只看到了新的势力打破现状的风险。一些国家担忧，古老的理论“修昔底德陷阱”很可能在未来出现，即当新的大国崛起时，冲突的风险会增加。

也许这种说法在200年前是正确的，但从现在来看，并不尽然。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之间的互动带有全球化性质，意味着传统的边界意义在逐渐地消亡。特别是技术方面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得到世界另一端所寄来的东西。走向繁荣的道路不在于孤立，而在于拥



肖卡特·阿齐兹（Shaukat Azi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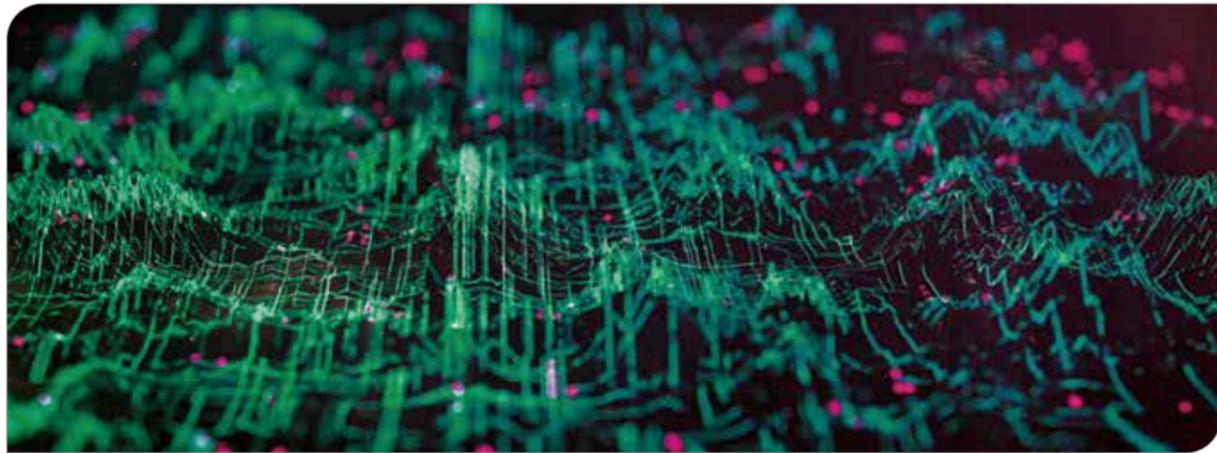
抱全球化的机遇。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竞争，提高生产力，激励创新，这些举措最终让我们走向共同富裕，而各国不断相互竞争，不断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旧模式，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相反，新时代的范式是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其中就包括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针对。这并不是政策上的空谈，这种想法已经在大多数主要国家获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

21世纪有可能会见证历史性的转变——那就是从战略竞争转向更大的全球合作。然而，要使大家自发拥护这一理念，就必须重新关注发展互联互通和相互依存。要达成这个目标，需要我们鼓励贸易投资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这样做有助于提升各国互信，如果在未来出现任何紧张局势时，信任就是无价之宝。

互联互通是和平的真正保障。必须记住，所有大国都应该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转变负责，而且必须要确保这是一个和平的转变。虽然国内的事务应当分轻重缓急来处理，但是永远要把和平放在首要位置。只有通过共同努力，而不是互相破坏，才能取得进步。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全球合作的新标杆，我希望世界各国都能效仿。巴基斯坦已经享受到“一带一路”的红利，其中包括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对巴基斯坦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真正改变了游戏规则，并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关系。

正如我任职期间所目睹的那样，中巴友谊最牢固、最持久。和平、和谐、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都是中巴友谊的保鲜剂。中巴外交关系的建立并不是为了对抗其他国家，中巴友谊是国家双边关系的典范。

创新不是破坏

今天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在一个全机械化的世界，就业的本质是什么？机器将会取代人工劳动吗？日益复杂的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如何融入我们的社会？

由所谓颠覆性技术推动的革命应被视为进步的机会，而不是威胁。技术进步可以使发展和社会流动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下是技术对社会带来的四个积极影响：

- 1) 技术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并改变了贸易的方式。
- 2) 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可以打破禁忌和文化障碍，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纠正偏见，赋予更多的机会来解决冲突。因为全球化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全球化的媒体意味着，虽然一些事情只在世界的某个遥远的角落发生，但仍然可以立即引起所有人的共鸣。
- 3) 可以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政府透明度，从而提高治理效率。
- 4) 技术的进步创造了更多的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手机不仅仅是通讯设备，还能教授人们知识，赋予工作，打理私人银行账户。它已经帮助改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并且未来也会继续如此。

人们已经列举了很多技术的破坏性以及它可能给现行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诚然，技术的进步会使一部分人失业，

所有政府都应该制定战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要想解决失业问题，应当把重点放在技术转变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上，而不是它对原有工作机会的破坏上。正在消失的工作是低技能工作，而技术让我们有机会打造更有趣、更需要专业性的职业。

技术革命必须与社会上每个人必要的技能培训相结合。我们的孩子需要学习创新的能力。虽然机器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它们仍然无法复制人类的思维，以及发明和创造的能力。大脑必须重新学习如何适应我们周围的变化，而保持积极心态来看待技术带来的机遇而不是问题，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颠覆性技术”就会成为世界未来增长的真正驱动力。新技术会使全球化变得更加民主。互联网创造的新机会和新的交易方式，使交易的门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低，更具包容性。任何人都可以在家用电脑开始创业，并经营管理。处理和交付货物的方式正在迅速发展，互联网已经夺走了大公司的权力，并将其交给了消费者和小企业。

激发亚洲潜能

谈到亚洲的未来，从人口数量而言，亚洲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世界上没有其它地区具有同等的潜力，亚洲的民众能够创造一个更有活力的地区。许多亚洲国家的年轻人口迅速增长，而且这些年轻人吃苦耐劳。这一现状对决策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为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民间社会结构必须跟上步伐，才能为整个区域蓬勃发展的青年提供服务。

在发展方面，亚洲有望进一步改善生活水平，提高平均工资，实行更公平的增长分配。生活质量提高会越来越地

惠及农村和偏远地区，所以领导人应该把重点放在实现可持续增长上。

只有通过持续的改革，才能保持领先。这是创造增长的吸收能力，确保所有国家未来繁荣的最佳方式。所有国家或组织都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并进行改革，技术变革和改革的关系也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正如需要适应贸易和商业的改变一样，现代社会中，价值观也需要调整。在培养青年价值观方面，政府和社会在现代社会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样的引领也有助于促进和平与包容。所有信仰必须学会如何共存，必须鼓励信仰宗教的人相互理解，促进信仰间的和谐。否则，偏见只会变得越来越多，局势也会越来越紧张；这样只会增加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威胁。今天我们共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移民。中东冲突的主要后果依旧是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和全球难民危机。

首先，这些问题必须以人道主义的方式解决。任何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如在周围筑起高墙，限制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和互动，并禁止来自其他国家或信仰的游客和移民，都会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所有国家也应该谨慎处理移民涌入。我们需要控制边境，尽量减少安全风险。如果温和派领导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国家的政权就会落入极右党派和极端主义团体的手中。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大国在这一问题上政治立场大相径庭，而且双方都很难做到和谐共处。匈牙利等国民族主义兴起，英国决定脱欧，经济增速持续缓慢——欧洲面临的挑战就是不断变大的不确定性。同样，只有建立联系，找到继续合作的理由，才能维护和平，避免政治分裂。

未来的解决方案

继续合作的理由显而易见，从长远来看，阻拦和限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需要重拾对话与交流，并加大力度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克什米尔和巴勒斯坦问题。还需要找到各方的利益共同点，例如全球气候变化、消除贫困以及维护人权。

如果各方携起手来，那么未来将会怎样？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

首先，必须重新重视教育。这是今天能够为年轻人和人类的未来做出的最大投资。显然，目前的大多数课程都没有为年轻人提供必要的谋生工具，让他们在未来的世界中前进。新经济中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和所需的新技能，将促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无论是国家、非政府组织还是企业，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作用。尽管所需的教育系统可能会和

现有体系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依然要开发新的教育体系，因为教育就是未来的保障。

此外，必须建立一个全球贸易与合作新机构，应当反映新经济的挑战和需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就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它已为“一带一路”领导下价值数十亿英镑的项目提供了便利。除了发展新的机构外，现有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指导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需要变革——不是游说其他的国家需要改革，而是审视自己对改进和重组的需求，与时俱进。

创造包容性及公平的增长至关重要，而新技术革命使之比以往更容易实现。如果处理得当，再加上审慎的政策和监管，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更公平、更和平的社会。

结构性经济改革与完善社会部门必须相结合，提高识字率，为所有公民提供机会，增强人们的工作能力，给他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变化才是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现在应该接受这一点并向前迈进。

如果要顺利地渡过变革阶段，就需要长远的战略性领导。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我们必须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重塑全球经济，牢牢抓住时代机遇，从容应对挑战。这也将创造对所有国家都是公平公正的进步和增长。

国家领导人需要更大格局的解决方案，并且深入参与讨论，如何实施这些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能够保证我们的教育系统与时俱进？如何填补今天已经存在的技能差距？如何确保公平增长，惠及贫困人口？

领导力的匮乏

遗憾的是，我们是全球化的开拓者，并没有前人实践经验供我们借鉴，甚至还共同面临着领导力不足的问题。现在面临一些共同挑战，需要谨慎处理外交关系并达成合作。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利益会完全一致，但重要的是要找到消除两国之间不信任的方法，并为和平创造有利的环境。

如果不解决大国之间的鸿沟，在未来几十年中，都会持续感受到其不利影响。只有有远见的领导才能为大国之间的鸿沟架起桥梁，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

最后，为了在未来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我们都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并教会自己拥抱变化——技术、经济、社会方面的变化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只有适应变化，保持头脑灵活，保持领先，才能够取得成功。●

朝着开放全速前进

世界经济已经具备了实现大跃进的技术，但需求尚未出现。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认为中国将为下一阶段的全球化设定基调，并阐述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郑之杰

当前，经济全球化大潮不断向前，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及资本、商品、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客观要求。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也要看到现在的全球化与以往的全球化有很大的不同，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

从经济增长看，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传统增长动能不足，需求不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

从贸易体系看，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冲击，贸易争端加剧，全球贸易体系受到巨大的挑战。

从产业布局看，产业分工不断调整变化，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国际竞争与合作关系呈现新的态势。

从金融市场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更加明显，大规模资本流动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拖累长期的经济增长。

从治理体系看，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达到 40%。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前进，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变化和曲折，中国只有加强开放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为建设开放性的世界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从积极引进来，到大踏步的走出去，再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政策沟通，设立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从学习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到加入 WTO 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扩大开放的脚步从未停滞，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130 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2017 年人均 GDP 超过了 8800 亿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并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 30% 以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中国将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个重要的转型关口如何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笔者认为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切实提升开放型经济的水平，面对深层次的矛盾和发展的瓶颈，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是继续走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子，在经济低成本优势逐步下降的条件下，要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资本投入转变为依靠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



三是切实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尊重市场规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市场的失灵和降低试错成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四是逐步缩小城乡地区的收入差距，加大对脱贫乡村振兴中西部等领域和地区的支持力度，补齐民生的短板。

五是鼓励金融多元化发展，深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完善金融生态，建立多元化金融发展的合作体系，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并将继续在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中国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多年来国家开发银行服务国家战略，大力支持“两基一支”、社会服务民生、生态科技环保等重点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力量。

与此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大力开拓国际合作业务，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发起设立上合组织银联体、中国东盟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中国中东欧银联体、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中非金融合作银联体，为推动多边金融合作促进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参与全球化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面向未来

国家开发银行将继续开发金融银行的优势和作用，打造国际一流的开发国际金融机构，助力国际金融机构高质量的发展和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在国内，继续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紧扣国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前沿领域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化、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国际，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以市场化方式支持“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增进沿线国家的民生福祉，助力形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化开展与全球各金融机构的合作，凝聚合力，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支持。国家开发银行愿与各方携手推动开放合作，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共同发展做出新的积极的贡献。◆



关于IFF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由中国主导，总部设在北京的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2003年10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G20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 20）”。

宗旨

自2003年创立以来，国际金融论坛（IFF）秉承和遵循“全面可持续发展——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的宗旨，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远见、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目标

国际金融论坛（IFF）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确保独立、客观、前瞻和包容性，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通过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促进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以下目标：

- 1、全球金融战略对话平台；
- 2、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 3、全球金融创新实践平台；
- 4、全球金融战略智库平台；
- 5、全球金融高级人才平台。

重塑国际贸易与货币体系



坚持规则导向 改革全球经济治理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认为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后，系统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全世界金融治理中有更多声音，促进基础设施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遭遇挑战，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退，贫富分化加剧，地缘政治冲突不断，金融市场出现波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日益抬头。

主要发达国家仍然受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困扰。随着全球主要央行逐渐收紧货币政策，未来债务将无法继续快速增长，经济下行风险逐渐显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探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不断试错。由于各国资源禀赋不同，政治经济体制各异，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在借鉴、模仿、试验中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兴市场国家仍然没能摆脱对美元周期的脆弱性困扰。2018 年 4 月以来，随着美元指数超预期上涨，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国相继出现金融动荡，资产价格大幅调整。

导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因素并未得到纠正

十年前金融危机的根源，被视为来自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的不平衡，具体表现在债务杠杆过高、“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等。然而我们看到，过去十年中，这些问题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债务杠杆方面，据国际金融协会披露，全球债务已于 2018 年一季度攀升至 247 万亿美元的新高位，与全球 GDP

比重升至 318%。¹ 金融机构规模方面，目前美国五大银行控制着银行资产的 47%，而 2014 年为 44%，规模最大的 1% 的共同基金管理着 45% 的资产。² 影子银行方面，根据保守定义，如今规模为 45 万亿美元，控制全球 13% 的金融资产，高于 2010 年的 28 万亿美元。³ 针对银行的监管高压，似乎只是将更多活动推向了影子银行。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变革

从全球经济治理层面来看，一方面，美国由二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主导者和维护者，转变为在全球贸易与投资上坚持和突出“美国优先”的双边原则，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科技创新，特别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等方面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在流程和架构上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迁移和重构，由此引发了全球金融投资、贸易结构和产业链的不断变化。传统的全球化动力已经减退，急需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注入新的经济全球化动力。

同时，全球化过程中的南北之间、价值链上下游之间、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等各层面的分配不均衡问题也亟待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解决。

坚持规则导向，完善国际多边金融体系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要坚持规则导向，完善全球治理。现有的国际多边金融体系就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一个以规则为导向，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

现有的国际多边金融体系并不完美，确实存在很多弊端，应当改革。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关注的核心仍是发展问题。希望通过发展解决社会、经济难题，包括贫困、收入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发达国家关注的焦点更多集中在宏观政策和公共治理领域，在其影响和压力下，国际多边金融体系经常会偏离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需求。

但改革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必须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很多发达国家的学术界也看到了在今天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多边金融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一些多边金融机构都应该进行深度改革，但如何改，并没有一个共识。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一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不足和弊端提出批评，并要求增加在这



祝宪

些机构中的话语权，但目前仍缺乏兼具理论深度和可操作性的具体的替代和改革方案。同时，不同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还不可能完全一致。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受不同的发展阶段、收入水平、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使这些国家很难在和发达国家的博弈中拧成一股绳。有些“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还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新型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有望发挥重要作用

在全球经济、金融前景均不明朗的情况下，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在通过引导基础设施投资等帮助成员国进行逆周期调控、稳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2015-2016 年，在国际多边开发金融领域，成立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两家新机构——亚投行与新开发银行。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此新生事物抱以很大期望。

在全球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资金严重匮乏的背景下，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是对现有全球多边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秉持开放、包容、共赢的理念，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双边开发机构以及私营部门等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探索开展包括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联合融资等在内的多种业务模式，共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水平，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

1. 国际金融协会，2018 年 7 月，<https://bloom.bg/2BoNTGh>
2. S Schaefer, Forbes, 2014 年 12 月，<https://bit.ly/2WUUYun>
3. C Binham, 金融时报，2018 年 3 月，<https://bit.ly/2TVb9n0>

中欧合作是坦诚相对的友谊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及前外长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分享过往四十年与中国的往来经验，强调开放与合作精神。

1992-1995年在我担任葡萄牙外交部长期间，葡萄牙与中国在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中进入关键阶段。谈判拉近了我和中国的距离。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屡次访华，见证了中国了不起的发展和现代化历程。在担任葡萄牙总理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期间，我与中国的交流进一步扩大，代表欧盟与中国进行了多次对话和合作。

《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于2013年开始实施。欧盟与中国之间建立了有组织的合作关系。中国与许多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欧盟早在1975年就与中国建交，现在双边已经形成了70多个对话机制。这些长期对话机制覆盖范围广泛，且战略意义重大。

2018年7月举办了第二十次中国-欧盟峰会，双方最高级别的领导人都参与了此次峰会。中国的与会代表为中国总理李克强，而欧洲的与会代表则是欧盟委员会的主席以及欧洲理事会的主席。

我也曾参与了往届的会晤，不仅与中国总理进行了会谈，还曾与中国前主席胡锦涛和现任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交流。我也非常清楚地记得，2014年习主席任后首访欧洲，到访了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

中欧的经贸关系尤为重要。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洲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商品的日贸易额已经达到15亿欧元，很快就会到20亿。而对双方而言，重要的是巨大的交易额和广泛的贸易合作领域，这都已经成为整合供应链的一部分。

贸易已是今时不同往日。然而，某些人依然抱着守旧的观点来看待贸易，认为国家贸易只不过就是把自己国家生产的东西卖给其他国家。但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的贸易是，一个国家将一些组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辗转之后又回到那个国家或其他国家。

这就是整合型供应链，也是中国和欧盟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原因。欧盟的官方数据表明，2017年欧盟在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总额达到了1980亿欧元，而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则达到了3750亿欧元。虽然在商品总额方面，中国对欧盟有着贸易顺差；但从2016年的数据来看，在服务业方面，欧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盟则对中国略有贸易顺差。我所掌握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的服务出口总额达到380亿欧元，从中国进口的服务总额达到300亿欧元。

扩大投资机会

中欧关系在经贸方面内涵丰富，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欧盟正与中国就全面投资协议进行谈判，早在我担任欧委会主席时就决定于2013年正式启动谈判。彼时，已经在讨论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可能性。但是，欧盟内部当时并没有达成共识。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经济结构不同，以及对中国的市场经济认知不一致。这些都是欧盟与中国领导人交流时经常谈到的问题。我们认为，与其讨论如何马上建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不如先签署一个全面投资协议，以便为双方创建一个公平的商业竞争平台，提高市场准入和自由度，为双方带来新的机遇。

在欧盟看来，这一理念也能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助力。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欧盟对此也非常支持。

欧盟的关注点之一是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以葡萄牙为例，葡萄牙最重要的发电公司、最重要的配电公司、最重要的私立银行以及最重要的保险公司和最重要的医院都由中国公司控股。由此可见，葡萄牙对外资非常开放。



以上例子中所举的电力公司可谓是葡萄牙最重要的公共事业，然而葡萄牙政府还是坚持开放的原则，欢迎来自各国企业来葡兴业。当时与中国竞标公司，还有巴西和来自欧盟成员国德国的公司，但是中国企业出了最高的价格，成功竞标。试想，如果情况相反，由一家欧洲公司控股中国公司在华可行吗？让我们开诚布公的讨论这个问题。目前，在中国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虽然中国已决定深化改革，但目前这种投资形式还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所以中国政府当局和中国民众必须考虑，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为境外投资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如果中国愿意这样做，就会向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消除不同国家之间贸易方面的关键障碍。除了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方面的因素，试图为中国贸易制造更多紧张关系的人惯用的理由，就是中国没有为外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开放直接投资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我们认为彼此的经济应该更加一体化，那么这种一体化不仅仅是通过传统的贸易机制来实现，如关税和配额等，更需要放宽对直接投资的限制，完善法律制度，使得可预测的法律法规更好的服务于中外投资者。

欧洲新共识

欧盟无意指导他人，但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欧盟建立于二战之后，当时称为欧洲共同体。最初的设想是建立一个

政治上的联盟，使得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再遭受战火的摧残。在此之后，西欧国家之间确实再无战争。

如今，欧盟成员国之间完全不可能发生战争。欧盟中许多历史悠久的国家是独立主权国家，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依然选择了建立这种一体化的机制，这样不仅拥有了共同市场，也消除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没有配额，没有关税。葡萄牙的一个小公司也能没有任何障碍地向德国展开贸易，反过来也是如此。从另一方面来说，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也应该归功于海关联盟以及国家层面之上的统一措施，包括统一的货币欧元。欧元已成为19个国家的通用货币，这也是区域一体化中最为先进的案例。

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一体化的案例，如亚洲的东盟。但如果从超国家的层面来衡量，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个联盟达到欧盟的标准，不论是商业投资、货币政策、社会，还包括在预算中配置资金给最贫困的国家的分配政策等方面都实现一体化。

一体化有各自的结构，全世界不一定要采取相同的方式，但欧洲国家在移除障碍、为投资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及促进贸易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未来的发展一定有所裨益。

一体化永不停止

欧盟同样也展现了在面对风浪时的韧性。在2004-2014期间，欧盟成员数量由15个发展成拥有28个，成员数量

几乎翻了一倍。新加入的国家中，有些曾属于社会主义集团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如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有些曾属于经济互助委员会，即华沙条约组织，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分成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还有前南斯拉夫国家，如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中国非常清楚欧元的存在具有战略意义，并且始终是一种重要的货币，这也是中国在向世界表明欧盟存在的重要意义。

但英国很有可能在 2019 年脱欧，如此一来，成员国只有 27 个。不过，仍有一些国家希望加入欧盟。欧盟在成立 50 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期，成员国还是从 15 个增至 28 个，还为一体化建立了更多的机制。例如，正在建立一个银行业联盟，虽然还未建成，这也是来自欧盟的倡议，旨在为欧洲的银行和金融部门建立一个单一监管机制，为银行建立精准的应对危机机制。有时，危机反而能加快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因为之后在危机的重压之下，各国的领导人才愿意为推进欧洲一体化做出一定的妥协。

在曾经的 G20 峰会上，当时不少人认为希腊将脱离欧盟，欧元区也将崩溃，而处于困境中的希腊则会不可避免地离开欧元区。然而所担心的状况并没有发生。相反，我们创造了欧洲稳定机制这一新的工具来应对这次的危机。这项新的机制相当于欧洲货币基金组织，目前仍在不断完善之中。这些新机制使得希腊得以留在欧元区，也使欧元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货币。借此也展示了欧盟与欧元的韧性。

在希腊危机期间，中国在欧元市场低迷，市场参与者抛售欧元的情况下，依然给予了欧盟和欧元支持。中国非常清楚欧元的存在具有战略意义，并且始终是一种重要的货币，这也是中国在向世界表明欧盟存在的重要意义。

现在的中欧关系亲密无间，没有任何问题吗？当然有，而且如贸易在内的很多问题会持续存在。但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独立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把这个问题延申至其他领域，伤害双边关系。

在国际外交中，如果总是对某一问题反应过激，那么交流只会产生更多问题。国家就像人一样，也有感情，能感受到骄傲和挫败。然而，国家要避免带着傲慢的情绪制定国际政策，任何形式的傲慢都是不明智的，要避免制造怨恨。

中欧关系还有提升的空间，但一些领域需要进一步融合，

应当牢记我们的战略目标，那就是中国和欧盟的良好外交关系。

中国的增长就是全球增长和繁荣的机遇。欧盟真诚地钦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使数亿人摆脱贫困。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欧盟多次向中国的领导人表达了钦佩之情，中国也对欧盟能化解宿敌之间的矛盾，实现真正和解表示极大的尊重。

亚洲在经历过去可怕的纷争之后，亚洲各国之间并没有实现真正地和解。一体化进程任重而道远，对整体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即将到来的乌云

全球经济近期表现良好，因为主要经济体中的支柱型行业集体发力，使得经济蓬勃发展。特别是在美国，虽然出现这种惊人的经济增长势头，部分是由于美国当局实施税改为经济注入的强心剂。但是相比较之下，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好过欧洲。但欧洲国家也没有经济衰退，增长幅度较为平缓。一些成员国所取得的增长超过了之前的预期，对于欧洲这些成熟的经济体而言实属难得。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的推动力，日本经济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也一直保持增长。

最近，有一些阴霾笼罩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上。我们认为如果贸易摩擦仍将继续，美国无法保持这种迅猛的增长势头，而中国的经济增速也可能会放缓。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2019 将成为中国经济弹性的一个重要考验。

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在避免产生更多债务的条件下，如何继续保持增长，现在中国的债务水平已经高到了领导人不愿意看到的水平。来自欧洲的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就是，中国保持增长速度和长期繁荣的关键在于结构性改革和推进市场改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认为中国应当继续改革。只有改革才能进一步的释放社会生产力，才能抵消一些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的负面影响。2019 年也将无可避免看到更大的市场波动及经济波动。

这也是欧盟和中国应该本着开放、坦率和友好的精神继续共同努力的另一个原因。双方都应当牢记战略关系的总体目标，加强协作；不仅要考虑本国公民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对方国民的利益乃至世界的利益。

中欧之间的持续合作，也将有利于全球更高度的一体化。●

风暴之后的全球金融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探讨金融危机后影子银行的发展与央行的政策，以及全球新秩序与新规则将如何产生。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金融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状况有了普遍的改善，虽然危机爆发之时，首先受到冲击的资本市场是商业银行，且损失惨重，很多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倒闭；在欧美国家，部分商业银行被国有化。但是，经过十年的发展，商业银行都有普遍的改善。

改善的表现之一是资本市场异军突起。随着银行在相对收缩，重整资产负债表并处理不良资产，资本市场筹资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在上升，各国资本市场在本国筹资额中所占的比重都在上升——但中国恐怕是一个例外。

与此同时，影子银行持续发展。在危机之初，大家都看到了影子银行的影响力，很多人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影子银行的无序发展广泛破坏了金融体系。各国当局，在危机发展之后没多久，或多或少采取了措施。

市场集中度普遍上升。排名前五的银行和名列前茅的保险公司所占比重全部在上升。因为在危机过程中，这些庞大的金融机构拥有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能够抵御这么大风暴的。而小的金融机构承受不住压力，只能面临被并购、重组甚至破产的结局。

当然其他还有一些方面的表现，但这几个变化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比较突出。

通货膨胀走低。在经济金融活动中，通货膨胀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中央银行第一任务就是反通胀。从 1995 年开始到 2004 年，许多央行执行反通货膨胀的手段是稳定物价；2004 年之后是通货紧缩时期，物价开始走低。

随着经济复苏，国际收支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一边是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另一边是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经过十年后，经常项目的失衡规模在全世界都在缩小。同时看到，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失衡在扩大，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非常的显著。所以很可能今后会遇到一个新的国际收支格局，金融因素变得比实体经济因素更重要。

目前看，接下来几年金融最重要的变量是利率。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真实利率持续走低，从 2004 年开始，全球真实利率从 5% 左右开始往下走，相当长一段时间为负值。正



李扬

是因为有这个情况，现在货币政策出现了很多很难理解的情况，比如说欧洲、日本还有负利率。许多央行认为真实利率低于预估。

美国的货币政策正趋于要常态化。美联储主席预计 2019 年美联储还要再加几次息，加息背后可能是强美元，如果是强美元就会引起国际资本剧烈的流动，就会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等等发生。另一方面，危机过程中，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两倍，主要是用来购买很多市场上有问题的机构或者有问题的资产。

这次变化的全部意义目前尚未分析出来，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世界变了，必须跟上这些变化。现在还做不了结论，但是必须用一种变化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必须根据新的实践制定新的政策。●

香港应发挥核心作用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周诚君认为，香港拥有技术、人才和技术设施等优势，是对人民币离岸市场进行风险管控和交易的最佳场所。

在大湾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的过程当中，应更好地发挥香港的核心作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了大湾区，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就有了更强的支撑和腹地。

早期人民币国际化是基于两个原因：中国是 GDP 排名第二的生产大国以及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国际贸易过程当中人民币发挥支付结算的功能，成为一个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海外投资者愿意投资持有人民币，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被广泛用于结算，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币在升值。从 2005 年到 2014 年人民币升值了 36%。2014 年以后，人民币的升值趋势不再延续，甚至一度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但是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3 年到 2016 年间，国际金融机构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从 18% 上升到了 36%。

在人民币可能出现贬值的情况下为什么国际市场还愿意投资持有人民币？人民币的性质功能已经从早期的贸易结算货币变成了一个国际投资以及官方储备货币，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民币加入了特别提款权（SDR）的一揽子货币。从 2015 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大门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对境外投资者开放。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升级，很多境外投资者将持有人民币资产。

对于非居民投资者，持有人民币意味着跨币种，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所以一个理性投资者在接受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时候，必须要有相应的关于人民币资产的外汇交易市场，通过这个市场能够帮他更好地实现投资持有人民币的风险管理、期限匹配、流动性转换，当然也要管理好相应的汇率风险问题。

随着人民币加入 SDR 已经实现，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的任务要从一个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一个国际投资储备货币变成一个国际金融交易货币或者说国际外汇市场货币，形成从贸易结算到储备投资再到风险管理的完整资产交易链条。

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一个性质上必须是人民币的离岸资产市场、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市场、人民币离岸国际金融交易



周诚君

市场。这三者基本的特征就是：1）不一定有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基础；2）高频交易；3）大规模。所以从性质上这个市场应该是一个国际人民币资产外汇交易市场。

从功能上，首先，这个市场要帮助微观市场主体管理好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包括币种错配风险、流动性管理、信用风险等——这么一个人民币货币市场、人民币资产市场、人民币外汇市场，可以解决流动性管理问题、风险管理问题、资产配置问题，让投资者预期发生改变、或是想进行资产转换、或是想变现的时候能够通过这个市场顺利实现。

第二，如果要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宏观上这个市场必须是有深度的、交易活跃的、流动性充沛的，以及基于市场原则的定价，能够达到有效均衡的。通过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市场，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定价；通过市场机制发现人民币的汇率所谓的合理均衡水平究竟应该在哪里。随着跨境或者说资本项目和金融账户的不断自由化，跨境资本自由流动汇率形成是充分市场化、有弹性、反映市场供应需求的。



离岸人民币市场应是绿色的

一方面中国在之前全球绿色金融市场当中已经是佼佼者，成为国际绿色金融市场的引领者、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可以说已经逐步成为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者。如果能够借助香港这个平台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更好地让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民币资产具有更多的绿色性质——尤其在“一带一路”推动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尽可能让中国的企业和市场主体在“一带一路”的每一笔投资都是贯彻 ESG 原则的，是尊重环境的、讲社会责任的、基于良好公司治理的，那么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理解、接受和包容程度也会进一步提升，因为这些投资能更好地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离岸人民币的国际市场在基础设施上应该相应地配套。目前香港已经有了全球最好的离岸人民币的基础设施，比方说香港有人民币的实时全额支付系统（RTGS）。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运行得非常成功，但是内地的基础设施也得相应配合跟上。比如，境外非居民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时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持有人民币的存款，一种是持有人民币的各种各样的资产。理论上，所有海外人民币资金最后都在内地清算，因为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所有境外人民

币资产最终发行持有有一定在内地，因为所有的人民币资产一定是依靠内地的实体经济支持的。只有基于这些，海外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者才能享受这些基础市场产生的收益。如果所有人民币的发行都集中在内地，境外居民通过什么方式来持有这些资产？这涉及到资金账户和资产账户的开立问题。资金账户已经实现了所谓名义持有，资产账户目前还不行。因为根据中国法律，大量境外非居民要投资中国的债券和股票必须到内地的托管机构去开一个实名账户，就是所谓的“穿透式管理”。

但是让境外非居民持有或投资人民币时候必须到中国市场开一个户，成本和管理都是很困难的。要像存款账户一样考虑多级托管、名义持有，方便境外投资者在海外各个地方——包括香港——形成具有比较完整物权的资产存托管理体系。

基于这些资产账户会进行各种各样的衍生品交易、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这样才能形成比较好的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交易结构和风险管理结构。在这方面香港依托目前的大湾区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冲在最前面的。●

中国的明智之选 仍是积极支持全球经济一体化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原国际发展中心主任、世界银行原中国项目负责人尼古拉斯·霍普（Nicolas Hope）认为，从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僵局可看出，更多的双向投资流动有助于缓和两国关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70年间，全球经济繁荣空前，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成就归功于国际商业活动的持续自由化，这种自由化也促进了各国经济日益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

在美国的推动下，关贸总协定下开展八轮谈判，相关国际贸易壁垒减少，全球经济共同体逐渐形成。毫无疑问，美国不懈努力创建的体系使之成为主要受益者，但几乎每个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都在同等或更大程度上受益。

目前，美国政府认定国际贸易安排对美国不公平，我对此感到沮丧和深切关注。为了打破贸易利益的不平衡，美国背弃了先前开展包容性谈判的承诺，放弃了其为扩大贸易自由化所做的努力，转而支持旨在推动双边协议的谈判以及简单粗暴的保护主义。

美国退出了其所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拒绝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出炉了微调版本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撤销了对世贸组织的支持；并对其长期盟友和贸易伙伴单方面征收进口关税。

美国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而习近平主席已经成为持续全球化的倡导者；他和其他高级领导人推动了区域贸易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并多次向其他国家保证中国将致力于“进一步开放”。虽然习主席所承诺的行动尚未落实，但纵观中国在上海进口博览会、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上的承诺，未来预计有重大突破。

逃离僵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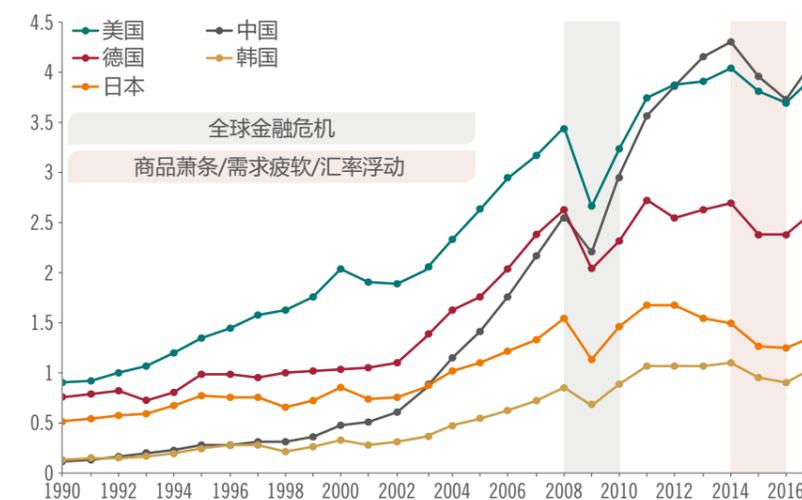
外部观察者担心的是，如何找到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途径，避免世界两大贸易体之间的战争（见图一及图二）。

目前美国挑起贸易战的最终目的尚不明确，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何种解决方法才能让美国满意？又如何实现呢？

笔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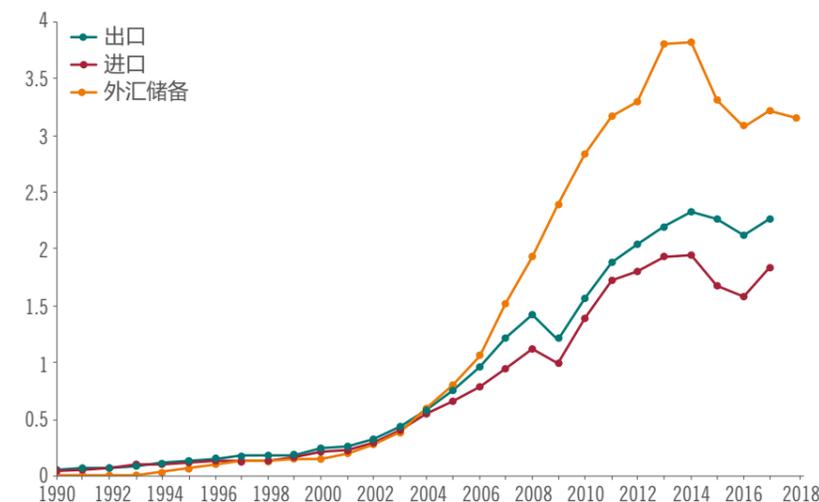
- ※ 中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可能是货币操纵的结果（见图三）。
- ※ 商品、服务和投资难以进入中国市场。此外，中国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制定的条件颇为严苛，其中包括所有限制、获取技术的渠道、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中美企业在对方国家所遭遇的不对等待遇是问题所在。
- ※ 窃取知识产权，包括国家资助商业间谍窃取美国商业机密。近期对窃取信息技术的行为关注度颇高。

图一 - 商品贸易（进口 + 出口）（美元 / 万亿）



来源：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图二 - 中国商品贸易及外汇储备（美元 / 万亿）



来源：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 中国国有企业享有的有利地位阻碍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

※ “中国 2025” 产业政策的目标——提高制造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

客观地看，美国在这些领域的不满是合理的，但应该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特朗普政府似乎并没有搞清楚情况，出台的强硬贸易政策也颇具误导性。

最令人担心的是，针对特朗普特别关注的贸易顺差问题，如果中国不能消除或大幅减少其双边贸易顺差；并且放弃中国 2025 的目标，或对其目标采取模糊处理，很有可能美国不会罢休。

中国可能会通过向美国产品扩大开放来减少对美国的顺差，如果美国愿意出售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商品，就能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除非美国调整国内投资，使其与国内储蓄保持一致，否则中国顺差的任何减少，都会被其他国家对美国顺差增加（或赤字减少）而抵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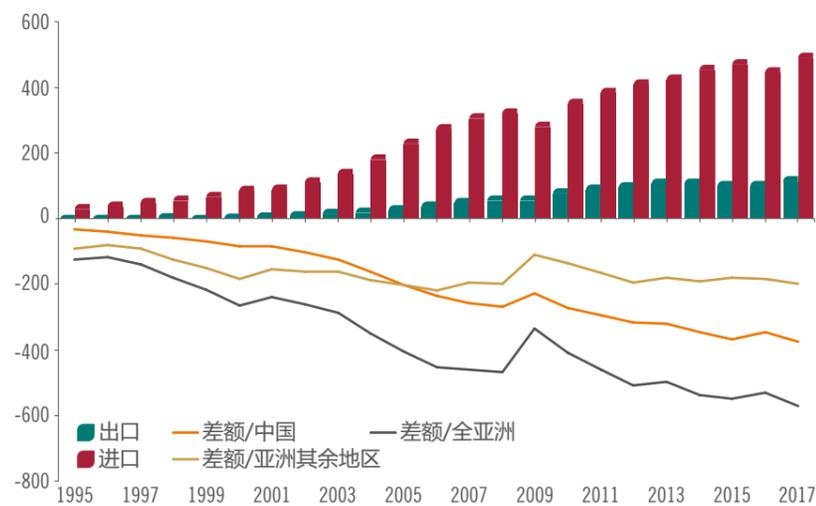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中国不太可能因为美国不满意而放弃其长期经济目标。对于已获得政府背书的中国 2025 政策，目前美国还知之甚少。

除了当前贸易僵局造成的损害之外，通过双边投资条约（BIT）谈判大幅扩大中美双向投资，目前也看似前景渺茫。与两国对其它地方的类似投资相比，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几乎少得难以置信；而大幅增加双向投资显然将符合两国的利益。中国虽然在倡导加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力度，但其开放的对象不一定包括美国企业；与此同时，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考虑加强力度，限制他们所认定的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投资。

在此艰难的环境中，中国的明智之选仍然是积极支持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扩大开放。如果可能的话，中国应当在这方面采取更加积极大胆的举措。理想情况下，中国可以：

- ※ 就贸易问题与美国开诚布公的谈判。
- ※ 支持世贸组织，将争议提交仲裁。
- ※ 促进区域贸易协定，但尽可能寻求包容性协议。
- ※ 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
- ※ 寻求与非美国供应源进行交易。
- ※ 更加坚定地继续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国内经济，兑现政府在金融、能源和通信等领域所作出的承诺。

图三 - 中美商品贸易 (美元/万亿)



来源: 美国人口统计局



尼古拉斯·霍普 (Nicolas Hope)

※ 与欧盟和其他国家共同探索双边投资条约的可能性。但中国也需要向美国企业做出让步，展示和解的姿态，这么做很大程度上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所面临的动荡考验

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提高，也更容易受到溢出风险的影响——金融传染和波动性。随着美国货币政策常态化，墨西哥银行副行长哈维尔·古兹曼·卡拉费尔 (Javier Guzman Calafell) 认为合作是通往前进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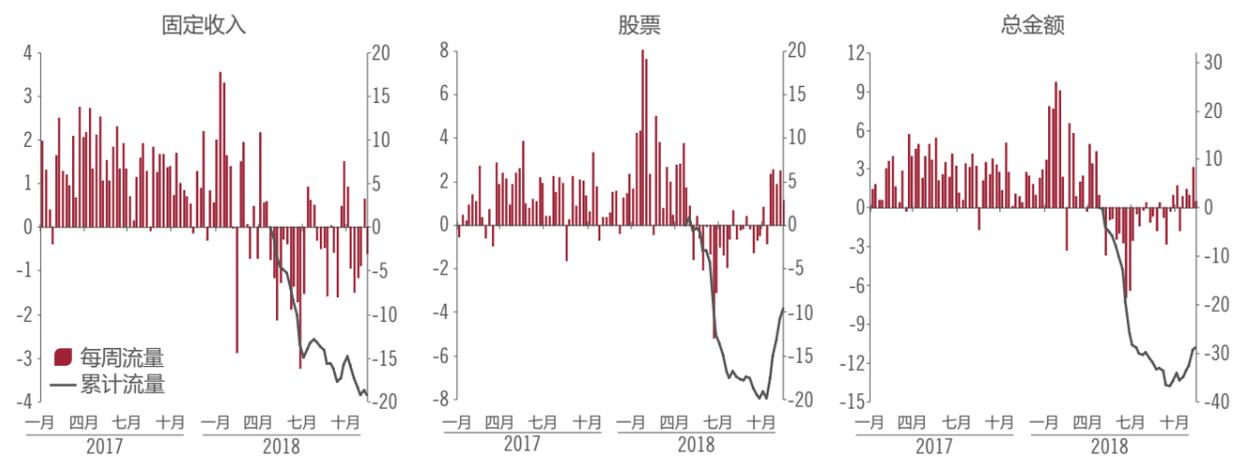
2017年至2018年年初，资本源源不断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然而自2018年4月以来，资本却反而开始外流。截至目前，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外流资金数额达到将近280亿美元（见图一）。资金之所以如此转向，是因为过去一年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导致避险情绪高涨。

背后的原因非常清晰，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包括美国加息、贸易相关摩擦升级、中国经济放缓、主要股票市场不景气、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政治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油价大幅

下跌——跌幅可谓在一年内前所未见。因此，这些经济体的财务状况已经显著紧缩，其程度有可能与2013年的“缩减恐慌”相当（见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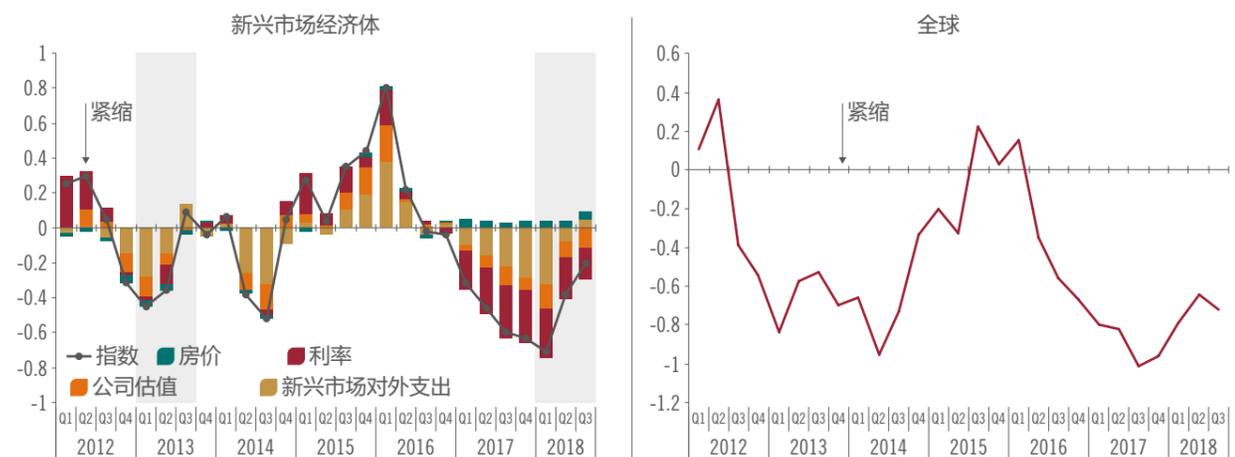
随着压力不断增大，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应对。第一，采取更为严格的货币政策。如存在外部脆弱性及其它特殊风险，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则大幅提高参考汇率。第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随外部冲击而调整自身汇率，其中几种货币通过现货市场或者金融衍生品等方式实行外汇干预。

图一 - 证券投资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 (美元/十亿)



累计流量为2018年4月起的数据。来源：新型证券组合投资资金研究院

图二 - 财务状况指数 (与平均值的标准差)



新兴市场经济体：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埃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黎巴嫩，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波兰，俄罗斯，南非，土耳其，乌克兰，不包括中国。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备注：Q1表示第一季度，依此类推

全球紧缩

资本转向，及随之而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市场紧缩，导致这一切的因素中，不得不提及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一般来看，美国加息将会拖累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尽管近期政策较为宽松，但经市场重新评估，前几个月联邦基金利率的未来走势存在上行风险，导致外向压力强于预期。

实际上，在2018年前三个季度，新兴市场经济体超过40%的资本外流可归因于外部因素，即市场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期增加。

相对于历史标准来说，全球金融状况依然较为宽松；但值得强调的是，目前的状况已经比一年前紧缩。这种结果背后有多重因素作用，彼此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其中有两个因素引人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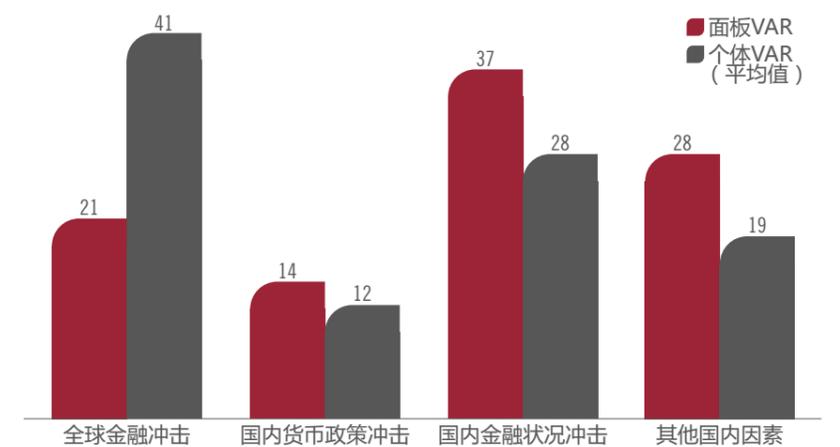
第一，美联储加息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出现紧缩倾向。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采取了持续宽松的政策，至少可以抵消其中一部分影响，但事实证明这些国家的货币正常化周期有所不同。

第二，尽管货币政策利率在2015年12月开始上升，美联储在2017年10月开始清理资产负债表，美国本土的金融状况相对较为宽松，仅在2018年初才出现紧缩的状况。

这种结果似乎与常识背道而驰。但我们应该牢记，从广义上看，一个经济体的金融状况是多个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可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美国，正在实行的财政刺激政策使得短期增长前景增强，公司预期利润提高，从而在最近市场准备大幅调整的情况下支撑了资产价格。欧洲和日本央行大规模购买资产从外部扩大了这种影响，刺激了对高收益美国证券的需求。此外，利率可预测地逐步上升，抵挡了美国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

鉴于试图预测市场变动原本就非常困难，在目前这样前所未有的情况下更是难上加难——随着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开始或继续各自的政策正常化周期，人们无法得知全球金融状况迅速收紧的速度究竟会有多快。观察认为，最近国际金融市场经历的一系列调整，包括利率上升、股指下跌及多种货币相对美元贬值，是一个乐观的势头，与强劲的经济前景相符，减少了部分发达经济体通货紧缩的风险；从更高的层面来看，成功终结了十年前金融危机后大规模实施宽松政策的局面。然而，金融市场急剧收紧的风险仍然不容忽视。

图三 - 由于全球和国内因素导致的国内金融状况指数变化所占比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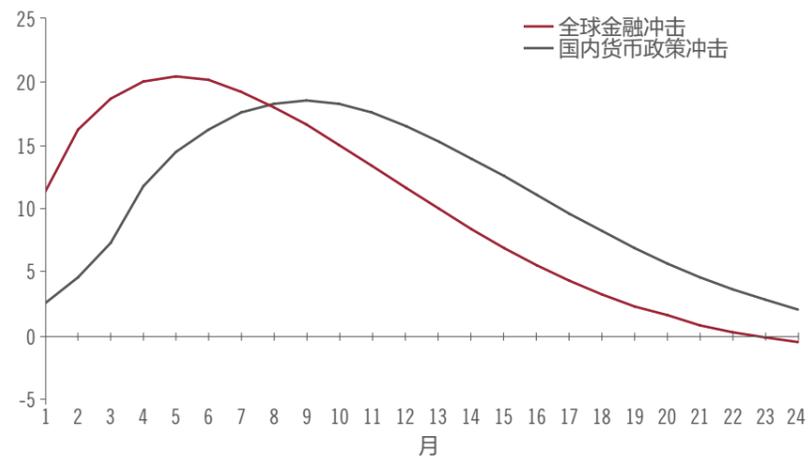
对具有灵活汇率的国家样本的面板风险价值 (VAR) 模型或个体 VAR 模型的估计结果。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哈维尔·古兹曼·卡拉费尔 (Javier Guzman Calafell)

在目前的全球政治经济背景下，有几个因素会显著增加破坏性事件发生的风险。首当其冲的就是，发达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中，发生意外情况的可能性。在此方面，美国引发了诸多担忧。尽管近期发生市场动荡后，市场对未来利率走势预期下调；但在一个几近满负荷运转的经济体中，持续实施的财政刺激措施，以及进口关税上调可能带来的价格压力，可能会令通胀率意外上升。

图四 - 国内金融状况对冲击的反应 (%)



基于面板 VAR 模型，对于具有灵活汇率的国家样本，国内金融状况指数与指向全球金融或国内货币政策冲击的冲击响应函数关系。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图五 - 外汇收益与其特殊成分之间的相关性 (中位数成对相关系数%)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次，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市场情绪可能受其不利影响。最令人担忧的是，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乃至进一步升级，尤其是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其影响之广泛可能远远超出争议原本的领域。

第三，外部冲击与自身弱点两者结合，可能会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对自身政策框架的抵抗力和可靠性的信心下降。

结构性挑战

此外，结构性挑战的存在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首先，如前文所述，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正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中，而此举发生的背景是史无前例的，使得其后果难以预见及评估。一方面，利率水平之低前所未有，持续时间亦较往常更长；另一方面，全球大规模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现在终止刺激政策，这种做法是否能成功尚无定论。鉴于此及其它不确定性，包括国际社会仍未确定“常态”本身的特征和定义，政策失误的可能性显然很大。各经济体在面临两难境地：调整政策过快，可能会在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破坏性后果，对国内和国际的实体经济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调整政策过慢，可能会使金融市场不断累积债务，风险和脆弱性持续增大。

第二，全球化促使不同市场和经济体逐渐实现金融一体化，政策制定者或将很难控制本国的金融市场状况（见图三、四）。据估计，目前所观察到的国内金融市场发生的变化中，约 20-40% 的变化都源于全球金融状况的变化——其影响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更显著，在个别国家所占比例超过 60%。由于此类国家的金融市场往往对外部冲击反应更快、更强，对国内货币政策的调整却没有那么敏感，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外部金融状况通常不是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制约，而是投资者情绪突然波动、金融传染或监管变化等因素，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却非常有限，或效率低下。

第三，在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金融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还未经受过全球压力的考验。其中已有证据表明，市场流动性不断细分，可能会造成流动性降低，进而使得资产价格和金融稳定性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发达经济体通过过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获得的充足流动性，将在未来几年大幅下降。

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券市场中，

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多。诚然，风险水平可由投资者类型的函数表达，大型机构投资者往往稳定性更高；但从结果来看，在受到突发冲击时，国内外投资者的反应是类似的。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外国投资者通过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进行交易，因此会对冲击的影响更加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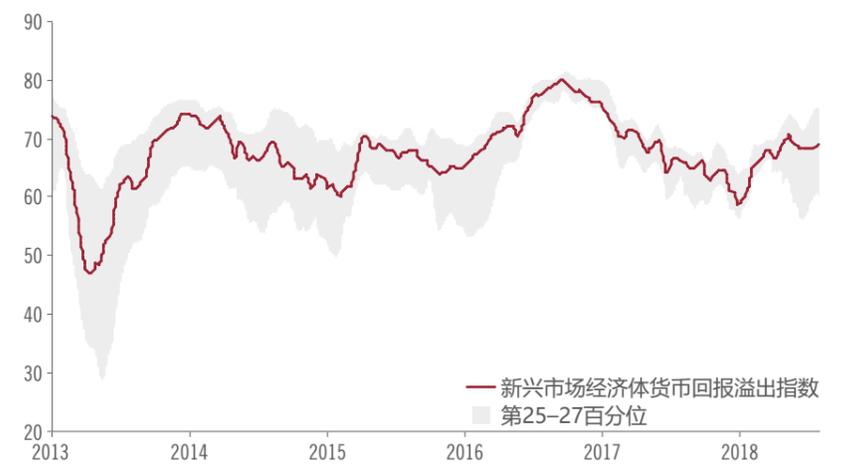
显然，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随时准备好面对以上风险及其它风险。尽管不可能在全球金融状况的变化中独善其身，但证据表明，国内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在过去的动荡中，全球投资者已经根据新兴市场经济体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特质进行划分。如果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越严峻，其信誉和货币贬值指标恶化就越严重；同样，有关市场汇率特殊成分相关性的预测，或者更广泛地来看，有关新兴市场危机传染相关性的预测，最近都在不断增加，但总体其风险水平较低（见图五、六）。

如果有人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仅凭自己的能力来克服当前的困难，这种想法非常无知、不公平。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任务艰巨，需要各方共同参与，携手合作，发达经济体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认真沟通货币政策决策方案，适当评估溢出效应，大力支持建设全球金融安全网，必要时，还可协调一致采取政策行动，这些都是合作的关键要素。

就目前世界经济现状而言，发达经济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达经济体要有相应的担当。如果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全球金融市场都能稳健运行，对于发达经济体也是百利无一害的。

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地位及其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参与度日益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的冲击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在过去十年内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范围显著扩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近年来发达经济体股票市场回报和汇率的变动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追溯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溢出效应。此外，鉴于目前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和国

图六 - 货币回报溢出指数 (%)



溢出指数基于 Diebold 和 Yilmaz (2009) 提出的方法，图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收益（本币对比美元汇率）。该指数反映了冲击对某市场所造成的影响与其对所有市场造成的影响的比例。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图七 - 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平均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溢出效应 (%)



金融市场溢出指数反映了平均发达经济体的回报比例，可以通过新兴市场经济体回报的变化计算得出。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际金融市场的特征，即使在无危机或近危机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波动也可能广泛传播（见图七）。

换言之，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仔细考虑其政策决策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产生的反作用。那么，国际政策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贸易争端应通过公平的机制来解决问题

乔治·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主席特别顾问哈利·赛亚丁（Harley Seyedin）呼吁建立新机制调解外国投资企业与当地政府的矛盾，重视外资企业对中国发展的贡献。

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美国 90% 的工作机会都流向了美国，认为中美贸易逆差正在扼杀美国经济，而美国消费者都觉得他们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中国制造的商品上，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有偏颇的。现在我想根据美联储的研究报告谈一谈贸易的实际情况。

美国 GDP 由四部分组成，最大部分是消费支出，其次是政府支出，第三是商业支出，最后才是进出口差额，也就是贸易逆差之所在。现在，美国 19.6 万亿美元 GDP 中有 70% 是消费者支出，而出于某种原因，大多数人和政客都认为绝大多数美国消费者的支出都花在了中国制造的商品上。

旧金山联储储备银行几年前发布的报告，也证实了我的说法，这四个板块的占比并没有发生改变。消费支出仍占 GDP 的 70%，其中只有 1.2% 实际上流向了美国。¹ 所以事实就是，美国消费者没有把 50%、70%、80% 的钱花在中国商品上，实际比例仅为 1.2%。

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中美贸易会产生争议，这种争议对美国又有何意义。难道只是为了将比例从 1.2% 降低到 1% 或者 0.8% 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中美贸易产生争议的原因令人非常费解。

再来观察一下美国 GDP 的第四部分，即美国贸易逆差。2018 年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达到了 3750 亿美元。数目看似很大，但对比美国 GDP 的总量，还不到 GDP 的 2%。

为了让大家有具体的概念，换一个小的数字举例。假如美国的 GDP 为 1000 美元，就相当于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为 20 美元——这个比例不至于使整个经济体系崩溃。所以，以这种方式来看，贸易逆差似乎并不是一个大问题。那么，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目标是什么？难道是把 20 美元减少到 15 美元，还是 10 美元？



哈利·赛亚丁（Harley Seyedin）

公平的竞技场

因此必须要讨论本质问题：我们在争论什么？目的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真正解决美国公司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我认为真正的化解之道就是中美两国坐下来，坦诚交换意见，解决问题。我认为这才是可行的方法。

应该如何对待知识产权问题呢？在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一名专家认为，中国政府所实行的法律已经足以保护知识产权，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执法力度虽然达不到 100%，但也已经相对充足；需要改进和更加完善执法的地方在于基层。两国可以协力突破这个问题。美国已经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法和技术，给予了中国必要的支持。

如今，中国法院所裁决的知识产权诉讼中，99% 都是中国内部的纠纷。这让我们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够保护外国技术，它对中国以及中国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同样重要。所以中美可以在这些领域谈判和合作，而且也必须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才能解决问题。

不必否认，不平等的竞争环境确实依然存在。虽然中央政府努力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国有企业更受地方政府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别的企业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自己所看中的地块也必须拱手让人。我可以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的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在最近一个月左右，我也在中国进行了投资，可是与当地一家国有公司的发生纠纷时，政府进行了调解，让我们将此事提交仲裁。然而仲裁裁决的结果却受到了政府干预，撤回了我们的土地使用权，这使我们觉得作为外商的权益受到了侵犯。我们输了，他们赢了。这种事对于在中国的外商来说很常见，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是华南美国商会的会长，成员企业达 2300 多家。然而，中国却没有一个机构可以让我们反映在投资时遇到的问题，中国应该为我们设立这样的机构。中国政府有必要与驻中国的三大美国商会进行交流，也就是北京商会、上海商会、以及我所在的华南商会。

因此，我建议中国政府为外商建立一个高级别机制，让我们可以和更高层的领导进行沟通。这样一来，就可以绕过地方和省级政府，可以向中央政府反映问题，并进行公正的听证。并不是说地方政府一定会偏袒谁，只是这些企业希望可以进行公正和诚实的听证会，而不必担心会在当地法院或当地机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需要这种高级别的平台，可以绕过地方政府，与中央沟通反映问题，让中央政府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那么美国企业就不会再指责中国的竞争环境不公平，而会看到中国在合作与开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华南商会的一项研究

10 月 29 日，华南商会发布了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企业在贸易摩擦中受到的伤害超过了中国企业。² 这个评估是客观公正的。并不是想通过这份报告来为美国政府背书，指出这一问题只是为了说明中国企业受到的伤害比我们少。这项研究还表明，这种贸易摩擦不仅伤害了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

也对在华拥有业务，进行经营活动的其他国家的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口舌之争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贸易摩擦损害了供应链、劳动力流动和未来的投资计划，并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长此以往，将会对投资、供应链、劳动力流动、人口流动、运输、航道、创新、经济发展等造成很大的破坏。因此，这种贸易摩擦百害无一利，应该通过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香港大学的迈克尔·恩莱特（Michael Enright）教授开展了一项为期 16 个月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³ 这项研究也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这项研究表明，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但是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和你们分享一些我们在衡量外商投资企业对华影响的基本的统计数据，对于中国来说，主要使用两个指标，即外国企业的投资金额，以及员工的工资。

外资企业创造了中国 33% 的 GDP 和 27% 的就业。以上海为例，上海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外国投资的聚集地。在上海，外资企业创造了 67% 的工业产出、90% 的高科技产出和三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在深圳，外资企业贡献了 50% 的 GDP 和就业岗位。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在创造 GDP、创新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中国经济必须保持开放。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未来非常重要。过去 20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突出。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确保中国能对世界经济持续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服美国的领导，但在此之前，我需要说服美国的企业，中国政府会提供一个让他们反映问题的机制，并且快速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困难。◆

1. G Hale and B Hobijn, 旧金山联储储备银行, 2011 年 8 月, <https://bit.ly/2Fr5Y9i>

2. 华南商会关于中美关税摩擦的报告, <https://bit.ly/2VURsIV>

3. M Enright, Hinrich 基金会, 《发展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卓越影响》



丝路国际联盟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共商·共建·共享

Consultation, Co-opera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丝路国际联盟(SRIA)致力于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型国际网络,通过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联合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力量,构建丝路民间合作与对话机制。

- 对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 开展全球市场化投融资服务
- 开启民间丝路外交和合作机制
- 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成果
- 开展多元化国际社会合作
- 整合联盟力量服务成员机构



“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 能否成为全球化的新动能

第二次“一带一路”调查共有 28 家中央银行参加。调查显示，各大中央银行认为该倡议是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倡议将大幅提升 GDP。到目前为止，“主要大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干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未来可能会发生改变。

——国际金融论坛（IFF）CEO / 秘书长张继中，
《中央银行》杂志总编 Christopher Jeffery，研究员 Rachel King



在过去五年中，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举世瞩目，致力于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目前，在现有的多边机制面临重大问题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更加凸显。

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搁置已久；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构，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进展缓慢。许多国家过去是多边体系框架的构建者——尤其是美国，现在却鼓吹单边行动。这很可能破坏过去几十年全球发展的动能。

鉴于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增进各国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致力于扩大合作领域，促进包容性国际合作，推动建设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一带一路网显示，目前已有 124 个国家和 29 个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国际合作中¹，包括 2019 年新加入的意大利和卢森堡。而去年调查时仅有 71 个国家。目前，许多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也先后加入，与亚洲和欧洲国家一起支持该倡议。

倡议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发展资金。迄今为止，中国已为他们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包括肯尼亚 87 亿美元的蒙巴萨至乌干达边境铁路，以及尼泊尔的水电项目。

中国利用自身在 40 年经济转型中获得的经验，在新丝路沿线主导开展基础设施及其它发展项目，这已成为“一带一路”的主要话题，而该倡议所倡导的合作精神也在许多国家传播开来。

例如，在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是新“丝绸之路”的西线和南线入口；因此，哈萨克斯坦将 2018 年指定为“乌兹别克斯坦年”，而乌兹别克斯坦也将

2019 年指定为“哈萨克斯坦年”——“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各国间的关系。或许，在俄罗斯、伊朗、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共同控制的里海区域，“一带一路”倡议也对里海法律地位问题的改善起到促进作用。

另一个较为低调的进展是中国在深圳和西安设立了国际法庭。这两个法庭用于解决“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相关商业纠纷，其形式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设立的法庭类似，体现出中国在基础设施“硬件”投资之外，配套“软件”上也下足了功夫。

“一带一路”倡议也极有可能获得七国集团的支持。意大利已成为第一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发达经济体。2019 年 3 月，罗马当局与中国签订了 29 项，共计 25 亿欧元的项目。而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员，该银行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项目投资。

然而，意大利的立场似乎和部分欧盟国家不同；此外，美国还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批评明显多于前届的奥巴马政府；一些美国官员甚至暗指“‘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主导、为中国服务的倡议”，认为中国从中获益。全球发展中心（CGD）于 2018 年 3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宣称，“至少有 8 个潜在的国家”会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导致“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增加”，这八个国家分别为：吉布提、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尔代夫、蒙古、黑山、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

受访者情况

本次“一带一路”调查共有 28 家中央银行参与。超过半数的中央银行来自欧洲，亚洲占 15%。此外，还有来自中东和大洋洲的中央银行，“一带一路”调查也首次收录来自非洲的中央银行的反馈。根据数据显示，此次受访央行多来自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占三分之一。

地区	百分比	经济体	百分比
欧洲	54	新兴市场	25
中东	11	转型经济体	18
亚洲和大洋洲	21	发展中国家	14
非洲	11	工业国家	43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	4		



中国面临的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中，有很多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列为世界上风险最高的经济体。²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发展的需求。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其前任全力支持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新当选的政府领导人可能会持截然相反的态度。

易卜拉欣·穆罕默德·萨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接替阿卜杜拉·亚明（Abdulla Yameen）担任总统后，马尔代夫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另一个例子是马来西亚。2018年8月，新当选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bin Mohamad）表示，计划取消三个之前已经被暂停的“一带一路”项目。虽然，由于担心成本失控，马来西亚取消了这些项目，但表示仍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马哈蒂尔总理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区域交流合作，有利于该地区所有国家。”³

中国官员已经认识到，需要更加关注解决项目可行性、债务可持续性、透明度和承包商的地域特征等问题。然而，面向中央银行的“一带一路”调查结果表明，许多国家依旧非常看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红利；事实上，他们一致认为该倡议是支持全球化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举措。

调查报告要点归纳

- ※ 所有受访者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全球化的重要举措。
- ※ 所有受访者都预计，“一带一路”倡议将提振中国GDP，其中16%认为增长率将在2-10%之间。
- ※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预计中国GDP增长率将在1-2%之间。
- ※ “一带一路”项目均没有受到与中美贸易摩擦相关的政治压力的影响。

- ※ 然而，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挑战是与大国的关系。
- ※ “一带一路”项目面临的财务压力没有增加。
- ※ 受访者没有对债务可持续性表示非常担忧，75%的受访者认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任何问题，能波及到的国家不超过五个。
- ※ 86%的受访者表示，“一带一路”相关债务的规模小于本国其它外债，相同比例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一带一路”相关债务是可持续的。
- ※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与其它外债相比，“一带一路”相关债务的条款和条件较为宽松。
- ※ 近75%的受访者认为，其他发展计划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有益的补充。
- ※ 近80%的受访者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支持其所在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
- ※ “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侧重点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超大型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SME）融资。
- ※ “一带一路”倡议对金融包容性举措的支持力度有限。
- ※ 受访者普遍认为绿色金融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关。
- ※ 40%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实现全球气候变化承诺。
- ※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够支持本国提升技术实力，受访者的看法存在分歧。
- ※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改进的主要领域为：监管透明度、开发银行的支持和彼此之间的协调。
- ※ 43%的受访者倾向于使用本币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
- ※ 与欧元和人民币相比，美元是最受青睐的外国融资货币。
- ※ 受访者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采用本币支付和结算系统。
- ※ 半数以上的受访者支持为与贸易相关活动开放本币业务。

支持全球化

从今年受调查的中央银行的反馈来看，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受访者虽然来自世界各地，但一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没有受访者质疑这种观点（见图1）。

非洲的一家中央银行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将亚洲、欧洲和非洲联系起来，增强经济和文化纽带，也就是促进全球化。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包括非洲国家，提供了发展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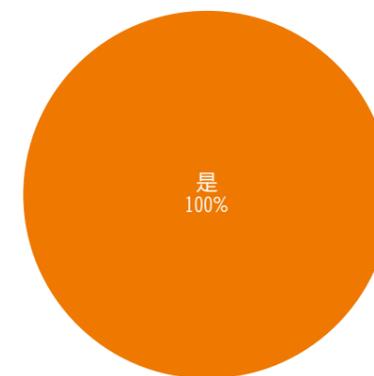
欧洲的一家中央银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发展和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该倡议试图在广泛的范围内，在许多国家之间，促进贸易、经济和金融一体化。”

中国一带一路网显示，“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地理范围为124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加勒比海地区的一家中央银行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改善贸易设施，扩大贸易量，降低成本。

鉴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及广度，其中一个显著的挑战是各方对于如何落实倡议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欧洲的一家中央银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遵守WTO的规则，不应该积极寻求建立封闭或具有排他性的贸易和生产网络。

然而，在临近中国的地区，东南亚的一家中央银行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被提及的次数比以前有所减少”，表明该倡议吸纳了许多新国家和组织后，其影响力似乎被分散了。尽管如此，该央行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该地区的发展和增长仍然很重要”。

1. 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而言，您是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全球化的重要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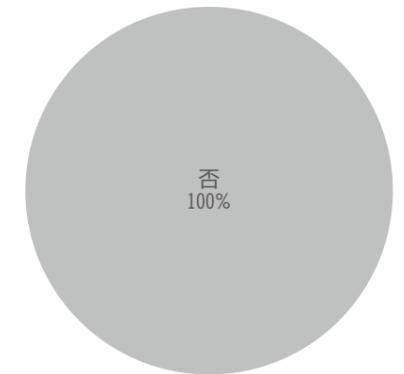
一位受访者未回复

没有显著压力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和“美国货币政策收紧”（见图2），受访者均表示，他们的国家在“一带一路”项目方面，没有感受到相关的国际政治施压。欧洲的一家中央银行总结，认为没有观察到任何明显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外部政治或地缘战略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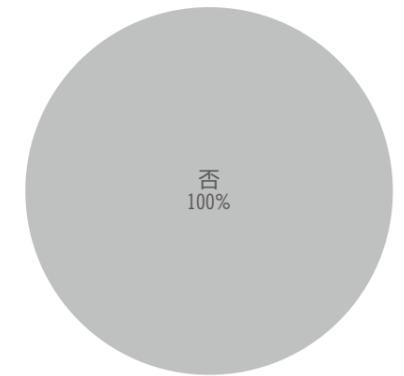
对于“一带一路”项目相关的财务压力和其它挑战，受访者的看法也和以上问题类似。受访者都表示，他们没有遇到过此类困难（见图3）。然而，部分受访者在评论中提到，这是因为“一带一路”主要项目在当地尚未全面开展。

2. 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在贵国实施是否面临更大的国际政治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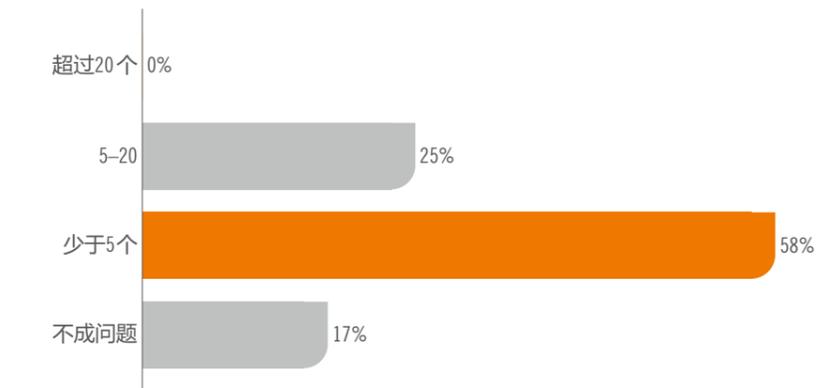
两位受访者未回复

3. “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在贵国实施是否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和挑战？



一位受访者未回复

4. 您认为有多少“一带一路”国家会因该倡议将造成债务问题，并导致不可持续发展？



三位受访者未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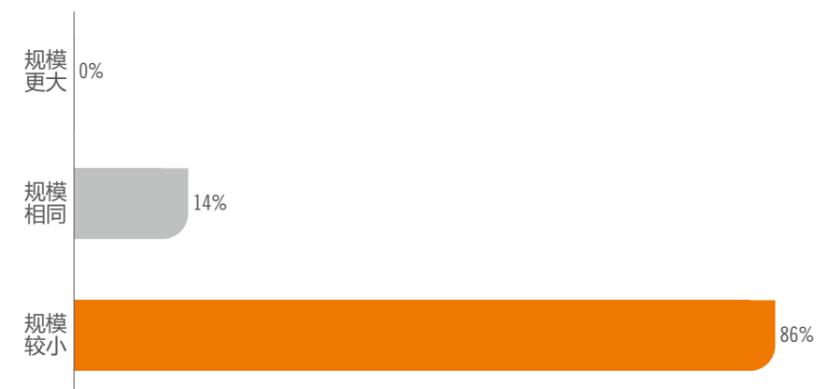
欧洲的一家中央银行表示，国内目前还没有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落实举措。一家中央银行提到，该国最近才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然而，另一家中央银行指出，该倡议只是在融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促进作用。

受访者似乎也并未过于担心其它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近20%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债务问题，58%表示任何债务问题“不会超过5个国家”，两者合计共3/4的受访者认为债务问题仅限于“少于5个国家”。另外有25%的受访者认为债务可持续性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实际范围波及5~20个国家（见图4）。

欧洲的一家中央银行表示：“对于宏观经济基本面较弱和外债水平较高的国家而言，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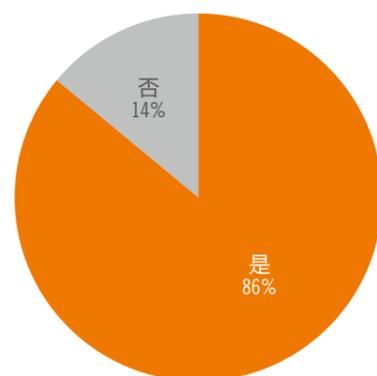
受访者均认为，自己所在的国家并不会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承担特别大的债务风险。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相关债务规模与其它外债相当；其余则表示其规模比其它外债还小（见图5）。86%的受访者认为，本国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债务是可持续的，只有14%认为不可持续（见图5A）。这个结果也可能暗示，虽然“一带一路”相关债务的规模可能小于或等于其它形式的债务，但由于该债务是最近才增加的，因此使一个国家更接近潜在的“临界点”。

5. 与其它外部债务相比，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为本国带来的债务问题？



八位受访者未回复

5A. 您认为本国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债务可持续吗？



八位受访者未回复

5B. 与其它外部债务相比，如何评价“一带一路”相关的债务条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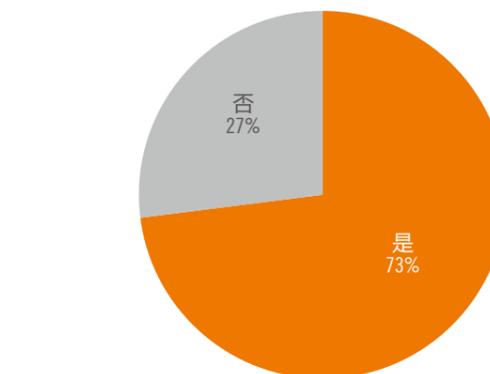


八位受访者未回复

尽管43%的受访者表示，“一带一路”相关债务与其他外债的条款和条件类似，但57%的受访者则认为“一带一路”相关债务的条款和条件不那么繁琐（见图5B）。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债务相对较高的国家热衷于从中国寻求“一带一路”资金。

一家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表示：“我们的外部融资来源有：双边融资（包括来自中国），多边融资以及来自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我们准备退出目前与IMF开展的项目，并且（除了援助，我国政府）正在寻求长期资金来源，以帮助解决基础设施和发展需求。在此方面，我们希望得到中国的进一步支持。”

6. 您认为类似的倡议能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协调吗？



四位受访者未回复

不同倡议间的协调合作

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印度、俄罗斯和日本，也提出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类似的倡议和发展计划。当被问及这些倡议和发展计划是否能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协调时，近3/4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而略多于1/4的受访者认为彼此之间不可能合作（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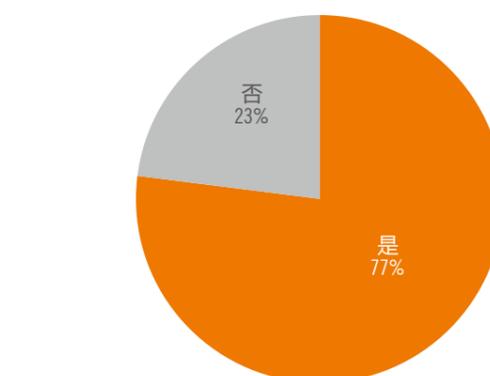
欧洲的一家中央银行强调，在各类倡议和发展计划上的合作往往取决于目标是哪一个具体倡议；但亚洲的一家中央银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世界多个地区，其他举措不可避免将与之相协调。

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本意在于促进多种形式的跨文化交流联系，但同样也在支持全球基础设施项目方面进展迅速。近77%的受访者预计“一带一路”倡议将支持其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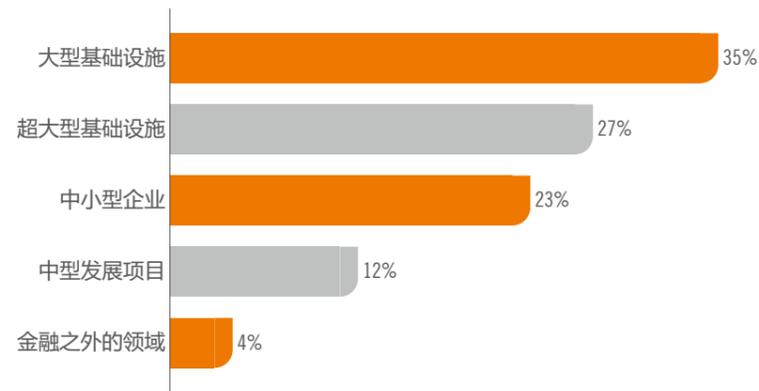
获得资金后，受访者预计对于大型基础设施（道路、工厂、农业水利基础设施等）的支持率最高，达35%；其次是超大型基础设施（发电站、高速铁路网等），达27%；第三位是中小型企业，占23%；中型发展项目（学校、医院、住房、小型运输环节等）占12%；金融之外的领域占4%（见图7A）。

7. 您是否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支持贵国基础设施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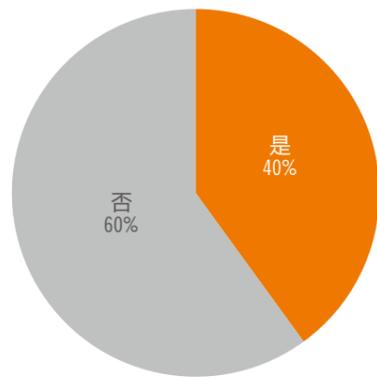


两位受访者未回复

7A. 如是，请选择项目的种类（可多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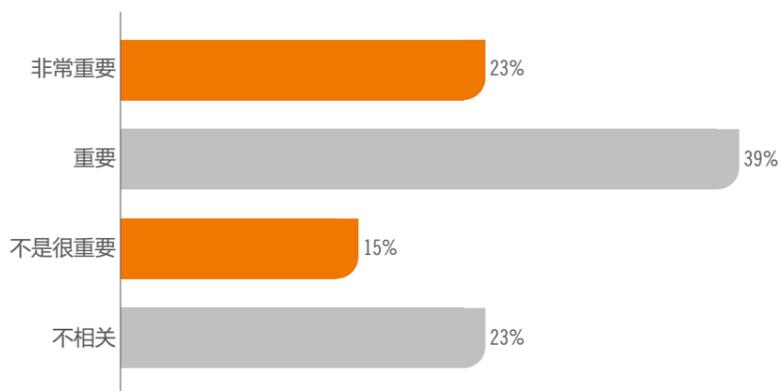


8. 您认为可持续投资和绿色金融多大程度上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有关？



两位受访者未回复

8A.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实现全球气候变化承诺？



五位受访者未回复

绿色金融

中国已经认识到，快速工业化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经济结构转型，转向高科技产业、服务业和消费领域，对绿色金融关注增加，建立了专门资金明确用于资助环保项目和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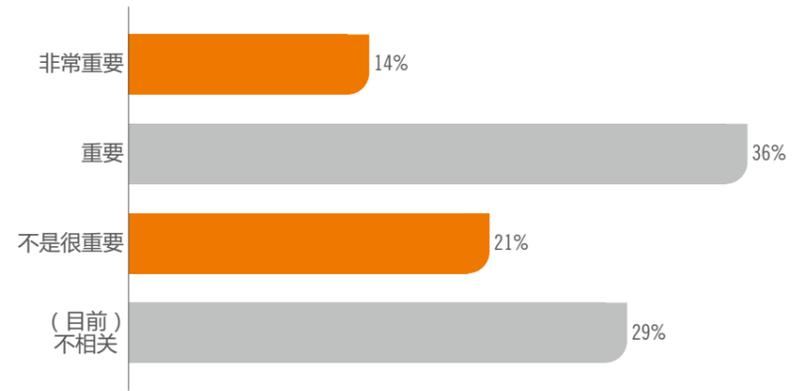
中国目前已发行超过 300 亿美元绿色债券，中国的银行也开始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发行绿色债券。例如，2017 年底，中国工商银行在卢森堡发行了 21.5 亿美元的“一带一路”绿色气候债券，其收益用于资助可再生能源、低碳出行和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等领域。

这项工作已经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40%的受访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实现全球气候变化承诺（见图 8）。一家来自加勒比地区的中央银行表示：“这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确目标，但外部反馈可能是积极的。”但大多数人（60%）认为，目前情况并非如此。中东地区的一家中央银行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项目将会造成更多气候问题，预计该倡议不会有助于实现全球气候变化目标。

中国为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燃煤发电厂提供了资金援助。由于此类工厂污染严重，这些国家很难从多边贷款机构获得建设资金，反映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窘境。巴基斯坦拥有大量煤炭资源，但没有天然气资源；煤炭不需要进口，但通常人们都认为燃煤发电站不如燃气站那样环保。如果政府获得资金用以建设燃气发电站，就不得不进口天然气，进一步增加财政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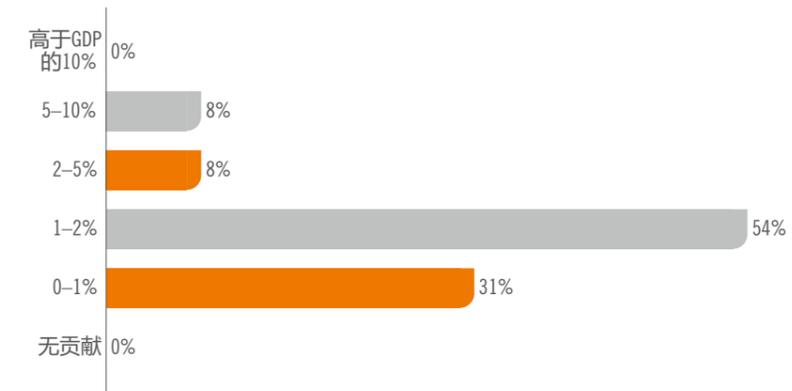
受访者认为，关注可持续和绿色发展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要。23%的受访者表示“非常重要”；39%表示“重要但不必要”；余下 38%则认为“不是非常重要”或“不相关”（见图 8A）。

9. 在提升科技实力方面，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起到多大作用？



一位受访者未回复

10. 在未来五年内，您认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将会对中国 GDP 产生多大的贡献？



两位受访者未回复

11. 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哪些方面亟待完善？（请用 1-5 为以下选项排序，1 为最高）

	1	2	3	4	5
项目筛选	8%	31%	0%	54%	8%
管理透明度	31%	15%	15%	15%	31%
道德规范	8%	8%	46%	15%	23%
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或者区域战略项目结合	23%	46%	15%	15%	0%
发展银行提供的资金及项目管理支持	31%	0%	31%	0%	38%

两位受访者未回复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对提升本国科技实力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受访者看法不一。14%的受访者认为“非常重要”；36%认为“重要但不必要”；21%认为“不太重要”；29%表示“（目前）不相关”（见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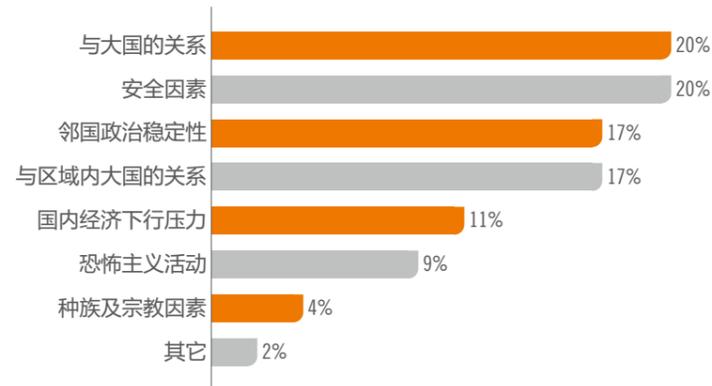
促进 GDP 增长

所有受访者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在未来五年内推动中国 GDP 增长。70%的受访者预计增长将超过 1%，大多数预计增幅在 1-2%之间。但也有 8%的受访者预计 GDP 将上升 2-5%，还有 8%的受访者预计增幅将高达 5-10%（见图 10）。

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最应该改善的是“监管透明度”和“发展银行提供的资金及项目管理支持”；其次是“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或者区域战略项目结合”；选择“道德规范”和“项目筛选”的受访者相对较少。而去年“道德规范”和“透明度”两项的选择得分非常高（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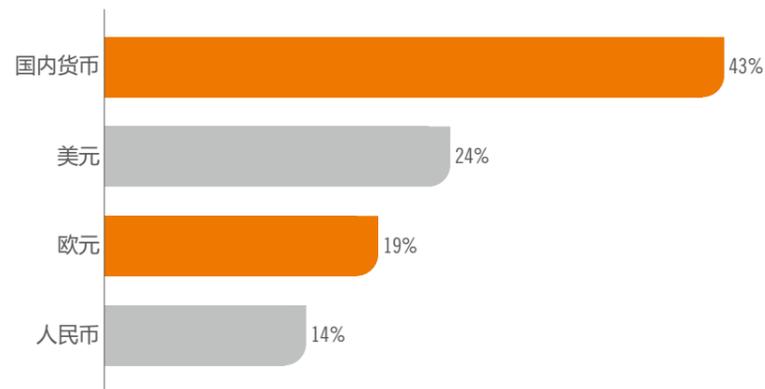
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20%的受访者选择“与大国的关系”，17%选择“与区域内大国的关系”，17%选择“安全因素（战争、武装冲突等）”；对恐怖主义活动、种族及宗教因素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忧相对有限（见图 12）。

12. 在您看来，目前“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可多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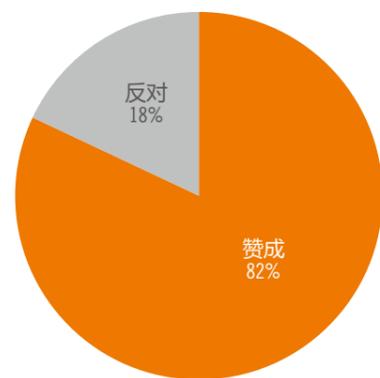
一位受访者未回复

13. 您建议“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融资使用哪种货币？（可多选）



一位受访者未回复

14. 如果建立多币种的本币清算和支付体系，您所在的中央银行持什么态度？



四位受访者未回复

融资货币

无论受访者所处的国家地理位置如何，超过43%的受访者认为用本币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供融资最为理想（见图13）。

一家来自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认为，使用本币融资将减少承包商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中发生货币错配的可能性。

而且，非洲的一家中央银行认为，本国货币贷款可消除外汇风险，降低违约风险。

其他中央银行对外汇融资的可行性提出了一些建议。如欧洲的一家中央银行指出：“如果能以贸易收入的形式，自然进行某种对冲，那么也许可行。”非洲的另一家主要中央银行指出：“鉴于在某些情况下，‘一带一路’项目将由国际公司承担，可能需要以国际货币付款。”

在外币融资方面，美元最受青睐，支持率达24%；其次是欧元（19%）和人民币（14%）。

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倡议建立一个多币种的本币支付和结算的系统，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支持；只有18%的受访者对此表示反对。

此外，如果能建成这种多币种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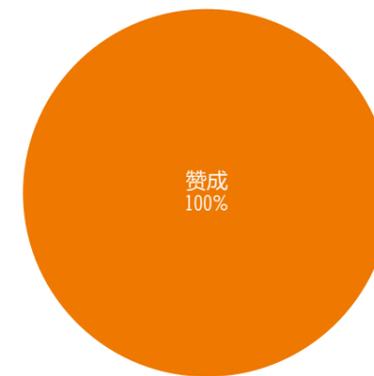
系，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愿意开放本地货币业务（见图14和14A）。

一家大型中央银行表示：“支付系统是成功落实‘一带一路’项目的关键。我们非常重视本币业务；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市场存在对多种货币支付的需求。”

非洲的一家中央银行进一步提出：“使用多种货币进行支付将有助于促进贸易，中央银行将对此给予支持。然而，中央银行提供的支持是有限的，希望银行能够在彼此之间（或与其它在其他国家的分行）以某种货币结算任何多头/空头头寸，而不必寻求中央银行的帮助。”



14A. 如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多币种清算支付体系，贵国是否支持开放本币业务？



四位受访者未回复

15. 为避免开放本币业务带来的金融风险溢出效应，贵国会采取什么措施？（请将下列选项用1-3排序，1为最重要）

	1	2	3
开放本币业务，享受国民待遇，实行总额控制	18%	63%	18%
仅开放与贸易相关的本币业务	55%	27%	18%
开放部分资本项目业务（如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实行总额控制	27%	9%	63%

为了避免本币业务“开放”导致的金融风险溢出效应，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首要采取的措施是“仅开放与贸易相关的本币业务”；另有27%的受访者将其列为第二选择。其它策略包括“开放部分资本项目业务（如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实行总额控制”（首选占27%、次选占9%、末选占63%），和“开放本币业务，享受国民待遇，实行总额控制”（首选占18%、次选占63%、末选占18%）（见图15）。

2018 “一带一路”调查回顾

2018年，IFF联合中央银行首次开展“一带一路”倡议调查。来自全球25家央行参与了调查，并认为“一带一路”将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成员国之间需要更有效的协调，以充分发挥该倡议的潜力。

2019年的调查显示，协调的齿轮开始转动。在传统全球化开始瓦解的环境下，“一带一路”将开始蓬勃发展。●

1. 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list.jsp?cat_id=10037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口信贷指南》, 2018年8月, <https://bit.ly/2uc6DEZ>
3. 《习近平:推动中马“一带一路”建设合作》, 环球时报, 2018年8月, <https://bit.ly/2Oa6Phh>

“一带一路”倡议 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孙时联报道，第十五届全球年会的嘉宾普遍认为，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财富差距。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新挑战层出不穷，建立全球治理新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

近年来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思潮泛起，新的全球风险凸显，世界经济增长及全球化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努力，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赞许和参与。

全球化处于变革的关键节点：前进 VS 倒退

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昔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动力已成为主要阻力和威胁。IFF 理事、菲律宾众议院众议长、前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说，以 1944 年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开端，特别是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全球化进程迅猛推进，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格局。但过去几年，美国和部分欧洲地区出现了新兴的反全球化和反开放的情绪，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一些悲观主义者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结束。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原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Han Seung-soo）认为究其原因，过去的全球化无论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都对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益处，但这种益处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不仅体现在各个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各国内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基础并不稳固，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加剧，导致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

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 D'Alema）补充到，尽管过去的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增长，但同时加剧了不平等，经济财富的集中越来越加剧，发达国家企业搬去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导致其内部工人利益受损。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创建传统全球化规则的发达经济体实力相对下降，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80%，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 40% 左右。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着全球化倒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女士表示，因为贸易摩擦，以及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质疑，让全球经济受到了众多威胁。

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说，当前全球处于一个很特别的时刻，过去的机制已经失灵，但新的框架、新的秩序还未到来，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需要决定是要一个开放的、有规则的环境，还是要一个狭窄的、封闭的环境。这种不确定性催生了企业界和投资界的疑虑，这也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巨大风险。

IFF 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谈到，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危害在 2018 年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不仅危害了多年来形成的全球供应链，还冲击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使其面临停摆威胁。

走向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渐成趋势

IFF 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Shaukat Aziz）谈到，尽管各国内部目标存在差异，但都要通过合作，而不是拆台来实现共同进步。世界已经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日益增多，人类要走向繁荣必须拥抱全球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有更多的竞争，更高的生产力，更活跃的创新动力。”阿齐兹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走向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渐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去全球化的过程越长，带来的损害就会越大。韩升洙呼吁，各国领导人需要重新找到智慧和勇气，来扭转倒退进程。慕尼黑需要有新的多边主义，全球需要各国领导人之间更多的合作。



美国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主席特别顾问哈利·赛亚丁（Harley Seyedin）表示，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企业所受的损失比中国企业大，而且贸易摩擦对双方肯定都是没好处的，双方应该通过合作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发起或进一步扩大贸易战。

全球化有其后面的动因和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不是因为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导致的。巴罗佐表示，尽管欧洲有些人不愿意进一步全球化，但欧洲总体上不愿意看到全球化倒退，世界再退回冷战时期对欧洲不好，对人类都不好。全球需要顶层设计和机制框架。“建立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并尊重和执行的治理框架是必须的”，巴罗佐强调。他还认为，应该支持联合国、世贸组织（WTO）等所有多边机构发挥作用，建立包括交通、能源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并促进互联互通，让世界连接得更加紧密。“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不能忘记帮助和支持那些欠发达国家”，巴罗佐说。

IFF 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认为，与传统的全球化相比，当前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包括新兴市场出现，与投资相关的储蓄从过去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转向储蓄率高的新兴市场和亚洲国家，技术进步促进信息流动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及制度逐渐有所改进，以及联手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必须内容。在旧有的全球化基础上，新型全球化重点可能发生一些转移，开辟新的领域，也逐渐创造新的规则，形成新的共识。新型全球化最根本的出发点是经济中的合作、交流、互补，体现的是贸易与投资活动。同时它也面向于全球共同富裕，通过全球之间的资源配置的优化，通过分工合作，使得各国都能够受益。特别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收益，使全球的发展更加平衡、更加美好、更加强劲有力。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越来

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具体行动参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经同 1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已经落地生根。

周小川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新型全球化规则制定。“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全球化范围、重点发生变化，这将促进相关规则制定，不过当前还处于初始阶段，未来可能会在 WTO 改革和其他多边机构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加强。

阿齐兹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球合作标准，我希望这个标准能够获得世界各国的采纳。巴基斯坦已经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益，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项目开展。巴基斯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阿什法克·汗（Ashfaq Hasan Khan）谈到，中国哲学说，一方的繁荣要靠邻里的繁荣，不能剥夺别人，让别人贫穷自己繁荣，“一带一路”就是与人为善、共同繁荣。

阿罗约谈到，“一带一路”建设为新型全球化提供硬件基础。新型全球化不仅需要软件，即一个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繁荣的框架，还需要支撑贸易和投资繁荣的基础设施“硬件”，这正好是一带一路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中国的成功不是西方模式，而是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全球化将会更加包容，不会由西方一方主导，“一带一路”可以理解为全球化 2020。

尼日利亚驻广州总领事沙基卢·阿德瓦勒·欧洛卡（Shakirudeen Adewale Oloko）说，“一带一路”对尼日利亚和非洲来说，是一种发展战略，希望在传统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加剧问题上带来突破，以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实现共享繁荣和普惠的全球化。不过欧洲非常分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为一些国家提供投资机会、赢得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有担心中国可能会借此加强在欧洲的影响力，影响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的平衡。●

沿着“一带一路”追随先人的步伐

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马 (Massimo D'Alema) 认为先人马可·波罗虽然历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才从中国返回欧洲，但此举促进了沿线的合作与融合。



自 习主席在 2013 年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经过去六年时间。这项倡议正在改变全球现状，也推动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

2017 年 5 月，来自 140 个国家和 80 个国际组织的高级代表出席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与 80 个政府和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显然，这一倡议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并使地缘政治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吸引了支持者和受益者，也涌现了许多怀疑者和反对者。

其中，反对者就包括美国政府，他们对中国敌意显而易见，特朗普总统视中国为对手，希望通过关税战阻止中国的扩张。

各国的利益冲突

欧洲对“一带一路”意见不一，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对于如此多的欧洲国家来说，中国的倡议提供了一个吸引投资和鼓励就业增长的机会。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借此巩固其在欧洲的地位，并逐渐改变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平衡，朝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表示，“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欧洲就像一个亚洲半岛”，她的话也证实了一部分人的担忧。

几个月前，一份抨击新丝绸之路的文件在欧洲驻北京大

使中传阅，这份文件的内容有着很大的问题。它宣称该项目与欧洲自由贸易议程相冲突，并且会打破现有平衡，权力的天平将向受国家补贴支持的中国企业倾斜。

换言之，欧洲，至少部分欧洲人，担心与中国的合作可能主要对中国有利，这种忧虑主要源于双方监管方法和市场开放程度的不同导致。有转机的是，由于美国的打压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欧盟，2018 年 7 月的中欧峰会见证了中欧关系的改善。

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增长，全球 GDP 从 2000 年的 50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35 万亿美元，几乎翻了三倍；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3 年预计上升到 177 万亿美元。²

然而，可观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所有国家获利。在这一进程中，一些国家，像中国一样，已经成功挖掘自己经济潜力。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进步，如脱贫和中产阶级规模扩大。

与此同时，全球化带给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是不平等的。对于人口中少数的金融和教育精英来说，全球化为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从人口最富裕阶层总收入份额增加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社会中，

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对大多数人来说，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加重了对他们劳动的剥削。

2016 年，欧盟中面临贫困或社会边缘化的人口比例为 23.5%；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欧盟有 1.18 亿人生活在面临贫困或被社会排斥风险的家庭中。³

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即使在经济扩张时期，贫困也在增长。然而，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只有贫困问题。尽管金融财富在不断集中，但劳动力的话语权却被不断削弱。全球竞争将许多工厂和企业吸引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这些地方的劳动待遇远低于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习以为常的劳动待遇。这样不仅限制了工资的增长，对失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工人的权利和保障减少。

与此同时，公共预算越来越难以支持福利和养老金制度的成本，部分原因是曾经允许收入分配的累进税制，很大程度已经被全球资本自由流通所破坏。

因此，正是恐惧和痛苦向社会最脆弱的部分蔓延，才使得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力量获得成功，这种力量违背了原本边境开放的原则，不仅破坏了对移民的正常管制，也破坏了外国商品的正常流通。

一些理论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占据了欧洲政治舞台，而现在斗争的中心则是全球主义者和主权主义者，这预示着欧洲大陆政治平衡的转变，这可能导致严重的倒退。激进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是解决办法，相反，它们意味着严重冲突的风险加剧，社会问题也会随之恶化。

然而，即使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也不能低估目前正在发酵的厌恶情绪。自 2008 年起，不受监管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逻辑行不通了，我们需要采取政治行动来引导世界体系走向更和谐的全球化。虽然保护主义和自私的民族主义并不能为我们提供解决之道，但我们确实也需要制定合理的政治方针和增长方式，保护社会最弱势群体，而不是把一切都交给市场力量调控，这才是答案中的应有之义。

如果有人认为，在这样一个冲突交织的情况下设定这些目标，可能太过雄心勃勃而且相当不现实。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可行的战略，能够从最有远见和最负责任的参与者开始，让各国携起手来，展开真正的合作。

改善欧中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在欧亚大陆上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非洲也会从中受益。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向世界展示合作精神会取代怀疑和敌意，成为全球化的主旋律。我们肯定可



马西莫·达莱马 (Massimo D'Alema)

以，而且必须克服这些疑虑和不确定性。中国当局做出必要决定的速度越快，这一目标实现的速度就越快。这一倡议的关键词是互惠和合作。欧盟最终将把中欧的伙伴关系视为战略选择，而不是为个别国家单独制订的政策。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所以不能再指望总是享有发展中国家保障和优惠政策。对中国来说，三个方面特别重要：首先，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战略应与欧洲当局达成一致，并与欧盟的发展、战略和优先事项挂钩；第二，中国应当扩大市场开放力度，特别是在服务领域，这或许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在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最后，为消除我们舆论中的偏见和理解，中欧应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加强对话与合作。

想要达成以上三个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从一开始，我就是这项倡议的坚定支持者。马可·波罗是在 1271 年和他的父亲尼科洛以及他的叔叔马泰奥一起从威尼斯启航，途径巴勒斯坦、土耳其、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广州之后，来到了“汗八里”（元大都），也就是蒙古语所说的北京。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他会见忽必烈可汗后，又从中国出发，经过马来西亚、印度、阿曼、也门和东非，最终返回了故乡。

恐惧和冲突也曾萦绕着这条漫长的旅程。但是，丝绸之路也带来了和平与发展，这是一项伟大的使命，这项了不起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纵横古今，在这条道路的彼端依然还是欧洲，所以我们必须鼓励欧洲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意大利能够而且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习主席所说，中国和意大利代表着两个古老的文明，几千年来，这两个文明相互了解和尊重。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1. 世界银行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https://bit.ly/2Hc7MFZ>
3. 欧盟委员会数据，2018 年 5 月，<https://bit.ly/2MB1AcS>

“一带一路”下的期货市场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认为，中国应开放期货市场，鼓励外国投资者和“一带一路”国家加大参与力度，协调大宗商品的供应，提高稳定性和效率。



中国大部分大宗商品贸易都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沿线国家增长活力强，发展潜力大，这是中国和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的基础条件。2017年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约1.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39.9%。中国有3个商品期货交易所，目前已上市50多个品种，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密切的品种。

基础设施对期货物流意义重大

期货最后要交割成为现货，交通运输非常重要。交通运输不便，就可能导致交易市场上的逼仓行为发生。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当中，企业出去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了很多的合作，基础设施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货物能够顺畅流通。大宗商品贸易的物流成本降下来，对今后利用期货市场这种连接的平台，深入地融合“一带一路”国家发挥重要作用。银行贷的款是点到点，是这个钱贷到哪个企业，哪个企业产生的效益解决了当地的发展，解决了当地的就业，但是期货市场的交易是各种信息汇聚到这儿，他天天都在这

儿交易，天天通过观看价格变化和套期保值，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了解世界的各种变化，这必然拉近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距离，增进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可以促进我们的互联互通，实现共享共赢，这对我们紧密联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等基础设施建设，商品贸易的物流成本会大幅降低，当地经济会大发展。它们和中国的连接越多，经济贸易就越越广泛，商品期货市场则是信息传播最迅速，辐射最广，粘性最强的大平台，使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结合效益能够达到互利共赢。

笔者认为有四类期货市场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合作。

第一类：是中国和沿线国家都已经建立了期货市场，并且已经上市了相关商品期货的国家的类型。他们的现货贸易和中国来往非常密切的，有22个期货产品，包括棕榈油、白银、燃料油、天然橡胶、棉花、棉纱等等，这些对我们的影响都非常大。我们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尤其和沿海的一些国家已有初步合作。如果通过这个期货交易结算平台找到双方都

有共同的产品来进行合作的话，通过10年、20年或者更长期的融合，我觉得它可以随着企业的投资和生产、银行贷款、保险跟进，一定能够更好地协调我们在“一带一路”上的各种资源，并提高安全性和使用率。

第二类：是在中国期货市场已经上市的商品，且现货贸易往来也比较密切，但是尚未在沿线国家期货市场上市的类型。可以通过和当地的交易所共同合作，推动开发相关产品，促进品种间进行呼应，或者直接到当地吸引投资者参与中国的市场。

第三类：是在中国的期货市场上市，但是在沿线国家还没有期货市场的类型。像原油在中东就只有迪拜商品交易所。虽然沙特输出原油在中东占比最多，但它没有建立自己的期货交易所。迪拜是和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合资的，我们对原油依赖非常强，进口量占需求的约60%。如果我们的市场比较成功了，吸引大量的投资者来了，对中国和中东双方都是个好事情。

第四类：是在沿线国家期货市场有商品期货交易，但中国期货市场还没有上市的类型。可以研究这类商品的各种合作可能性。

以上4种类型是有合作空间的。由于我们的期货市场对世界的开放度不够，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还比较少，因此，中国期货市场还不能成为全球商品的定价基准和全球经济体管理风险的中心。在诸原因中，开放度是重要的一个因素，可从3个方面来解决开放度问题。

搭建法律框架

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期货市场，非常重视法律制度。但目前中国还没有《期货法》，这是影响对外开放最重要的因素。上海原油期货上市以后，我和业界人士及终端客户交谈，他们说要扩大开放度，让上海原油期货真正走向国际，在定价上面为全球接受，必须加快出台《期货法》。如果有一部《期货法》，外国投资者遇到纠纷，可以通过法律解决，增强他们参与市场的信心。其实不仅仅是原油期货，铁矿石、钢、橡胶等许多大宗商品，境外投资者都有参与的意愿，但因期货法迟迟不出台，导致许多境外投资者观望驻足，徘徊不前。如果法律颁布了，大的金融机构来了，终端客户来了，这个市场定价的稳定性就好了，套期保值功能强了，国际上才会利用你这个价格作为贸易中的定价基准。当你的价格在国际贸易当中得到广泛使用，你又是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结算，那人家长期持有人民币的欲望也就增强了，许多国家和企业在全世界购买石油资产，人民币就用得上了，人家就有储藏人民币需求了，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就有一类规模很大的大宗的商



姜洋

品来作为它的购买对象。但是如果这个商品没有走向国际化，人家是不会长期持有人民币的。没有《期货法》，中国的大宗商品在国际上的定价影响力是很难形成的。这对国家经济安全是不利的。

对期货市场开放不了解的人有害怕风险的心理，担心境外金融风险的引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人认为金融衍生品危害太大，尤其要限制外国人进来和中国人走出去交易衍生品。其实那次危机是场外衍生品市场出事，期货市场安全无虞。2009年G20首脑峰会还表扬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能力。目前中国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国际金融组织两次对中国期货市场的风险评估都达标，而对中国的风险控制机制、“穿透式”监管方式都给予高度评价，并向其他国家推荐。中国期货市场已有能力控制住境外参与者进来交易的风险。目前，原油期货开放了，铁矿石开放了，特惠贸易区（PTA）开放了。开放以后的这几个月时间，我们可看出来基本上没什么大的问题。我们有比较完善的风险防范、监测监控机制，多年来在控制风险和发现操纵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实践中运行良好，效果显著。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经受住了国外传递过来的风险考验。

政策

希望有关部门在政策上统筹考虑，放宽外国投资者参与中国市场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外汇政策、海关政策等等。

企业

走出去的企业应该综合利用股指期货市场在内的多种金融工具。我们的产业出去以后不能仅用现货静态思维去管理企业的风险，而要从动态发展的眼光管理风险。●

中国倡议的新型全球化

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马儒沛认为，全球化趋势依然不可逆，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周边国家正在打造新一轮更加平等的全球增长和合作。



马儒沛

2016年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3届全球年会上，联合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的力量，邀请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前政要、专家学者、经济金融机构和全球领袖共同倡议和发起了丝路国际联盟。丝路国际联盟的成立对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注入新的活力，增添新的动力。

两年多来，丝路国际联盟积极开展务实合作，重点打造金融优势，影响力与日俱增。世界经济增长及全球化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丝路国际联盟何去何从，使命担当尤其重要，我想应该任重道远。

20世纪后半期，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快速发展，和价值链理论的广泛传播，经济全球化呈现出爆发式发展，主要表现为贸易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以及劳务的全球化。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意义在于，建立了高效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国际利益融合，加快了世界多级化发展的趋势，促进了国际组织发展，重塑了全球治理体系。

然而，这一传统的经济全球化也存在弊端。主要是利益分配不平衡，一些发达国家主导了传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然而又没有很好地处理一国主权与全球公共利益的关系。尤

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放缓，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

在美国优先思想的影响下，贸易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缺少全球经济制度和政治秩序的顶层设计。逆全球化虽然带有地域性、周期性和阶段性特点，但是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虽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我坚信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

同时，很高兴看到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的影响正在逐步的扩大。如亚太地区拥有谋求发展的强烈愿望，顺应了各国人民携手应对挑战的共同需要，坚持开放与合作，已成为全球最具有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多边贸易体制为各国带来共同的机遇。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事实证明，坚持走新型全球化之路是正确的选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新型全球化的推动做出了贡献，从而使新全球化的特征初见端倪。我认为，这就是坚持平等合作，实现各国利益互利共赢；坚持与时俱进，提高全球贸易投资的包容度；坚持创新驱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坚持平衡发展，塑造多元货币格局；坚持包容开放，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新全球化未来之路对丝路国际联盟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我从具体工作层面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丝路国际联盟要抓住绿色、普惠、诚信三大重点，发挥金融资本雄厚、技术通道先进、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等特点，为推动新全球化出力献策。为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监管与协调的全球化践行正能量，产生正效应，闯出正路子，总结好经验。

第二，丝路国际联盟要抓住产业、贸易、基础设施三大领域，引导和影响国际金融机构。按照五通原则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输入金融血液，增添金融动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沿线国家在多边交流中秉承和平友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充分表现出强烈的发展愿望。

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但是该地区交通不够便利，自然环境较差，经济发展水平与两端经济圈存在较大的差距，整个区域存在两边高、中间低的现象。

如何助推丝路经济带健康持续发展？我认为，丝路国际联盟要充分彰显金融优势的先导作用，要用好金融杠杆，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健康发展。特别是针对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引发国际产业格局和经贸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金融资本应该在新旧动能相互转换的市场大海中，找到用武之地。

要用金融的力量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当务之急，丝路国际联盟应积极鼓励、全面影响和大力支持国际金融机构，加大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产业、贸易和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加大与金融合作，加快货币流通，加快域内本币结算，推进货币互换，在推进项目对接上再下工夫；推动域内产业、贸易、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上深下功夫；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三部曲上重下功夫。

第三，丝路国际联盟要以深度融合为先，引导影响国际机构，为丝绸之路经济社会发展增添金融资本含金量，增加金融杠杆的撬动力，增强金融手段创新能力。

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是面对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技术创新使地球变小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追求利益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地区、行业之间的繁荣与衰落对比鲜明，资本和国界矛盾凸显，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滞后于经济全球化进程，跟不上科技发展的问題，略显突出。

我们必须回答，如何在域内建立科学完备、包容公正的金融环境的问题；如何在域内加强金融制度体系化问题；如何在域内创新金融服务产品的问题；如何在域内制定金融安全法律法规的问题；如何通过金融助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创造平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解决好上述问题，就能把握好金融的规律，发挥好金融的活力，运用好金融的动力，服务好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第四，丝路国际联盟要以人才资源为先行，抓住华侨、华人、海外留学生三大资源，引导和影响国际金融机构，在

金融企业服务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助力产业转型升级，金融业态催生经济质量提升上，发挥好三大资源不可或缺积极作用。

华侨、华人、海外留学生是中国独特重要的人才资源优势。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海外华侨华人超过5千万，分布五大洲198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有四千多万。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

这三大资源具有很大的能量和优势，他们熟悉驻在国国情，对驻在国资源禀赋、法律法规、人文历史、经济社会发展都比较了解，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发挥重要的作用。

拥有广泛的政商人脉，拥有驻在国良好的沟通渠道，拥有良好的产业实力和社会网络，拥有民间优势，这一群体的重要作用一旦得到最大化发挥，产生的正能量不能低估。其可以为金融疏通，连接实体经济的经络，为金融反馈投融资状况的社情民意，为金融探寻产品项目落地生根的渠道，为金融创造财富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为金融服务丝路经济，发挥人才智库作用。

第五，丝路国际联盟要以创新开放为先机，抓住三大变革。这三大变革就是新全球化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开放的胸怀、创新的姿态，组织引导国际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重组、资源整合，开发联合体，始终把握新经济、新业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丝路产业的有效模式，拓展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比较的成功方式。要始终把信用建设、诚信金融摆在国际产能合作的前端，体现以人民为本、以丝路为先的理念，打造更具专业、便利、高效、绿色、一流的金融服务，要始终把激发丝路产业新活力，共创开放共赢新格局作为工作的落脚点。为努力打造更安全、更公平、更繁荣的丝路经济建言献策，贡献丝路智慧、丝路方案，为丝路经济向前迈进注入持久的动力。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刚刚结束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体现了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决策。来自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3617家企业参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意向成交47.2亿美元。中国首届进博会从侧面有力佐证：尽管“一带一路”进程中，还会遇到考验，面临大风大浪的严峻挑战，但是新全球化未来之路必定是前途光明的。●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和“一带一路”金融合作

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罗扬认为，大湾区在加强金融合作、建设强大基础设施、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乃至全球可持续投资等关键领域都将有出色表现。

丝路基金是中国政府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而设立的中长期的开发投资基金，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坚持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运作原则，采取以中长期股权投资为主，配合贷款、基金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注重开展与境内外投资者的合作，和发挥各类资金优势互补的作用，积极拓展投融资合作机会。到目前为止，丝路基金已经签约了 20 多个项目，承诺投资额达 80 余亿美元。所涉及的总投资额是 900 多亿美元。丝路基金资本金是 400 亿美元和 1000 亿人民币。投资目前覆盖了俄罗斯、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以及欧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产能合作、金融合作等领域。未来投资地域可能还要扩大到美洲和非洲更多地区。

“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转型期，需要开发大量对经济发展起支柱作用的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类的大型项目。但是这些国家由于自身资金实力不足、财政投入不足，需要市场提供期限长、金额大、成本合理的资金支持。传统上提供这类融资的大多是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市场上的长期资金来源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出于对资金安全的考虑加上相关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等原因，不愿意或难以为大型项目提供融资，因此需要加强金融合作，鼓励金融创新，更好促进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匹配，支持各国基础性、发展性项目的开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在这方面拥有天然优势，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加强金融合作，发挥多元化优势，搭建多方合作的平台。

发展中国家面临中长期投融资缺口等发展瓶颈，决定了“一带一路”金融合作需要众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通过不同地区各类机构间的多元化合作和优势互补，实现各方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中长期可持



罗扬

续发展的能力。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广东是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拥有大量优质高端的科技制造业企业，可借助在行业内深耕多年的专业化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产业投资人的作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各类金融机构高度集聚，资本市场资金量巨大，金融服务功能强，能够发挥“一带一路”大型项目金融媒介服务和资金池的角色。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沟通和合作的桥梁，有利于资金方更好了解葡语国家的项目，一定程度上为项目提供征信支持。

丝路基金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尝试通过多方合作等方式，为“一带一路”提供投融资支持。2016 年开始，丝路基金就与韩国开发银行、日本开发银行以及亚投行等机构，共同作为有限合伙人（LP），投资了世界银行发起设立的 IFC 亚洲新兴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亚洲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医疗、农业、服务业等行业。目前，该基金已投资位于孟加拉、印度、缅甸等国的若干项目。这支基金积极践行多方合作理念，将中、日、韩三国的资金引入到第三方市场，为帮助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动力。同时我们与深圳的投资机构、香港金管局、澳门金管局等机构保持良好沟通，积极探索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平

台，希望未来共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好的资金支持。将来如何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机构共同投资海上丝路国家，我相信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除了与日韩官方金融机构合作以外，丝路基金还与欧洲和美国的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也有很好的合作，包括与美国的 GE 公司合作建立了一个联合投资平台，与欧洲投资银行合作了一个投资基金，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

第二，推进金融创新特别是人民币产品的创新，持续完善市场机制。

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等大型项目存在融资缺口的主要原因是项目风险很难得到有效管控和缓释，资金方的收益和风险不匹配。出现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长期投资要求独特，每个项目的特点和交易架构差异较大，导致金融市场较难设计开发标准化的金融工具、中长期股权产品、以及较完善的退出安排机制。丝路基金自从去年获得了 1000 亿人民币增资以后，一直在积极推动人民币海外投资项目的落地。我们也发现，3 年以上的人民币套期保值工具数量有限，成本较高，导致人民币的中长期汇率风险很难被有效对冲，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境外业主接受人民币投资意愿。粤港澳大湾区可充分利用自身地缘制度优势，鼓励金融机构设计有针对性的金融工具和交易架构方案，不断推动金融工具创新，完善市场机制，比如说搭建有利于大型项目融资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框架，提供包括股权、债权及其他金融产品的多元化投融资组合包等，来吸引市场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丝路基金在自身实践中也在不断尝试和探索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以股权为主，债权为辅的产品设计和搭配，为所投资项目注入更多资金。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以 PPP 模式开展相关项目建设，发挥股权投资作用，帮助项目所在国减轻债务负担，提高项目建设运营效率，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三，促进可持续融资，注重绿色金融，提升“一带一路”项目的综合效益。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经济发展的社会和环境效应日益关注，可持续融资也得到越来越投资人认可和推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各国对项目在环境、社会效应的监管日益严格。二是相关研究也表明，大部分项目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与长期财务收益呈现正向相关的关系。由此市场上出现大量将 ESG 作为重要评价因素的投资方，还有以 ESG 为投资主题的影响力投资基金。有关机构的数据表明，目前全球约有 600 支主要关注医疗健康、新能源、教育培训等 ESG 相关领域的基金，管理基金规模约 2000 亿美元。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国际金融业等新经济产业基础，在加强可持续金融发展方面具有优势，应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重视项目的 ESG 表现，引导项目融资方和所在国重视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并提升项目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

丝路基金一直积极践行可持续投资理念，注重评估项目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2015 年丝路基金携手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公司和中国三峡集团，共同投资了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和风电项目，主动对接中巴经济走廊。在这个项目里，IFC 也引入了其在公司治理和项目融资建设方面的国际标准和经验，对该项目的建造、施工和管理进行全流程严格把关，注重履行 ESG 理念和标准，确保该项目建设成为拥有较高综合效益的典范项目。同时对中国企业——也就是三峡集团——提高国际化水平也起到积极作用。丝路基金对此也是积极支持的。目前该项目的风电部分已经建成投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好。

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一是搭建多方合作平台，二是人民币离岸产品的创新，三是绿色金融。我想在这三个方面，大湾区的合作协同促进“海上丝路”的建设是大有可为的。丝路基金也期待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者的合作，共同推进金融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区域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中巴经济走廊不止是双边协议

巴基斯坦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巴基斯坦前财长阿什法克·哈桑·汗（Ashfaq Hasan Khan）认为，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是一个双边协议，更能造福周边国家和整个区域，中国要为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做好准备。

2018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既能回顾我们从这项倡议中学到的东西，也可以畅想未来五年的目标。未来，当我们庆祝“一带一路”十周年时，才能看到这一路克服的困难和以及取得的发展。

近年来，过往的全球化模式饱受诟病。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抬头。这种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极有可能会阻碍全球增长和繁荣。但应该认识到，错不在全球化本身，而是其实施方式导致了世界多地产生逆反情绪。

认识到这一事实，2013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领导人主动提出了新一轮全球化的模式——“一带一路”倡议，一个基于互联互通的全新全球化倡议。

中国哲学中提到，一个国家的繁荣取决于邻国的繁荣与否；身处贫困和匮乏的海洋中无法实现繁荣。“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主要理念，即中国的繁荣将取决于邻国的繁荣——这与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的旧全球化完全不同。

走廊的魅力

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六条走廊之一，不仅是“一带一路”的基石，也是一个旗舰级项目。从名字上可以见得，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项目。巴基斯坦认为该倡议在未来15-20年内，将会让巴基斯坦从中低收入国家转变为高收入国家。中巴经济走廊涵盖面非常广，除能源外，还涵盖了基础设施的关键要素，包括道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通信和经济区域建设。

从地理上看，中国西部一半以上的地区靠近巴基斯坦、阿拉伯海海岸线以及巴基斯坦深水港瓜达尔港。借由该走廊和瓜达尔港从中国西部向世界其它地区运输货物，将缩短80%的距离，并节省75%的时间和70%的成本。由此可见，中巴经济走廊及瓜达尔港意义重大。

如今，瓜达尔港每年吞吐量约100万吨；到2030年，



阿什法克·哈桑·汗（Ashfaq Hasan Khan）

当港口全面运作时，吞吐量将达4至5亿吨。这仅仅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一个港口带来的效益；而该倡议将为整个区域带来的经济活动和效益将难以估量。

中巴经济走廊潜力巨大，能够帮助巴基斯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平衡区域发展：目前，它帮助解决了巴基斯坦的能源危机；未来，通过建立九个经济特区，能够帮助巴基斯坦实现工业化并扩大出口。瓜达尔的发展不仅限于港口，还包括农业、服务业、采矿和采石，辐射整个城市的发展，创造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并将加强区域间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石，中巴经济走廊正逐渐让巴基斯坦见识到其创造巨大利益的潜力。

中巴经济走廊不仅仅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合作框架，也是一项区域性倡议。过去五年，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但在未来五年或十年，中巴经济走廊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区域性倡议。

区域合作的魅力

另一个区域集团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共有11个成员国，包括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框架协议，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则是中亚地区的一项倡议，中国和巴基斯坦也是其成员。因此，这两个合作关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盟关系。

同时，这两者的功能也有所重叠。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也在通过运输、贸易便利化、能源和能源贸易政策等方面促进区域合作。因此，我们可以将中亚地区各国也纳入中巴经济走廊的框架，阿富汗尤其关键，鉴于阿富汗不仅是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邻国，也同样是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员。

中巴经济走廊可以扩展到阿富汗。这取决于阿富汗自身的发展意愿，但合作潜力巨大。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面向阿富汗领土，而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如果阿富汗加入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和卡拉奇港完全可以为阿富汗所用，并且阿富汗到瓜达尔港的距离只有到卡拉奇港的一半，仅450公里，而拥有了这两个港口的阿富汗将受益匪浅。

伊朗同样也可能会加入中巴经济走廊，伊朗的领导层已经表示对此感兴趣。目前，伊中双边贸易额约为400亿美元，¹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伊朗计划在未来5-7年内将贸易额翻十倍，增加到6000亿美元。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加入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和查巴哈港可以作为姐妹港口，帮助伊朗在7-8年时间内实现6000亿美元的贸易目标。

如果伊朗加入了，那么土耳其也可以加入。此前，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有一个区域合作框架，当时称为区域合作与发展组织（RCD）；目前，三国的关系良好。此外，中巴经济走廊和瓜达尔港也同样能为俄罗斯所用。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必须为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做好准备。中国的货币将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并且中国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主动行动，与全球近22个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

未来十年内，如果世界经济进入多重储备货币体系，美元仍将是储备货币之一，但人民币会成为最大储备货币。新的形势显然需要新的全球金融架构支撑。由于经济规模将继续增长，亚洲势必引领世界经济，建立区域性金融机制迫在眉睫。

目前，如果发展中国家面临支付困难，他们会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即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发展，许多国家已经加入该倡议，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适时建立一个区域性货币体系，可以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世界经济正在迅速扩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以独自扛起大任，可能无法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公平对待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区域性组织。可以看到，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之一的世界银行诞生后，1967年，亚洲开发银行诞生；2016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这些银行或机构的建立都反映了世界各国的需要。当初，世界银行无法支持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议程，亚洲开发银行开始登上舞台；而现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将发挥作用。

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需要区域性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补充，共同努力维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也许五年后庆祝“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时，我们能看到区域性货币基金组织的诞生，并且有更多国家作为成员加入。●

1. Financial Tribune 报道，2018年9月，<https://bit.ly/2QN2HDq>

团结合作 共同发展

许多毗邻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都希望参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五名驻扎在广州这一国际城市的外交官与 IFF 国际金融论坛副主席分享了他们各自参与这一重大项目的看法，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展望。



苏丹·本·纳赛尔·阿尔·苏瓦迪
Sultan Bin Nasser Al Suwaidi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
阿联酋前中央银行行长

“一带一路”将不仅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将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包容性，这也是阿联酋中央银行的专长领域之一。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中亚国家，必须为金融基础设施打好地基，便利资本流动。金融服务尤其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监管、执行以及开放。与此同时，还需要各个参与国家都设有明确和透明的法规和管理机构。法规必须要求在国内有相应的担保人，否则法规将毫无用处。各国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为国内外投资者解决监管问题。但仅靠监管是不够的，实施过程更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大量资金的消失，是因为没有安全的金融基础设施来接收和投资，外国投资者也无法将资金汇回本国，收回利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必须建立相关机制以缓解此问题，这是先决条件。

金融服务的开放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 ※ 为单位信托或共同基金的发行和批准建立机制，尤其是指为小企业提供融资的资金。
- ※ 为有想法但融资渠道有限的公司提供风险投资资本。
- ※ 发展本地债券市场。市场随时为企业服务——当出现危机时，人们需要从当地债券市场筹集资金。在没有能力发行本国债券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继续维持运转，但将难以进行扩张，对各国来说，也将很难减轻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沙基卢登·阿德瓦勒·欧洛卡
Shakirudeen Adewale Oloko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

2018年9月，尼日利亚正式签署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协议，但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尼日利亚以及整个非洲都认识到，他们可以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巨大利益。40年前，中国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改革开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迅猛发展，使人们摆脱了贫困，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才被视为一项发展战略。

在尼日利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的铁路是由中国公司修建的。它将进一步向北和南延伸，并与东西线连接起来。“一带一路”还投资建设拉各斯至阿布贾之间的公路设施和基础设施。电力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德·布哈里于2018年9月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谈。中国进出口银行也正在研究为计划中的曼比拉水电项目提供财政支持，使其能够向尼日利亚提供电力。

然而，哪里有赞赏哪里就有怀疑。“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带来的资金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舆论热点并引起专家广泛讨论，有舆论认为“一带一路”可能导致债务陷阱。在非洲，全球化一直备受争议，其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非洲需要的是贸易而不是援助。只有全面参与全球体系，才能谈发展。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是常态，但或许“一带一路”将在解决全球化相关问题上走得更远。

目前，尼日利亚认为，“一带一路”能够带来经济发展，尤其是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的发展、更好的民生保障、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减轻贫困。“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可以为

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还可以让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中国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决策者也应意识到要将引进到非洲的技术本地化，为非洲提供就业机会。当非洲人民看到他们的生活、收入和前景得到改善时，他们会更加支持“一带一路”。

更加至关重要，接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国家要估算好本国的偿还能力，而不是赌上虚无缥缈的未来。国际资本只会流向有回报的地方。我们应该认同共同发展，共同增长，没有人会掉队——这才是真正的进步。去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其他国家将向中国出口产品，并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失衡。各国在走上发展道路时，不以外汇还债。在“一带一路”建设五年之际，回顾取得的成就，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有必要。未来，在庆祝“一带一路”建设十周年时，我们将不会停留在推介阶段，或是听到指责，看到的将是对“一带一路”发展成就和积极成果的庆贺。



亚当·尤素福
Adam Yousif
苏丹共和国
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为所有参与国带来和平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为应对当前严重危机和经济断层，“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可选方案。“一带一路”是在引入合作而非冲突，倡导尊重而非侵略性的竞争，提倡开放而非内敛。“一带一路”建设还带来了文化合作，这对凝聚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为某一国家而建，而是为各国创造共赢。中国有古语正巧反映了这种关系：一荣俱荣。

苏丹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从北向西，苏丹是亚洲通往非洲的门户；往东，面临红海。在某种程度上，苏丹连接了非洲东北部和欧洲。在非洲，我们对“一带一路”建设寄予厚望和重视，相信它将推动我们实现更大的发展。2018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取得成功，为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落实“一带一路”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

债务问题是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议题之一。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尽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债务问题有所不同，但都应尽量避免。非洲债务的原因更为明显。我们要以史为鉴，以全面合作的精神构建新的经济关系。为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功，我们需要继续探讨解决债务问题及其隐患，并汲取经验教训。



马克萨特·伊申别科维奇·坚季米舍夫
Maksat Ishenbekovich Tentimishov
吉尔吉斯斯坦
时任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

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友好关系。古丝绸之路的三个分支穿过当今的吉尔吉斯斯坦，这不仅促进了贸易，而且促进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积极交流。中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苏亚布古城，是吉中历史文化纽带的象征之一。

吉中两国是好邻居、好战略伙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 (Sooronbay Jeenbekov) 成功访华，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热恩别科夫总统共同规划了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同时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每年会晤一次，讨论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之一，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外国投资者。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基础设施、能源和矿业等领域的众多项目提供了资金。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贷款机构，也是许多发展融资的来源；目前的融资项目包括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天然气管道、一条南北公路以及首都比什凯克的道路建设和维修。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是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首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提出的。吉方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原因显而易见。“一带一路”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巨大和急需的经济发展机会。我们相信，中国领导人推进地区一体化的意愿将对吉尔吉斯斯坦产生重要影响。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中国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金融体系，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丰富的资源，是进一步开展互利合作的良好基础。吉方愿同中方加强务实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在北京举行的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捷别科夫总统指出，将光纤通信线路从中国扩展到欧洲，壮大吉尔吉斯斯坦的电子商务和物流中心十分重要。“一带一路”

意图连接亚欧非和中东的交通物流系统，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希望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将进一步发展中国和东亚的贸易关系，这些都包含在“一带一路”框架中。吉尔吉斯斯坦高度重视这一项目，并着力推动其发展。

建设水电站和生产清洁能源是吉中“一带一路”合作的一个极具前景的领域。吉尔吉斯斯坦拥有巨大的水电潜力，每年可发电 1500 亿千瓦时。目前，其水电潜力只开发了 10%。但在未来，面临电力短缺的巴基斯坦可能会成为一个大进口国。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及其邻国正在开发数百个向巴基斯坦出口电力的项目。吉尔吉斯斯坦与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正在建立输电网络。该工程预计 2021 年完工，多余的水电将开始向巴基斯坦出口。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将继续寻求中国投资以建设水电站，以满足巴基斯坦的电力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有 600 万居民，但其市场有 1.8 亿人，即欧亚经济联盟的共同市场，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没有关税的自由贸易是该区域的主要优势。一名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商人等于获得了进入欧亚经济联盟共同市场的机会。吉方政府欢迎中国企业到吉投资，充分利用吉尔吉斯斯坦的电力、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满足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总的来说，中吉关系只有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才能更加有效地发展，以造福两国人民。



迪帕克·班贾德
Dipak Banjade
尼泊尔
驻广州总领事馆代理总领事

当今的政治环境很容易受到连锁反应的影响，一个区域的事件可以轻易地影响到其他区域，影响程度之大，大到可以对世界的另一端产生影响。2011 年的突尼斯革命可以说是阿拉伯之春起义的导火索，部分原因在于媒体和互联网迅速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世界日益紧密的联系，意味着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中国已成为了杰出的经济和政治大国。中国的每一步行动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受到

世界各国普遍欢迎。在非亚部分地区，许多人预计，“一带一路”将通过增加对当地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和新技术，点燃本国的增长前景。

尽管目前说成功为时尚早，一些国家也在担心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但“一带一路”的广泛覆盖性正在产生积极影响。许多国家希望从这类举措中受益，这意味着更成熟的全球化是可能的。为什么“一带一路”对尼泊尔如此重要？一国邻国的繁荣可以影响一国自身的繁荣。不发达的尼泊尔地处中国西南边境，希望从中国的成功中获益。但尼泊尔的增长机会有限，因为它地处内陆，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互联互通程度低，货物和服务运输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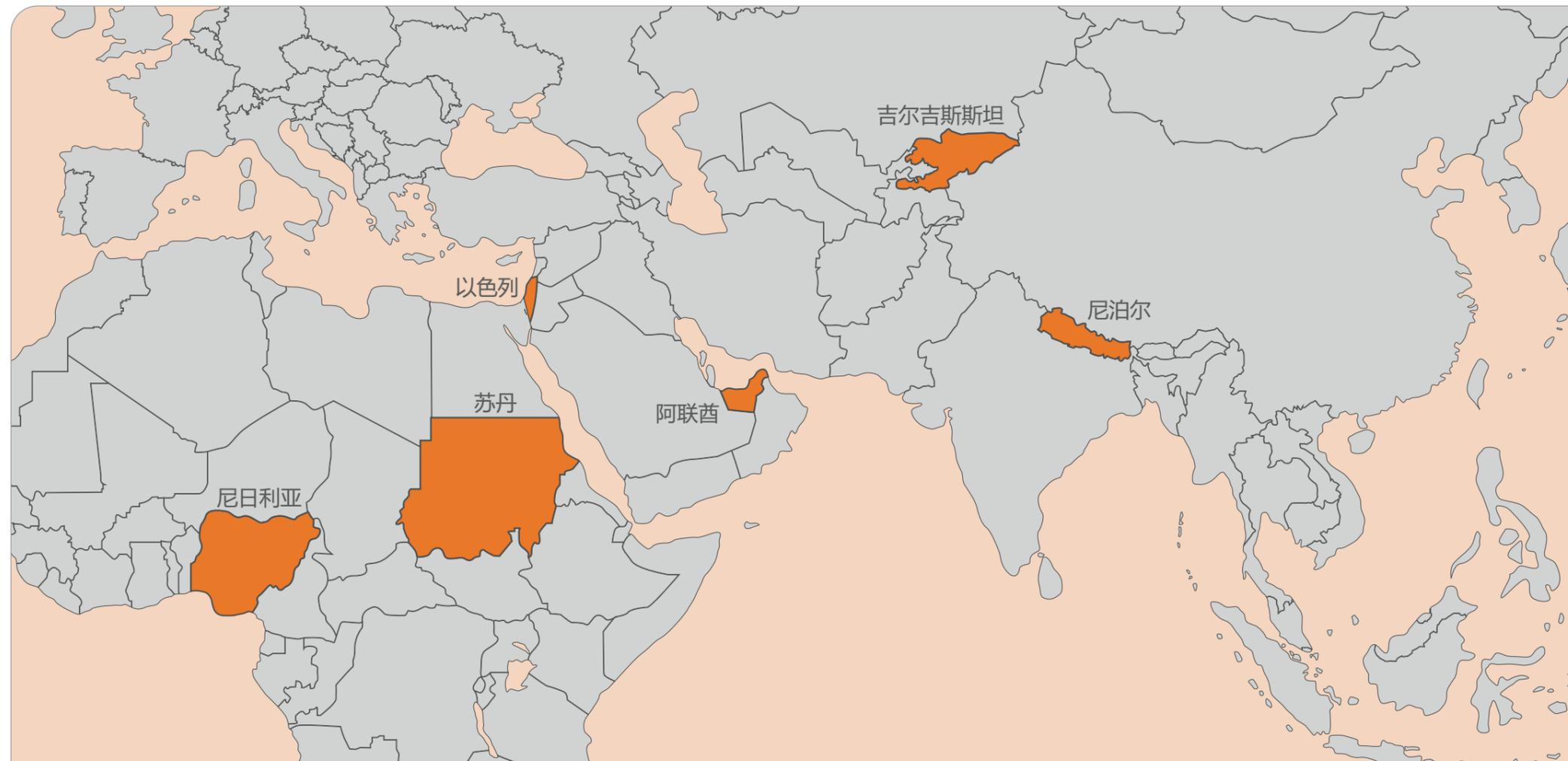
希望“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一个让尼泊尔能够发展的世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目前有许多铁路项目正在进行，我们希望这最终将促进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铁路互通。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中尼两国，而且尼泊尔有可能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桥梁。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够通过尼泊尔促进经济关系，我们也希望能成为该地区一个繁荣的国家。



南安可
Nadav Cohen
以色列
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

以色列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一直在改善。今天，以色列与中国在经济合作和高科技创新方面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以色列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接了以色列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公司建造了以色列最大海港海法港的新码头，以及在阿什杜德运营新的北方海港。另外两项基础设施工作是在以色列主要商业城市特拉维夫的轻轨系统建设。在此基础上，以色列政府已邀请中国政府扩大与以色列合作的项目数量。“一带一路”是一个关于未来 30 年或 50 年的愿景，因此前 5 年只是第一个阶段，虽然不完美，但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以中两国可以开展更多符合两国利益的双边项目。此外，以色列认为，两国可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国家开展三边项目。以色列独立 70 年来，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项目和与邻国的区域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色列可以为即将到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宝贵贡献。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永久会址
暨南沙国际金融岛

鱼跃明珠湾 星耀南沙城

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金融合作示范区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战略合作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合作示范区 / 一带一路核心节点 /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深化金融改革、 发展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



进一步融入世界： 中国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孙时联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改革的步伐永不停止。

在全球化处于变革的关键节点，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之际，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围绕改革无止境，开放无穷期，中国正融入世界这一议题，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5届全球年会的与会嘉宾在年会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峰会”上，对此展开讨论。

融入世界

IFF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表示，中国融入世界，连续四年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30%。¹对于中国而言，改革无止境，开放无穷期，融入世界，永远是一个进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IFF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40年来，中国经济的规模，从1978年的2684亿美元发展到2017年的12.34万亿美元，增长约15倍之多。中国的外汇储备1978年只有1.67亿美元，今天超过了3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20美元，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8800美元，中国正在向突破人均GDP1万美元前进。中国的经济40年来平均增长在9%以上，中国的变化造福了中国人民，中国的变化也影响了世界。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成功的关键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是中国过去取得成功的关键。IFF理事、菲律宾众议院众议长、前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1970年代中期就曾来到中国，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



孙时联

四十年的进程。阿罗约谈到，过去四十年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不是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未来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阿罗约认为，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就是提高生产力，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最重要的是思想解放。朱光耀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做重要报告，统一全党的意识、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意识，达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共识，“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朱光耀说。

改革奠定了开放的基础，开放也促进了中国国内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处于游离于世界以外的封闭状态，是当时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IFF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说，开放过程强烈冲击了传统的集中计划型政策体系，并引发国内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价格体制改革、增值税改革、出口退税、汇率市场化、开启自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等影响深远的改革。其中，制造业开放让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不少领域正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并且较早参与开放和竞争的大多数行业最终表明都

发展壮大得快、竞争力强。服务业开放体现了与制造业类似的规律，也是通过对外开放引入竞争，推动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并带动国内相关政策改革。

IFF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也谈到，在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的过程中，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经济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中国长期对最贫困国家开展援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IFF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说，“中国追求以市场为主的开放政策，带动了四十年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仅对于中国本身十分重要，而且对全球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关键的。”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围绕着国家发展的总体要求进行，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改革开放前，银行仅是财政的附庸，扮演出纳和会计的角色。在改革开放初期，银行被推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融资主渠道地位。到1991年，小平同志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了，经济就活了”。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把金融的地位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金融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竞争，开放促进发展。周小川表示，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大开放。从全球经验来看，绝大多数金融行业都是竞争性服务业。从中国金融业过去发展看，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国有银行从竞争中学到很多，不仅为中国金融业带来产品演变、市场建设、业务模式、管理经验等一系列变化，也对国内政策带来改革压力，包括会计准则、监管标准以及营改增等。有些人或是出于自身利益，或是出于自身研究，主张对金融业进行保护，等成长壮大了再开放，再参与国际竞争。但各国经验（包括中国自身经验）都表明，保护易导致懒惰、财务软约束、寻租等问题，反而使竞争力更弱，损害行业发展，市场和机构不健康、不稳定。当前国内很多金融机构都已经“走出去”了，适应了国际竞争，已有五家金融机构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成为资本金充足、经营稳健的市场化经营主体。从中国制造

业、服务业开放的经验可推导出，金融行业不是例外，同样适用于竞争与开放规律。金融服务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由竞争机制带来压力、动力、进步和繁荣，会发展得更好。

金融机构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基础性内容，金融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认为，中国过去金融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然面临法人治理变革，其中的关键问题还是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的参与，这一领域的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金融改革表面

制造业开放让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不少领域正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是防控系统性风险，实质是进一步金融资源配置主体和渠道，就是谁来配置金融资源，谁来保证有效且是适度风险的。过去40年的改革表明，货币是总闸门，但货币当局绝不是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者，中央银行只能在事前或事后纠正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资源错配。杠杆率是风险的总源头，降低杠杆率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必须依靠发展直接融资和股权投资机构。如果依靠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很难同时兼顾降低杠杆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双重目标。

金融发展要重视培育审慎稳健的金融文化。IFF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谈到，过去四十年，金融机构因为审慎稳健不足、交了大量学费。随着中国金融业发展，规模越来越大，风险集聚也越来越大，处置起来越来越难，未来更要重视审慎稳健的金融文化。此外，金融监管的目标应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对于这个目标并不是十分地清晰，而且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就把促进发展作为一个监管目标，带来了很多问题，有些还是很致命的问题。在新时期，怎样明确金融监管目标，在中国就显得非常地重要了。

让改革再出发，让开放更包容

改革开放没有休止符，也没有完成时，改革永远在路上。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新时代改革开放需重点解决全要素生产率和软约束问题。IFF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谈到，198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出了很多体制性建议，大多数议题后来都通过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得



到了很好的解决，而提出的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全面深化仍具有借鉴意义。一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体制改革和技术引进带来了效率的大幅提升，大幅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但下一阶段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在中国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时期，仍需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普遍打破软约束问题。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名义债务不高，但隐性债务风险突出，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政府兜底、财政买单的思维。在市场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域，破除软约束问题，过去普遍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未来也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说，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切实提升开放型经济的水平，面对深层次的矛盾和发展的瓶颈，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二是继续走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子，在经济低成本优势，逐步下降的条件下，要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资本投入转变为依靠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三是切实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尊重市场规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市场的失灵和降低试错成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四是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地区的差距，加大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西部等领域和地区的支持力度，补齐民生的

短板。五是鼓励金融多元化发展，深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完善金融生态，建立多元化金融发展的合作体系，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中国营商环境还有巨大的改进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从2016-17年的第78位²提高至2017-19年的46位，一年间上升了32位。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有着巨大的改进空间。巴罗佐认为，欧洲希望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包括对外资企业开放，尤其是在金融部门对境外企业能够进一步的开放，进一步搭建公平竞争平台，打造一个更加稳定、更加确定的营商环境。

当前国际竞争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与此同时，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要坚定不移地、全方位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地向前推进，让中国的改革再出发，让中国的开放更包容，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使中国人民受惠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

1. Tim Worstall, 福布斯, 2016年10月, <https://bit.ly/2sTm2JR>
2. 世界银行, 《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 <https://bit.ly/2xOgfqP>
3. 世界银行, 《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 <https://bit.ly/2P5y44P>

走向繁荣—— 历史从1978年转身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见证中国从世界银行的借贷国成为如今蓬勃发展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就让世界瞩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会议，拨正了中国这一艘巨轮的前进方向，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从那一刻开始启程。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全世界也空前地提高。习近平主席说，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

中国经济的规模从1978年的2684亿美元发展到2017年的12.34万亿美元，增长约45倍之多。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只有1.67亿美元，今天超过了3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220美元，2017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了8800美元，正在向突破人均GDP1万美金的关口前进。我相信这个目标毫无疑问很快就能实现。40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在9%以上，中国的变化造福了中国人民，也影响了世界。



朱光耀

40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在9%以上，中国的变化造福了中国人民，也影响了世界。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反映中国人民的要求，满足中国人民的愿望。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对外开放的事业开启了伟大的篇章。就是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的一年之后，中国加快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进程。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之后，中国开启了同世界经济融合的历史进程。1980年4月17日，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1980年5月15日，中国加入世界银行，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从此，在全球国际金融体系中中国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起到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开放是中国同世界的融合，同时中国也开始

在世界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等方面受益于这种同世界的融合。中国曾经是世界银行软贷款的接受国，世界银行软贷款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提高发挥了重大作用。

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已经从世界银行的软贷款接受国变成了世界银行

重要的软贷款捐款国，中国正在对世界的扶贫事业发挥着历史性的重大影响。首先是中国自身扶贫事业的伟大成就，7亿中国贫困人口的脱贫是中国对世界扶贫事业最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在自身经济发展、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回馈世界，增加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增加对国际金融机构的赠款，中国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15年的艰难谈判，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即WTO的重要成员，从那时开始，在作为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最重要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中，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的开放事业不断地向前推

进，开放也促进了国内的改革，改革奠定了开放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40 年来不断地向前发展。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习近平主席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久前，《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对中国 2017-2018 年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作出最新判断，《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确认中国 2017-2018 年度全球营商环境的排名从前一年度的第 78 位上升了 32 名，提高到 46 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表明在 2017-2018 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在继续地向前推进，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在不断向前推进的一个突出的例证。

尽管中国的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排名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但实事求是地说，第 46 位的排位仍然有着巨大的改

进空间。面对当前全球生产力竞争空前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挑战严峻，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不移地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与此同时，中国要坚定地对外开放，要坚定不移地、全方位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值此纪念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40 周年之际，我们要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地向前推进，让中国的改革再出发，让中国的开放更包容，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使中国人民受惠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中国应建立并开放大宗商品期货市场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认为，中国大宗商品交易前景广阔，有能力搭建一个更为开放的期货市场。



姜洋

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进口大量的大宗商品。这些大宗商品相当多地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中国既享受了全球化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也为全球化贡献了力量。改革开放以来这 40 年里，中国的商品进出口贸易量增长非常快，1978 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货物进出口总额从 206 亿美元，到 2017 年已经是 4.1 万亿美元。1978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全占全球 1.8%，2017 年这个数字达到 15.1%。现在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大宗商品贸易最大的市场之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大宗商品贸易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大宗商品大量进口——比如：铁矿石、原油、大豆、铜的需求——不仅满足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因为中国的这种大量需求增强了经济增长动力，扩大了就业，提高了消费、改善了民生。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宗商品的自由贸易使得各经济体之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国的增长带动了世界的增长，世界的增长也繁荣了中国。2001 至 2010 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 14.2%，这一数字在 2017 年

已达到 34%。大宗商品贸易作为强劲的动力之一，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新引擎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这是全球化各国之间合作共赢的一个典范。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新型全球化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之间是优势互补的，是取长补短的，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共同推动全球共同富裕的。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我们看到，从 2018 年 10 月 3 日到 11 月 23 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原油价格的波动非常剧烈，布伦特原油期货从每桶 80 多美元跌到 50 多美元，下跌幅度达 31%。油价下跌有地缘政治的因素，有供求因素，有美元本身的因素。这说明大宗商品是国家经济安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都重视大宗商品在国家经济中的安全性。

举例说，有三大类商品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原油

原油是最原始的油品，是未被加工的石油，即从地上刚采出的化石燃料。通过加工提炼，它涉及到 500 多种石油油品，1500 多个产业。2017 年整个石油产业链最终产品总值达 4.04 万亿元。产品包括汽油、柴油、化工原料、生活用品、家装材料等。2017 年，中国原油炼制的各类消费品总量为 5.51 亿吨，其中 4 亿多吨，约 60% 是靠进口，60% 以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所以原油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渗透力非常强，影响非常大。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期货市场对原油的进出口进行风险管理。美国期货市场运用得好尝尽了甜头，俄罗斯放弃运用吃尽了苦头。

铁矿石

铁矿石的上游、中游、下游产品涉及到的面都非常广，从简单的劳动工具到尖端精密的航空设备，所有部门都和钢铁有关。中国铁矿石去年进口是 10 亿吨，中国的炼钢产

能是过剩的，这么多的进口铁矿石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大。从2002年到2010年，铁矿石的价格由每吨不足30美元涨到了150美元，而同时期钢材的价格仅由每吨2000元人民币涨到4400元人民币，中国占了国际市场65%的铁矿石进口量，但缺乏定价的话语权，国内钢铁企业利润率相对较低。

2013年10月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铁矿石期货后，国内钢厂的加工利润逐渐回归。近两年，中国钢铁企业开始盈利。国内吨钢利润由2011年的275元增长至2017年的853元，全行业节约成本约100亿美元。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用期货管理商品价格风险是有利于经济安全的。

和食品紧密相关的大宗商品，大豆等油脂、油料

2017年中国进口9700万吨大豆，主要来自于美国和南美的巴西、阿根廷。进口的大豆除了豆油直接供人们消费外，大量是作为养殖的饲料转化为国人肉食消费品。中国对棕榈油的进口需求很大，因为国内完全不生产。棕榈油主要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这些商品的进口国与出口国都频繁地利用期货市场管理价格风险，维护经济运行安全。

这三大类商品都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人们日常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

期货市场的重要性

在动荡的世界里，这些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无论对企业经营还是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都很大。100多年前，英美建立期货市场，利用期货市场功能来减轻或抵消价格波动对经济体的影响。美国和英国经济发展史证明，期货市场对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国外金融市场所说的大宗商品交易一般是特指商品期货交易，其特点是它在没有到期之前是金融产品交易。即交易对手之间先用较少的保证金买卖一个到期必须交割的商品现货合约，以控制生产周期内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买卖了一个期货，到期后不管价格如何变动，交易双方都必须按合约的价格履约。而纯粹进行金融交易者是在进入交割日之前平仓离场，退出交易。影响大宗商品贸易安全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货源的供求变化，一个是价格的波动情况。

曾经担任过俄罗斯的代总理、经济学家盖达尔就认为，因为国际油价下跌导致财政危机，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的经验表明，对于遭遇不利行情风险的资源丰富国家而言，重要的是政府应预先知道在原料价格下跌时该做些什么，这对预算、

收支平衡、消费市场、偿付外债、银行系统的稳定又会有些什么后果，同时要有一套在类似情况下能够使用的详尽而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盖达尔认为，苏联垮台相当一部分经济因素就是原油的价格大跌影响到财政预算的稳定，在当时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这种原油收入占较大比例、经济结构较单一的国家，对财政预算影响极大，由于美国及盟友的动作，原油价格大幅下跌这对当初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的社会稳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当年美国在原油期货市场上大量抛售储备，一些美国盟友也在油价上配合，上下其手，把期货价格往下拉。苏联由于政治制度问题而不能用期货。由此，不难看出供求关系来源的稳定、价格的波动都是影响国家经安全的重要因素。从原油出口国看，价格的下跌，有再多的资源出口其收益也是不经济的。从进口国看，价格的上升，同样多的钱只能买更少的油，也是不经济的，这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是非常不安全的事情。

一般来讲，国际上的大国，尤其是经济大国都要建立自己强大的本土期货市场。诺贝尔奖获得者、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当年坚决支持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建立外汇期货市场。他说，建立本土的期货市场是国家战略利益所在，如果一个国家不在自己的本土上建立自己的期货市场，是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如果经济大国不主动建立本土期货市场，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将缺乏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的市场。各种经济体在经济活动中将找不到避险场所。如果每个国家都去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这也是不可能的。较小的经济体因为成本付出较大，自身吞吐经济的能力和腹地有限，自己建一个本土期货市场成本也比较高，也不实际，所以小国家小的经济体基本上没有本土市场，就是建了本土的期货市场影响力也非常小，基本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影响。

大国要有担当，应该去主动建立可供全球进行避险的市场。100多年前美国、英国在建立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来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同时，也为世界作出了贡献。我们知道国际上影响最大的期货市场是美国的CME，是国际原油、农产品、黄金等大宗商品贸易的定价中心，全球很多经济体、企业以及投资者都去美国期货市场进行交易，进行套期保值实现风险管理。全球的公司和个人都在利用美国期货市场发现的价格从事自己的商业贸易活动。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也具有这种功能，全球的有色金属企业用它的价格基准定价，到那去管理风险。美国的洲际交易所集团(ICE)，也具有全球定价和风险管理功能。它的能源定价和风险管理与CME基本上并驾齐驱。但目前全球性的风险管理场所不多。

现在中国经济体量是全球第二，是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



应该抓紧健全完善和做大已经建立了近30年的期货市场，在全球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上为新一轮全球化作出贡献，作为发达国家已经建立的风险管理市场的一个补充。现在亚洲的日本、印度、中国都有商品期货市场，我们的期货市场现在规模最大，交易规模连续九年在全球的商品期货市场名列前茅，但市场规模小很多的日本等的国际影响力却比我们大。比如橡胶期货，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交易量比日本大几十倍，但国际天然橡胶贸易的基准价在日本而不是中国。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交易量在国际上没有大的影响力呢？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开放，国际投资者没有到我们市场来，国际上商品交易的相关信息没有直接、充分地反映到中国期货市场发现的价格体系里面，当你的价格体系里面有各方的需求，各种信息在你的数据里面，那么很多买卖大宗商品的国际国家，很多企业就会利用你发现的这个价格，他们在贸易中就可以选择你发现的价格作为谈判基准。

目前中国期货市场开放了，让境外投资者直接进入期货市场交易，2018年3月26日，中国对全球投资者开放的上海原油期货上市了。上市9个月来，在国际原油贸易上引起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改变了它40

多年没有改变的定价机制，把迪拜商品交易所上市的阿曼原油期货，作为签订石油销售长期合同的一个基准，原来它们只用布伦特或普氏系统作为基准来和亚洲客户签订原油贸易长约。为什么目前改变了呢？业界人士分析认为，阿曼原油能够反映亚洲原油供求状况，但阿曼原油期货交易量很小，没什么影响力，所以上市10年来，阿美石油公司没用它来做定价基准，但上海原油期货刚上市9个月，其交易量已超过阿曼原油期货几十倍，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9个月来，上海和阿曼原油期货的价格曲线高度重合，发现的价格更加公允，实际上可以逐步替代阿曼原油定价的基准，那么最终就可能做到在今后的原油贸易中，上海原油期货的价格可能成为亚洲地区客户贸易选择的定价基准。目前形势发展非常好，每天、每个月的交易量都在增加，而且非常规范，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参与到这个市场。●

全球视野下金融科技的影响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认为，金融科技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和金融市场结构转型。



李东荣

近年来，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对金融科技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最初的审慎观察，逐步变得更加积极包容，同时也更加重视金融监管如何及时跟进适应的问题。目前，金融科技日益成为各国各地区金融竞争合作和金融资源布局的焦点领域。

金融科技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金融科技作为以现代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正不断影响着金融功能的实现形式和金融市场的组织模式，展现了深刻变革金融业的潜力。站在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角度，我认为，金融科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有助于促进全球金融业转型升级。回顾整个人类金融发展史，也是一部不断伴随着科技进步的历史。比如，冶炼、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货币流通从最初的实物货币向金属货币、信用货币转变，提高了货币流通的速度、规模和便利性。电报、电话等通信技术的发展，使金融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跨期、跨地域的资源配置。上世纪后半叶，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手工操作的金融业实现全面革新和升级换代提供了根本支持。而在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集

活跃时期的今天，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取得突破，又为金融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提供了更加优异的技术条件。

二是有助于促进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经过各国多年的探索实践，全球普惠金融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同时也要看到，在传统服务模式和技术条件环境下，普惠金融面临的成本高、效率低、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共性难题依然是个难以逾越的屏障，短期内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仍有约17亿无账户的成年人，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受信贷约束的中小微企业达6500多万家，占中小微企业总数的40%，融资总缺口超过5万亿美元。面对这样一个背景，随着近年来一系列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尝试应用，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解决上述难题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在中国、肯尼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普惠金融实践证明，依托金融科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受惠主体提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成本可负担性以及供需可匹配性，从而为破解全球普惠金融难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较可行的思路。

三是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从更加宏观和系统的层次去理解金融科技，我认为，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科技创新对金融的驱动作用，还体现在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这种支撑作用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金融业具有资金筹集、风险管理等功能，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融资服务，并分散科技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其次是金融业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金融科技发展可为其他产业领域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科技应用示范。从这个方面讲，金融科技能够促进金融、科技、产业的协同发展，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更强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金融科技给国际金融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金融科技作为尚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的新兴模式，还可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角度，我认为，要高度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数字鸿沟挑战。当前，世界各国信息化建设水平不同，网络终端普及率和居民数字能力差异明显。世界银行《2016世界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有近20亿人没有手机，近60%的人没有互联网连接，而且各国国内的数字鸿沟可能与各国之间的差距一样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将导致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从金融科技发展中获益的能力有所分化。

二是监管套利挑战。不同国家金融监管理念和制度环境有所不同，金融风险判断和管控能力也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在金融发展优先的政策导向下可能引发“监管竞次”问题（race to the bottom）。实践中，一些打着金融科技创新旗号的机构，从强监管国家地区迁往相对宽松的“监管洼地”的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在资本、技术、人才流动更加频繁和便捷的今天，金融科技跨境监管套利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三是风险外溢挑战。随着全球各国金融市场开放性和金融基础设施连通性不断增加，金融科技可能带来业务风险、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的叠加效应，使金融风险传染更快、波及面更广。而且，风险外溢与数字鸿沟、监管套利三者还可能相互交织，形成更加复杂的风险结构，提高了金融风险全球治理的难度。

共同推动全球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应该辩证地看待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上述机遇和挑战，在态度上积极拥抱，在行动上审慎稳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趋利避害，共同推动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更充分更安全地实现其经济社会价值。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需要重点关注：

倡导国际基本共识

经过近几年的观察和探索，国际社会对金融科技正在形成一些基本共识。首先，金融科技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通过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和普惠水平，将小微企业、“三农”、贫困人口以适当方式纳入经济金融体系。其次，金融科技应是负责任的创新，应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教育，促进金融机构履职尽责。再次，金融科技应是具备可持续性的创新，金融业是一个长周期行业，金融科技发展不能只关注技术应用的短期效应，而忽视金融风险发生的滞后性。

促进各国特色发展

条条大路通罗马。发展金融科技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最佳模式。各国应从本国国情出发，明确自身优势、资源禀赋和目标诉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展金融科技，

不必盲目追求所谓的颠覆式技术和模式创新。比如，在智能手机不够普及且缺少高速移动网络的条件下，肯尼亚通过手机短信发展移动普惠金融服务，非常务实，效果也非常好。中国发挥市场规模和技术应用的优势，在移动支付、互联网借贷、在线供应链金融、金融精准扶贫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英国、新加坡等国家注重监管制度创新，通过监管沙箱、创新加速器等方式，为金融科技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加强国际监管和协调

依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平台，加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评估与风险监测，统筹解决跨境监管竞次和监管套利问题。同时，应深化各国家金融监管合作，探索建立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信息共享、风险联动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不断提升各国金融科技跨境监管能力和合作水平，今年10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了《巴厘金融科技议程》，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带来的机遇和潜在风险，提出很多务实可行的参考建议。

开展多元交流合作非常关键。通过国际论坛、国际培训和同业学习等方式，交流推介金融科技发展的典型经验和良好实践，加强政产学研多层次交流。鼓励各国具备条件的机构，按照市场化和可持续原则，通过联合实验室、合作研发中心等多种形式，拓宽各国金融科技合作渠道。同时，还应发挥行业自律组织在促进金融科技民间交流等方面的作用。

推进国际标准建设

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考虑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组织总体框架下，以金融基础设施联通、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科技风险防控为切入点，通过现行国际标准等同采用、双多边标准互通互认、先进标准输出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各国金融科技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金融科技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市场空间。我们期盼各国金融监管部门、从业机构、行业自律组织以及学术研究机构同仁加强沟通，共同努力，推动全球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在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普惠金融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再出发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



祝宪

一、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面貌，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四十年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四十年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其意义如何论都不为过。

改革开放前，中国多年实行高度计划经济，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甚至许多消费资料，都采取计划分配的方式；从对外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等方面看，也采取了关门发展的方式。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当时人均GDP平均数是490美元，我们连它的三分之一都没达到。中国当时的10亿人口中，84%的人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每人每日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进出口贸易中，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占5.6%，两项加起来只有9.7%，也就是说，当时我们90%以上的国民经济跟世界经济是不相干的。

1978年，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这场改革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世界瞩目的伟大历史进程。1978年至2017年的39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5%，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中国七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

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切实体会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以及各方面条件的不断改善。亲身经历使我们坚定地认为改革开放必须进行下去。

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对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表述，向世界明确宣示了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

二、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思想解放

重要成就通常始于思想解放。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正走出几十年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知识封闭状态。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了学习外国经济和技术的必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们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的过程中，引进外国思想和学习外国经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是一个重要方面。我想就中国和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合作来具体说明这点。1980年代，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做出了相当贡献。

世界银行1985年发布的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很多体制和政策改革议题，涉及价格改革的方向和速度的选择、物资配置和劳动力配置、投资决策，以及外贸管理等；在长期议题方面，概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如何实现有效组织和管理的形态，也强调需要配套的社会体制改革，以缓冲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平等和不安全加剧的影响。



现在看来，大多数议题后来都通过在如今的中国经济体制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方式加以解决了，但在当时仍颇受争议。但其提出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体制机制政策改革红利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尤其是经济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体制、机制、政策改革所释放出的巨大红利。同时也应当看到，还有一些基础性问题亟待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解决。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只有对改革得还不充分、不彻底的领域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才能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改革开放千头万绪，当年的世界银行报告还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病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可能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几个基础性的建议。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两个重大经济改革概念：一是重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从根本上破除预算软约束。

四、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这是体制改革和开放技术引进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成果，但下一个阶段的难度可能更大。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的源头。在强化国内市场竞争方面，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的竞争性，促进了繁荣发展。为缩小中国同发达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方

面的差距，还需要更加激烈但公平的竞争，要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五、打破预算软约束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要打破普遍存在于各级政府 and 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状况，改革难度很大。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来看，凡是打破了预算软约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鼓励良性竞争、有退出机制的领域，普遍取得了较大发展。

举例说，许多地方政府名义债务不高，但隐性债务风险突出，包括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国有企业方面，即使在竞争性领域，政府兜底、财政买单的思维模式依然存在。

打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破除民营资本背后一道道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本身就是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正如一个月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的：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下一个40年的中国，定当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成就。我们要坚定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下去，同时要向更深更广的领域中不断开拓，不断提高水平。◆

金融科技： 第一次金融革命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Han Seung-soo）认为，金融科技有利于促进创新，但与此同时，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要同步制定配套政策。

2018年有两份关于金融科技的报告十分重要也很有趣。一个是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学院发布的“2018年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指数”，¹另一份是毕马威发布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100强》报告。²

毕马威的报告显示，全球五大金融公司中有三家来自中国，蚂蚁金融公司排名第一，京东金融公司排名第二，百度排名第四。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学院显示，由上海、杭州和南京组成的长江三角洲是全球第一金融科技中心，紧随其后的是美国的硅谷。

从根本上说，金融科技是一种以IT初创企业渗透到金融的现象。因此，金融科技生态系统在参与者方面与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相似，虽然各自的从业者并不相同。构成金融科技生态系统要素包括IT产业、政府、大型企业、初创企业、加速器、孵化器、私人投资者、大学和研究机构。

一种创新型的结合

金融科技是信息技术和金融产业的结合体。这意味着如果没有IT，就没有金融科技。因此，IT产业的发展和成熟是金融科技产业出现的最根本要求。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对市场的渗透就是佐证。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16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为34亿。³全球互联网普及率为46%，一年内上升超过10%。

2017年，北美、欧洲和亚太部分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很高，韩国以96%的普及率高居榜首，其次是美国89%，英国88%，日本76%，中国71%，印度25%。⁴

在智能手机普及率方面，韩国再次高居榜首，为94%，其次是美国77%，英国72%，中国68%，印度22%。⁵

安永2017年发布的金融科技使用指数显示，中国互联网活跃用户中69%都会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位列第一，其



韩升洙（Han Seung-soo）

次是印度，占52%。⁶第三是英国42%，其次是美国33%，韩国32%，日本14%。

结合智能手机普及率和金融科技的使用率数据，可以估算出世界主要国家中与金融科技有所接触的人口比例。2016年，中国是使用金融科技人口最多的国家，占总人口的47%，其次是韩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各占30%；2016年，使用金融科技的美国人和印度人分别占25%和11%。

个人银行业务的改革

过去几十年来，金融行业不断创新，上世纪60年代推出信用卡，70年代和80年代推出自动取款机等现金发放终端，以及90年代放松对债券和资本市场监管后推出了一系列新金融产品。

然而，随着2007年苹果iPhone的问世，智能手机开始影响人们的理财方式，以及对银行业务的监管和控制。更直接的融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间接融资方式，省去了各种中介机构，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目前，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正处于不可逆的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传统银行业的信誉不断下降，互联网渗

透速度加快，金融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银行的竞争对手。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1994年预测了银行的命运，他说：“银行业有存在的必要，但银行不是。”

事实上，在智能手机问世的10年内，银行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15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成立的意大利锡耶纳银行（Banca 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银行，掀起了“第一次金融革命”的浪潮；相信随着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区块链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次金融革命可能会随之而来。

随着近一半的人口都在使用金融科技，中国正在该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以及监管者早期的“低干涉”政策，都极大促进了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

依托现有的社交媒体平台，中国的金融科技服务于以下关键领域：非银行数字提供商的第三方支付、对等贷款、包括小额贷款在内的互联网信贷、基于互联网的银行和保险、数字财富管理和信用评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型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科技已经打破了传统的行业细分，进入了金融供应链的其他领域，建立了一个将客户和企业联系起来的金融服务综合生态系统。

很难想象，直到21世纪初，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很差，信用度较低；信用卡普及率很低，不到10%。大约十年前，中国在全球电子商务零售交易额中所占比例不到1%；但今天，这一比例已经增长到40%以上。⁷电子商务在中国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为15%，而美国仅为10%。

2004年，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推出了支付宝，吸引了大量金融客户。支付宝是一种安全可靠的电子支付服务，旨在解决消费者之间的金融不信任问题。阿里巴巴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服务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其原理是支付结算押金来作为电子商务信用担保。因此，智能手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模式。

由于货币市场利率超过了央行控制的存款利率，2013年，阿里巴巴推出了类似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余额宝，从而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基于长期积累的大量客户数据，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在市场上获得了优势。自余额宝取得成功以来，IT公司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金融的各个领域。

因此，传统金融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也面临着金融科技行业的挑战，现有的银行业务壁垒被迅速打破。

这些技术使得资金交易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银行服务，使传统银行受到创新金融科技和区块链技术的挑战。

金融科技对市场效率、包容性、服务质量、监督和监管都有潜在的好处。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不仅如此，它还金融服务提供便利、提高了监管的有效性、鼓励具有潜在新商业模式的金融行业进入这个领域，并为客户提供了用户友好且更便宜的金融服务。

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推进金融发展和加强包容性，来支持潜在增长和脱贫工作；也可以帮助数百万个人和中小企业以负担得起的成本获得金融服务。

处在十字路口的市场

然而，快速发展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风险。在中国，在线支付服务的供应商在影子银行系统中运作。他们从银行，或者通过购买同行拆借许可或小额贷款集中现金，导致信贷和期限发生变化。由于这些支付提供者是在监管范围之外运作，实际资金难以监测。

金融市场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需要在短期内保持抵御潜在外部冲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需要提供中期新的增长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应对措施应在实现数字创新和应对金融部门风险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为了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全部潜力，监管部门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确保金融系统的信用，并确保金融科技相关的潜在风险得到有效监控和处理，不会过度扼杀创新。

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应当与潜在风险成比例。监管范围可能根据需要重新划定，法律框架需要相应调整，以跟上创新的步伐，并确保对新风险、法律确定性、可预测性、透明度和隐私之间进行适当权衡。

金融科技也能让监管者受益。它可以支持和促进法规遵从性。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快地识别可疑活动，生物测定和元数据可以帮助验证客户或受益所有者的身份，加密资产的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可以用来改善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同样，监管者可以利用金融科技来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效力。

由于每个国家经济的基本条件不同，政策上的优先事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考虑到这些技术固有的全球覆盖面，区域和国际合作将成为制定有效对策的关键因素。●

1.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2018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指数》，2018年6月，June 2018, <https://bit.ly/2OcYmcx>
2. 毕马威，《2018全球金融科技100强—2018全球金融科技领先力量》，2018年11月，<https://bit.ly/2ztGrj8>
3. Scribbls，《全球上网人数超46%》，2016年9月，<https://bit.ly/2FsBS6l>
4. 皮尤研究中心，《国际观点及趋势》，2018年6月，<https://pewrsr.ch/2tqDrtU>
5. 皮尤研究中心，《国际观点及趋势》，2018年6月，<https://pewrsr.ch/2MdaBnL>
6. 安永，《2017安永金融科技普及指数》，<https://go.ey.com/2ssGMYz>
7.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字中国：加强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2017年12月，<https://mck.co/2AR8oLo>

碳定价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欧洲 50 国集团主席、法国前财政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Edmond Alphandéry）认为，应通过碳定价打造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较高且具有可预测性的定价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2018 年 10 月中国官方发布的一份详实的公开文件，描绘了“中国能源转型的新时代”。《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 2018》（CREO2018）¹ 以“十九大”的战略思想为指导，详尽地记录了“十三五”发展指导方针的落实情况。这份文件所记载的初步观察鞭辟入里，并且提出了有效可行的建议。该文件首先强调，“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其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巨大风险”。

这些挑战的艰巨性相当于要保护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而且全球排放的问题也会带来不同寻常的政治风险，其中包括大规模移民。

该报告也强调，“能源行业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来源，因此减少能源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建设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份报告对 2050 年的前景提出了两种设想。其一是“国家政策方案”，预测有关能源行业的现行国家政策得到充分

“能源行业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来源，因此减少能源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建设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有利的执行，其二是“低于 2°C 倡议”，有助于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这两种方案有着共通之处。首先，能源转型的成功取决于工业领域，因为在中国，工业是能源的主要消费群体；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化石燃料的份额会逐渐减少，煤炭的使用量会大幅下降，而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将占据主导地位；第三，我们不应该害怕这种能源转变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失业的影响，因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满足新的清洁能源用户的需求，都将促进经济活动，抵消化石能源的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Edmond Alphandéry）

对世界上所有必须应对能源转型的国家，这三点都很有指导意义，该文件就能源转型所提出的建议也具有普适性。首先，要把严格控制煤炭的使用作为重中之重；第二，在未来十年里，将可再生能源，即风能和太阳能的使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第三，短期内也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成本。正如报告所述：“制定合理的煤炭价格将有助于在化石燃料的电力和可再生能源之间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应该制定进一步的措施，包括知道哪个煤炭的最低价格。此外，碳定价和碳市场必须将电力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纳入其中。”

碳定价与气候变化

根据最后一项建议，碳定价应作为对抗全球变暖的一种手段。相比其他限制碳排放的措施，碳定价有其优越性。在阐述原因之前，先做两点说明。

首先，要摆正自己的目标。正确的目标不是降低所有能源消耗，而是降低会造成排放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消耗。应对气候变化，决不能，也不需要采用马尔萨斯的经济政策，这将降低生活水平，造成大规模失业。地球上的人口增长仍



将集中于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满足当地人民巨大的能源需求。减少化石燃料能源不应解读为减少能源需求。

第二点，世界各国政府青睐于通过行政措施、禁令、财政激励、公共开支来减少碳排放。这样的措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中国关闭污染最严重的燃煤发电厂；德国让消费者支付的关税补贴可再生能源；法国给家庭补贴以减少他们对化石燃料能源的依赖，必然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推广。

这些做法诚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增加了成本，而且对全球福利方面的贡献非常有限。因此，能源转型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市场机制调整供应。通过调控煤炭市场，就可以将所有碳排放纳入管控范围。我们确信，无论竞争环境如何，所有煤炭的使用都是污染的根源。

为了建立市场，为了减少碳排放，必须引入可交易的排放许可。如果能够建立这样的市场，就可以控制排放量，根据当地情况进行碳定价；也可反之，先确定碳价格，再根据市场需求控制碳排放量。

固定定价与价格控制

这两种做法都有国家采用。比如，英国政府当局采用固定碳价格；而欧盟和中国都建立了本土碳排放交易系统，旨在控制碳排放量。后两者的方法比英国的方法效率低得多。为什么？虽然控制了排放量，但价格波动巨大，这样一来就没办法及时接收碳价格波动的信号，而价格波动与排放量息息相关。

欧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引入排放交易体系（ETS）时，碳价格是每吨 30 欧元；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碳价格跌至每吨 3 欧元，并持续了大约十年。2013 年，碳价格回升至每吨 25 欧元，现在又在下降，大约每吨 18 欧元。

必须强调，明确的、可预测的、不断上涨的碳价格可以



推动生产商和消费者做出改变，从高度碳密集型产品转向低碳甚至无碳产品的生产及消费。

从常识判断，碳价格的上涨会使高碳排放的活动成本增加，这就会引发经济学家所谓的替代效应，那就是最终减少碳排放的能源，摆脱碳排放。因此，全球变暖的问题，可以从碳定价着手。

如果碳排放对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成本过高，那么企业就会放弃这项活动。诚然，更高、可预测的碳价格是对抗气候变化的最有效手段，但是从短期到中期市场反馈来看，碳价格的上涨会引发可行性和竞争力问题。如果碳价格上涨幅度过大，那么某些能源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导致能源短缺，公司倒闭。

这就是有些人支持政府出台可预测的过渡性措施的原因，比如在通胀率的基础上叠加给定的逐年增长的百分比，这样经济结构就能够顺利适应能源的转变。事实上，采取这样的手段也是必然。因此，碳价格是一种激励信号，也使大家觉得走上正确道路并没有那么痛苦。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阻力。为了克服这些阻力，并鼓励欧盟适应基于碳价格的体系，我自己在欧洲就发起了一个由来自不同地区的高级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

中国也在考虑引入这样一种机制来辅助其它已经采取的行动。这样就能给所有国家，就解决碳排放及竞争风险提供更多的灵感和方法。目前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的支持下，我正计划在巴黎召开中欧领导人联合会议，就碳定价交换意见，并发起倡议。

通过推动这次会议，我们将表明，欧洲愿意同中国一道，以决心和效率共同面对人类面临的这一重大挑战。●

1.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8 年 10 月，<https://bit.ly/2VVZ2IM>

金融机构的改革是进行时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认为自 1978 年来，金融结构改革和开放让中国金融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但法人治理变革任重道远。

金融的核心作用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体现。一条是宏观渠道，主要体现在需求端，货币、信贷、外汇政策毫无疑问会对经济增长、物价等产生影响。第二是微观渠道，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也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复杂性往往体现于必须在需求和供给两条线上发力，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货币调控体系改革、外汇管理体系改革、金融市场制度设计、金融机构改革以及金融业开放。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

各国虽然都有类似的金融机构，比如都有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功能趋于一致的金融工具和产品。但运营方式和结构各不相同。金融机构的差异来自于体制差异。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 年中国恢复分设农行、中行、建行，逐步建立区域性股



陆磊

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各类金融机构。1984 年随着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家，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1987 年明确金融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推动金融机构深化内部改革、经营机制朝着商业化经营目标迈进。1993 年 11 月提出在 20 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同年 12 月提出，建立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今天中国的金融业仍然面临法人治理变革，其中的关键还是“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预算软约束问题可回溯到改革早期，如今本质仍然是“新瓶子里的旧酒”，问题的内核是一样的。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大机构，产生问题后仍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和央行来替其承担。

1993 年中国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构想，1996 年开始放开同业拆借利率，2000 年开始先大额后小额、先外币后本币的思路全面推进改革。价格只对真正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才能完全发挥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问题是金融机构的行为往往具有不完美性质，利差要能够覆盖风险，否则就一定会导致资金的内部循环。简单来说就是，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基本策略一定是净收益能够覆盖风险。如果做不到，它就会发展更多同业业务。这就是为什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经济下行期比上行期更为关键。

金融改革的必要条件是开放

除了金融机构改革，开放是金融改革的另一必要条件。

改革有时候会缺乏内生动力，需要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开放的基本含义：一是引进规则，二是引进制度，三是引进竞争。

从商业银行看，自身消化不良贷款能力较低导致不良贷款快速累积，通过实施《巴塞尔协议》保证商业银行拥有较大空间应对金融风险，资本金多少决定了银行的实力，不仅可以保证银行金融活动正常运行，还可以维护存款人的正当权益。国际上发生过多起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由于资本金不足且承担过高金融风险导致资不抵债，最终使广大存款人受害的案例，这就需要自我约束，而资本充足率正是这样一种约束。中国把国际规则拿来用再本土化就可以了。

本世纪初叶，中资银行引进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推动银行业的改革，建行、中行、交行在改革过程中引进境外投资者并成功上市，是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成功案例。国有银行改革经历艰难的探索，从 2004 年开始的改革再次剥离的不良资产合计超过 1 万亿，最后不良贷款率仅为 1.7% 左右。¹1994 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规范外资银行在华设立机构的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这是金融行业引进竞争的开始。

中国的保险业是最佳实践，该行业开放力度更大，比其他金融行业提早 2 年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根据加入 WTO 承诺，进一步取消外资保险机构公司设立的地域限制。

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金融改革表面是防控系统性风险，实际是金融资源配置主体和渠道是否进一步优化的问题，就是谁来配置金融资源，谁来保证有效且适度的风险。来自 40 年的改革经验或许可供未来金融改革设计做参考。

第一货币是总闸门，但货币当局不是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者。这是自 1979 年以来改革被反复证明的真理。但是，很容易在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赋予中央银行过多职能。

第二点，杠杆率是风险的总源头，解决杠杆问题应该从金融机构的资本约束出发。降低杠杆率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必须依靠发展直接融资和股权投资机构，而不是依靠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

在金融市场高度关联的今天，中国试图建立更为规范的制度。高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是检验一个经济体是否能够走向现代化中高端的标准。笔者认为，这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基本含义，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改革包括金融机构的改革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1. 福布斯，2016 年 6 月，《中国不良资产成烫手山芋》，<https://bit.ly/2SLsdyb>



中朝经济合作： 朝鲜经济开发区的发展现状 与中国经验的启示

李铁石 (Ri Chol Sok), 朝鲜对外经济部经济开发指导局局长、
朝鲜经济开发协会会长

中朝两国在经济特区领域的合作关系

中朝两个国家从 2010 年 11 月 19 日就罗先经济特区、新义州经济特区等地的经济开发和共同管理的相关内容，签署了政府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双方政府从 2011 年到 2012 年分三次举办了政府之间的会议，并且为两个经济地带的共同管理、共同经营又设立了共同的委员会，并签署相关协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 2013 年 3 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了决定，要设立 1-2 个经济开发区，做出因地制宜的发展决定。2013 年 5 月 19 日，发表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开发区法》。到目前为止，包括平壤在内大概有 20 多个经济开发区，分别设立在全国的各个道。

今年，朝鲜半岛上出现了非常良好的趋势，形成了非常好的和平氛围。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对朝鲜的投资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朝鲜政府为了保障投资经济开发区的企业的利益，快速推动经济开发区的开发，不断的改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税收及土地的优惠政策

在经济开发区，企业的所得税降低到了 14%，经济开发区以外的地区企业的所得税是 25%。同时，为了给这些投资者提供方便，朝鲜将提供相对于周边其他国家更有利于投资者的优惠政策，包括土地租赁的期限、土地开发方式、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使用权，以及建筑物的买卖等很多领域。

在经济开发区内可以租赁土地，租赁期限是 50 年，可以以独立的方式或多种形式来进行开发，然后开发的建筑



李铁石 (Ri Chol Sok)

物或者土地可以二手租赁给一些企业。经济开发区将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企业的独立性，彻底保护他们的利益。经济开发区的管理机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独自制定相关的政策，与经济开发区以外的地区实施的法律法规有差异性。

另外，如果外国企业投资于朝鲜国家鼓励的产业领域，在土地利用或者选址方面能够获得优先的权力，甚至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免除土地使用费或者企业所得税。如果企业把获得的利润重新投资于朝鲜开发区内的话，政府可以把 50% 的企业所得税退给企业。在经济开发区重新进行投资的这些企业，相关的一些企业所得税可以退给企业，在观光和酒店领域也是优先提供经营权力。在经济开发区进行投资的外国企业，在出入境或者居住，通信以及进出口等方面，与经济特区以外的地方相比，能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

经济开发区管理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建设

朝鲜对外经济部相当于中国的商务部，朝鲜对外经济省经济开发指导局是全权负责经济特区业务的相关机构。

每一个经济开发区里面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负责为入驻企业设立许可，并根据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投资企业提供服务。

经济开发区的发展离不开有能力的专家或者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朝鲜已经制定了相关的一些培养机制，不仅在国内进行培训，也可以跟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对经济开发区所需的人才进行培训。我们积极学习外国的经验，尤其是最近中朝两国之间签署协定，朝鲜每年有相当数量的人员被派遣到中国来，学习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经验。

对朝鲜来说，中国所积累的经验，尤其中国近四十年来在经济特区、项目开发方面所积累下来的经验，都有非常好的学习价值。我们也与一些外国的机构进行合作，比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 KPP 项目。我们希望继续加强与国外合作，积极的学习外国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同时，也让全世界对朝鲜投资及经济开发有更多了解。●

金铁龙 (Kim Chol Ryong),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18 号室副室长

在朝鲜劳动党的努力之下，朝鲜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2016 年 5 月，在第七届党代表大会上朝鲜总结了取得的成就。

在新世纪产业革命的热潮之下，各种设备和工程实现了现代化，朝鲜自主开发了 80 马力的拖拉机，开始生产载重 5 吨的货物汽车；积极建设信息通信网络等等一些技术设施，电信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在农业领域朝鲜推动“种子革命”，“土豆农业革命”，大量土地获得了整顿。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谷物生产量的增加，2016 年是朝鲜谷物生产量最高的一年。这些发展符合全球发展的趋势。

经济发展的三大机会

党的第七届会议上提出了人民经济五年规划。这个五年规划对朝鲜经济是非常好的发展的机会。五年计划指的是从 2016 年开始到 2020 年人民经济要实现均衡发展，要推动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这个目标，各经济部门之间都制定了各自的课题。

朝鲜在几个领域制定了一些目标性的指标，也制定了一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包括利用太阳热或者潮水进行电力生产；建立主体钢铁生产基地——即利用自己的矿铁石和钢铁来生产出产品；在化学领域要自主生产肥料，利用自己的原材料生产人们生活所需的各种化学工业品等。

朝鲜还要在顶端技术产业领域跟上全球的发展趋势，



金铁龙 (Kim Chol Ryong)

把它作为超前经济的核心产业，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相当程度的成果。比如，积极推动自动化、无人化，从而全面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同时也积极作出努力去提高工业商品的质量。

朝鲜目前还要在全国的范围内积极建设民间住宅。现在朝鲜从国家层级进行投资和建设这些住宅，都是免费安排给老百姓居住。尽管朝鲜并不存在没有房子可住的问题，但是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也变得非常多元化。因此，这些住宅的规模或者装饰质量需要提升。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大目标付诸实践的话，就能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从 2013 年 6 月开始，国家基于外部局势的要求，提出了核武力建设和经济建设并进的路线。2018 年 4 月，国家提出了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因为国家今后要集中精力推动经济建设，以此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目前，朝鲜各领域仍存在对原材料进口的需求，但是朝鲜要尽量实现原材料及产品的国产化，增长在各个经济领域的的能力，建立自主的经济结构。这其中一些路线已经得到了伟大的胜利。过去主要投资于国防科技领域的那些生产力要积极转移到民生领域。在经济管理方面，要加强国家统一的领导能力，要加强国家的经济组织者的功能，按照朝鲜的方式来建立和实施适合国家经济管理的办法，让企业能够在主体思想基础之上全面得到发展。

朝鲜在工业领域提出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度，所以工程或企业自己要制定出一些经营发展的战略，然后主动的去追求本身的发展。目前，外部的经济环境迅速发生变化，相信这也将给朝鲜经济发展带来良好的机会。●



徐正灿 (So Jong Chan)，朝鲜对外经济部条约法规局局长

2018年朝鲜的外交新动向

中朝合作关系是在传统的中朝关系友好基础上持续发展的。两国的贸易一直维持着一定的水平，朝鲜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煤炭、电镀锌、工作机械、工业品、农产品、水产品等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有原油、加工产品、轮转印刷机等机械设备、电器电子产品、肥料，以及合成树脂等等工业产品。目前，中朝两国的企业在包括罗先在内的经济开发区正积极的推进相关经济贸易活动。朝鲜的劳动力也不断的涌入中国的市场。目前，两国经济贸易的合作正在形成非常良好的环境。

2018年3月、5月和6月，中朝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先后举办了三次首脑会谈。以此为契机，中朝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2018年初，中国政府向朝鲜提供了10万吨的肥料，也提供了磷肥相关的设备。这些项目在促进双方的经济合作，以及促进朝鲜的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不仅是中朝关系，2018年4月、5月和9月，朝韩之间也举办了历史性的首脑会谈，6月份在新加坡也举办了朝美首脑会谈，朝美会谈，还有朝韩之间的首脑会谈不仅促进了朝韩之间的合作与和解，也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随着友好气氛的形成，目前中朝之间或者中朝俄之间三边的协商正在积极的展开。这为中朝经济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中朝贸易交流，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018年4月份举办了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三次全会，朝鲜已经决定要集中精力推动经济建设。这是朝鲜新的战略路线。朝鲜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推动朝鲜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尤其是推动中朝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相关项目已经在积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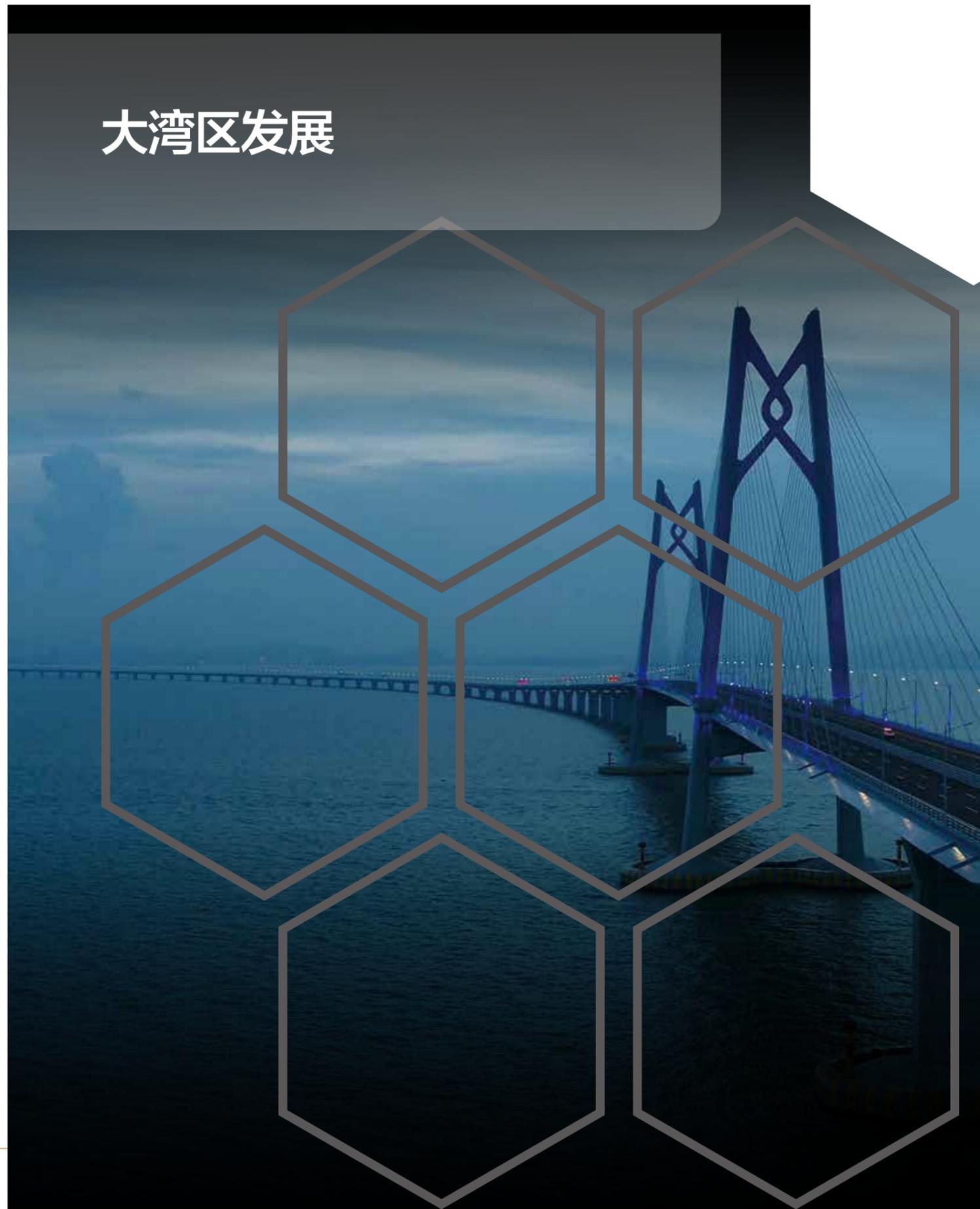
徐正灿 (So Jong Chan)

推进中。朝鲜将寻求多种的经济合作模式，并把这些模式付诸实践。

朝鲜在2013年5月份发布了《经济开发区法》，随后出台了16个相关的解释性法规。除了这些以外，有很多形式的观光开发区和顶端技术开发区正在积极推动，吸引外国的资金。

为了给外国资本投资提供便利，朝鲜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但是，在经济特区也有一些阻碍合作与发展的外部因素。朝鲜正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一些制裁。这些制裁可以说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绊脚石。尽管如此，朝鲜的对外关系仍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而且，朝鲜半岛的和平趋势已经出现了曙光。同时，中朝两国政府正坚定不移的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相信今后中朝的合作关系能够更上一层楼。我相信中国所积累的经验能给朝鲜带来很大的帮助和启示。朝鲜也会根据中国的经验寻找一条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

大湾区发展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的三方面思考

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蔡朝林指出，南沙将优先发展成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中心、卫生健康中心以及区域联动中心。



蔡朝林

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湾区经济中的地位与前景

与其他三个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空港、海港吞吐量很大。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方面增幅是7%，远超过其他几个湾区。经济总量在四个湾区居第三位。

但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在四个湾区里最低，只有2万亿美元多一点，旧金山湾区则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占比最低，只有60%左右，纽约湾区则达到89%左右。

与其他几个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突出的优势为：市场容量最大，产业体系最为完善。粤港澳大湾区覆盖11个城市，辐射广东和整个中国地区。庞大的市场潜力是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之所在。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成为世界最好的湾区，成为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几个城市之间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共有11个城市，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加上珠三角9个城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是四个是最重要的核心城市，可以看做1+3+7模式。香港是第一层次的，第二个层次是澳门、广州、深圳，第三层次是其他七个城市。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广州是广东省省会，传统的千年商都，现在的贸易中心。深圳现在异军突起，经济总量2017年超过广州，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经见到成效。据2018年公布的数据，广州在全球国际一流城市（GAWC）排27位，深圳第58位，香港和广州都属于一线城市（Alpha）。在金融指数这一项里，广州排第十九，香港第三，深圳第十。把香港、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做简单的比较，有几个数据特别接近，一个是经济总量，2017年大家都在2.1万亿到2.3万亿之间，香港最多，深圳赤字，广州第三。二是增长幅度，深圳、广州比香港快一点。三是空港和海港吞吐量。空港旅客吞吐量，到2018年底，香港是7千多万人次，广州7千万，深圳5千万；集装箱吞吐量深圳最强。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显著特点，是三雄并起，三箭齐发。

广州南沙就在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东边有香港、深圳、东莞，北边是广州、佛山，西侧是中山、江门、澳门，它在地理几何中心，区位优势非常独特；同时，政策优势也很独特，南沙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新区，国家级自贸区，广东三个自贸片区（前海、蛇口、南沙）。南沙自贸片区占地60平方公里，比其他两个片区加起来都要大，承担着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合作的使命。香港和深圳已经实现高度发达，但是土地发展的空间有限。整个南沙区有803平方公里，现在城市开发强度接近20%多一点，以60平方公里的自贸片区举例，约有38平方公里区域有待开发，这是庞大的资源。广州南沙正在优化人居环境、营商环境，交通、高端医疗教育资源，以及文化、体育、



娱乐设施等。随着广深港高铁开通，南沙到香港半小时到达，广州中心城区18、22号地铁预计2020年底通车，南沙与香港、深圳、东莞、广州中心城区、中山、珠海澳门等等，会形成半小时交通圈。

打造教育和医疗中心

最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将在南沙集聚——香港科技大学决定在南沙办校区，已经签了框架协议，预计明年上半年开工建设。另外还有一批最好的公立教育资源和国际学校，正在集聚南沙。医疗方面，广东最好的西医综合医院、中医综合医院、妇幼医院，专科医院都将落户南沙，包括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广州市妇幼、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山肿瘤医院、中山口腔医院，形成南沙良好的人居环境。

南沙正在打造最好的人居环境。南沙生态环境很好，PM2.5今年为27，水质经过两个月连续监测定为二类水，达到自来水饮用标准。同时，营商环境也在加强。南沙自贸区在全国改革创新具有标杆度作用。比如以企业注册为例，现在一天之内，可以把工商营业执照、税务发票等审批全部做完，三天之内所有涉及到营业前审批的事项必须完成，这些标准可以比肩全球最领先的国家。南沙有一群

干事创业的干部，大家勇于改革开放，敢于担当作为，还能吃苦耐劳。

三、大湾区建设的三个方面建议：通、同、统

通，指互联互通，建设一个优质的湾区，互联互通最重要。首先是交通互联互通，交通基础设施正在加快建设，2018年9月23日，广深港高铁开通是标志性事件。2018年10月，我们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女士探讨打通内湾区轨道交通，联系所有节点，与外面港珠澳大桥衔接，让互联互通体系更加完善。互联互通还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有序自由流动。现在，人流和物流便利度越来越高，资金流和信息流相对薄弱。

同，指协同发展。11个城市各有优势，各有特点，要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竞争是常态，但要有序竞争，最后协同发展。

统，指统筹规划。无论是东京、纽约还是旧金山三个湾区，城市之间的联盟或者说委员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粤港澳大湾区要发挥中央政府、省市各级政府的作用，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加速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应在人才、金融、科技三方面做重点工作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财长梁锦松认为大湾区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以及创新发展的决心，有望比肩纽约、旧金山和东京三大湾区。



梁锦松

2002年，我曾向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建议两项工程建设：1）推动从香港到澳门、珠海的新建大桥项目；2）建设从香港到广州的高铁，实现从香港CBD到广州CBD一小时出行。建议获得了董建华先生的肯定，并纳入他的市政报告里。2017年9月，港珠澳大桥开通了，促进了区域内人货各方面的流通。

湾区经济对全球经济非常重要，贡献了60%的GDP。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三个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都是有力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区域。

大湾区拥有9个广东省城市和两个特区，城市之间功能非常互补。其中，广州是华南地区领先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中心，在制造业方面是全球领先，可以称为全球最大的工厂，深圳是全国最有创新、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澳门拥有世界领先的娱乐和会议产业。香港得益于一国两制，香港拥有突出的税收优势：企业税为16.5%，中小型企业最近减为10%；个税平均税率为15%，境外的收入不征税，也没有资产增值税或遗产税。

中国已把粤港澳大湾区写入国家战略。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国家战略，并指出大湾区建设不只是推动经济发展，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一步，所以要充分认识这个重要性。

2018年8月，在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召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多次重复要严谨落实“一国两制”，反驳了部分舆论认为的大湾区建设可能降低“一国两制”的作用。同时，中央支持中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在香港建立中国科学院院属研究机构，明确指出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中央政治局常委牵头，明确建立大湾区国家级协调机制，以后协调会更快，更有效。

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数据：

- ※ 土地面积：粤港澳大湾区有5.6万平方公里，是东京湾区的大概1.5倍，是纽约湾区的近3倍。
- ※ 人口规模：粤港澳大湾区约拥有7千万人口，等于其他三个湾区加起来之和。
- ※ GDP增速：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三个湾区比还有一点距离，粤港澳大湾区的GDP是1.4万亿美元，与纽约湾区相近，东京湾区是1.8万亿。但粤港澳大湾区增速最快，很可能没过几年经济总量有望追上东京湾区，成为三个湾区里最大的。
- ※ 货物运量：粤港澳大湾区每年的集装箱数量为6500万TEU，远超其他三个湾区。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今后的发展，我认为应在人才、金融、科技三方面做重点工作。

人才

人才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因素。很多学者认为，以后国与国之间，或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其实是人才战。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国际人才比例较高，能达到40%以上。而大湾区的国际人才比例比较低，占比远低于5%。粤港澳



大湾区应该利用香港的优势，为吸引全球人才打造国际化、多元化的环境。香港只有700万人，市场较小；面积只有1千平方公里，而且山地居多，只有1/3的土地可用。但是粤港澳大湾区有市场和土地——光是广州南沙就已经拥有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占香港的80%，完全可以做到互补。

目前，中国老龄化非常严重。2017年，全中国17%的人超过60岁。随着人均寿命越来越长，收入也一直在增加，人民对好的医疗需求更大。但内地优质的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分布不均衡，医生和护士人均数较少：内地每一千人1.7个医生，香港是2.6个；内地每一千人有2.6个护士，香港是6.9个；而护工的缺口更大。我们可以向香港或者国际标准靠拢，用国际的培训、管理方法，结合国内最好的资源，给大湾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从而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落户大湾区。

改善生活环境也有利于让外国的人才落户。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香港融汇中西，拥有四所全球100名以内的大学，能吸引和培养人才。如果能让这些大学在大湾区设立分校，或者跟大湾区的高校合作，也能吸引很多国外的科学家落户大湾区，增强人才的实力。

金融

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而深圳与广州也一直在努力发展金融，要做到“错位互补”。国家现在杠杆率很高如何吸引

投资对大湾区很关键。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出台政策吸引国内外的风险投资（VC）和私募基金（PE），通过香港股票市场，让企业在香港上市，有利于吸引直接融资，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科技

深圳在科技方面已经非常先进了，但在生物科技领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生物科技是今后推动世界发展和人类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领域。目前美国走在最前面，第一个中心是波士顿，第二个是旧金山。我曾在2018年4月的时候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马兴瑞建议，利用南沙或者深港河套地区或者南沙，通过一线、二线的划分区域方法让此处成为中国的生物科技基地。比如香港的医生、病人、学者、科学家进入内地河套地区的一线但没有过二线区域的话，还是遵守香港的条例和规定。目前很多药物、用于实验的动物、人体的组织还不能进入中国，许多内地实验需要到香港完成，正常检疫程序很长。因此，可以在河套地区尝试建立生物科技特区，从而推动湾区生物科技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九个城市和两个特区结合起来，利用一国两制制度上的优势，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为世界领先水平的湾区经济，无论是吸引人才、发展金融，还是推动创新科技，都可以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Global Finance 20 (F20) Finance serves the world

国际金融论坛(IFF)

全球金融F20 · 金融服务世界

战略对话 · 交流合作 · 金融创新 · 全球智库 · 金融人才
Dialogue · Co-operation · Innovation · Think tank · Training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金融工作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邱亿通介绍广州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做法及特色，呼吁出台更多新政策，促进绿色、节能、环境友好型发展。



邱亿通

2017年6月份广州获批成为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在人民银行的工作指导下，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现在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理念和氛围已经日益形成，政策支持体系在不断完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初步建立，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探索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发展绿色金融的目的就是实现金融资源的绿色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绿色节能、环保的企业和项目。建立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的标准是重要的前提，因此从试验区获批之日开始，广州就高度重视绿色标准体系的建设，探索建立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认证标准。

同时，广州努力完善机制，提高绿色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广州在开展绿色金融试点工作中，始终坚持市场化的导向，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个前提下也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支持和鼓励探索商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个方面是建立激励引导机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也出台了绿色金融“1+4”政策。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也利用再贷款、再贴现的手段来支持扩大绿色信贷的投放。另一方面建立对非绿色项目发展的约束机制，就是激励跟约束机制并行。

此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实现创新升级，来匹配绿色项目的融资需求，广州积极探索，通过机构、制度、组织方式、市场模式、金融工具的创新来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各金融机构通过将支行升格为绿色分行或者设立

绿色金融事业部、绿色金融创新中心或者发行绿色金融债务，绿色保险产品；企业发行绿色企业债券，绿色中期票据；广州市里面也在探索发行绿色市场债券来支持一些绿色公益性的市政项目。股权中心也设立了绿色环保板块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创新绿色金融的产品和渠道。

防范风险，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对绿色金融也至关重要。广州积极构建绿色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加强绿色信贷的跟踪监测评估，建立区域性的绿色金融同业治理机制，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要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推动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工作，政府必须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第一、继续以体制机制创新作为重点，深化改革创新。继续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完善激励机制，制定统计指标体系，定期发布项目信息，来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产业。

第二、探索统一大湾区内绿色标准。广州将推动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探索形成大湾区绿色标准共识，并进一步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接国际的优势，来促进内地标准跟港澳、跟国际的共识接轨。

第三、推进大湾区资金和市场互联互通。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中心，澳门是对接葡语国家的重要平台，广州、深圳是境内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必须充分利用大湾区内两个市场优势，利用境内境外资金支持绿色发展，拓宽绿色项目的融资渠道。

第四、推动大湾区金融机构深化绿色金融合作，进一步完善绿色项目库和绿色金融融资对接系统项目，让项目信息向港澳地区的金融机构开放和共享，同时推动大湾区金融机构通过银行贷款合作形式，作为大湾区绿色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支持和融资服务。

同时广州也在积极探索设立创新型期货交易所，以生态产品、碳排放交易作为交易产品的新型期货交易所，利用期货交易这一金融工具来推动绿色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融合。

第五、加强大湾区绿色金融宣传交流合作，来增强大湾区绿色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广州将探索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加强大湾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和行业自律。●

不断发展的中国城市群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解读中国城市群迅速发展的深层原因，认为城市群会带来更便捷的交通，更成熟的产业链以及生产力的变革。

中国的经济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后，已经不再是以点带动整个面的阶段。大湾区在新兴城市化，城市化 2.0 战略里扮演的重要一环。¹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增长三个变量里，资本投入和劳动力贡献逐步下降。在供给侧改革中，除了大家已经看到的去杠杆、控产能、三去一降一补，很关键一点是进一步推动城市化——但是不是过去以点带面，依靠几个比较发达的超大都市，更多是依赖于城市群。

高铁在中国城市群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聚集和外溢是城市群的显著特征。城市群把卫星城市和中心城市连起来，互联互通后，有统一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的产业链。人与人之间见面、交流更方便，产生知识外溢效应。

2010 年是中国高铁的拐点，铁路网开始大幅度地铺开。在长三角地区，从无锡到上海仅需半个小时。以前，以上海、杭州单个超大都市带动经济发展；现在，逐步转变到卫星城市的经济转型比上海更快，和上海收入差距缩小。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铁互联互通比长三角落后，但从 2018 年 9 月底开始发力，十条城际铁路将于 2025 年前开通，包括深中通道，从互联互通角度，可以极大提高生产力。

中国五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京津冀城和成渝城市群，跟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典范比起来，比如

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有三个突出优势可进一步发挥：

人口基数大、密度高。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群是东京首都经济圈，但我国五个城市群平均每个人口为 1.1 亿，几乎是东京首都经济圈的三倍。人口多的好处是可以承纳更多产业链，吸纳更多工作模式和产业模式。中美贸易摩擦下，有人担心一些产业链的生产链条从中国搬走，

但如果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大的人口基数和密度去承受，工厂转移是很困难的。很多欧洲的跨国企业和投资者常问，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和共享经济如火如荼，比如说送外卖、共享汽车和单车在中国发展那么好？这是人口决定的。以英国为例，除了伦敦没有第二个城市适合发展共享经济，或者发展势头很弱。英国第二大城市是伯明翰，只有一百万人口。而大湾区的七个卫星城，人口从 250 万到 300 万不等，才能支撑起这种模式。

便捷高效的交通。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全高铁网，广深港高铁开通后，实现了一小时出行圈。从香港坐高铁到广州南站只需 47 分钟，相当于从洛杉矶到圣地亚哥。从香港的 CBD 去深圳的 CBD 福田，只需要不到半小时。在世界湾区城市里，两个相邻且体量这么大的城市，从 CBD 到 CBD 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并不多见。随着 5G 网络进一步发展，将来有更好人脸识别技术，不需要通过小小闸门慢慢排队，可以有更大的快速空间。



邢自强

灵活的政策主动辅助城市群发展。中国已出台许多政策，比如分化户籍、就业、社保政策加快城市群发展。接下来，国家还要进一步开放中小城市户籍制度、公共资源、医疗、教育等配套设施向中小城市倾斜。北京的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上海的人口已经停滞不增长，周边三四线卫星城年均增长率 1.5% 以上。

灵活的政策可以带动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显然是最有优势的，产业链更有协调性。粤港澳大湾区有高端制造业领先的广州、东莞、佛山、顺德；有全球可以排上号的 IT 创新城市深圳；有金融业发达的香港和深圳；有娱乐业发达的珠海和澳门，产业链聚集和配合是少有的，整个区域的航运在全世界也比较领先。

资本市场的协同现在在大湾区逐渐具备雏形。香港对初创企业、科技类和生物类企业敞开大门，最近很多湾区优秀的企业在香港上市。整个中国三分之二的专利申请来自广东，许多民营企业自主进行专利申请、研发创新。如果能进一步发挥香港在法制、仲裁、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加强对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保护力度，对外进一步吸引外资进来，对内进一步保护民营企业创新积极性。

粤港澳大湾区潜力非常大，但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借鉴香港的创新优势，扩大开放的力度。鉴于本地拥有的优势和潜在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预计到 2030 年大湾区的人口可以高达 8800 万，GDP 规模上升接近 4 万亿美元。如果单独跟国家比，这将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超过英国，人均 GDP 达到 4.5 万美元左右。这些都是基于目前对湾区的优势和国家城市化 2.0 战略发展，以及广东进一步打造改革开放高地的判断。●



1. 中央人民政府网，2014 年 3 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https://bit.ly/2S0b0R5>

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罗兰贝格亚洲区联席主席戴璞（Denis Depoux）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欧盟制造业设施的成功模式，但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区域发展计划，释放技术创新的潜能，打造世界级的大湾区。

大湾区当下的任务是要促进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非易事，障碍重重，不仅要有政策支持，要有计划。但如果成功实现，则可以促进自由市场在不同区域间分配资源。

大湾区的不同区域，乃至同一区域间的城市，都会存在竞争问题：每一座城市都想获得最好的资源，但是有了最好的资源并不意味着具备整合分配资源的能力，因此前期规划协调非常重要。大湾区要让企业，无论国营私营，自由配置资本，结构重组，更好地分配资源，并加强发挥互补优势。

大湾区的另一大挑战就是大量结构重组及制造业转型。比如，深圳和广州都有制造业，它们都要向先进制造业整合，促进科技创新，去除一些重复的部分，转化为互补优势。

欧洲其实没有湾区，但拥有三角洲经济。莱茵河三角洲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莱茵河三角洲的主要构成国家是荷兰和德国，涵盖了鹿特丹、阿纳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等城市。

莱茵河三角洲产业非常丰富，有汽车、化学品供应链、以及服务于先进制造业的工业和服务业，包括光学、电子和半导体制造。该区域成为德国实力的核心，为德国创造了大部分的贸易顺差。

莱茵河三角洲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部分要归功于前期协调工作和政府支持，但是主要由旗舰性公司和各类企业所推动。比如，在整个莱茵河流域，德国的化工企业都享有很好的配套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和物流设施服务于该行业的出口业务。

另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案例同样发生在德国，即两德统一。统一后，整合生产制造资源任务艰巨。简而言之，就是要把德国原有的优势，和中东欧经济体的低成本及转型优势结合起来，统一后资本集中流向建筑行业，德国的振兴计划让柏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

来自欧盟以外的经验

广东的制造业亟待升级，利用转型是协调实现整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方法。在莱茵河三角洲的案例中，德国联邦法



戴璞（Denis Depoux）

规在荷兰和德国一体化中发挥了有效作用，欧盟内部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推动力。这都非常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学习。

总结起来，一体化的成功有五个要素：

首先，要有政治上的领导力和决策力，并且要确保决策一致。这一点就已经很难实现，因为湾区建设时间跨度非常大。但中国的优势在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能会减少这一方面的负面影响。

第二，发挥工业和社会互补优势。实现资源的配置最好的方式就是市场力量。过于依赖规划得不偿失，只会造成计划冗余。

第三，需求池。大湾区的关键资产就是北部巨大的需求池。毋庸置疑，尽管国际贸易发展疲软，这里出口潜力依然很大；出口和当地市场的需求，正是这两点使得上文提到的欧洲区域实现长期发展。

第四，区位优势。我们要通过基建投资、金融、教育等资源，把自身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起来，还要结合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上海就是如此，通过各种方式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生活品质，成为吸引外资的一大亮点。

第五，全要素生产力。这是衡量创新的重要指标，也是促进转型的关键因素；同样，还要有投资、固定资产、基建等各方面的积累。

欧洲一体化的成功案例虽不能照搬，但确实有一定借鉴意义。要善用政策和计划把各个区位优势连接起来，实现经济转型，制造业升级，才能在建设大湾区上取得成功，发挥互联互通的优势。●

走向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海拥抱世界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孙时联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肩负重任，未来有望打造成一个集科技湾区、金融湾区以及产业湾区于一体的综合湾区，成为超过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及日本东京湾区等世界上其他三个湾区的全球第一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世界三大湾区功能的综合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2018年8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对此，国际金融论坛副主席、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表示深受鼓舞，对香港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很有信心。

粤港澳大湾区将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扮演引领作用。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支持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或缺，其中很关键一点就是充分发挥聚集效应和外溢效应的城市群战略。与国际相比，中国的城市群发展具有“大、快、活”三大优势。“大”是指人口规模大，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高人口密度有望给产业布局、劳动力市场和服务业扩张提供充裕空间。“快”是指互联互通快，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全的高铁网。“活”是指政府支持政策灵活，允许差异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聚合效应少有，在中国主要城市群中最具优势，有望打造成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

“粤港澳大湾区的功能将是世界其他三大湾区功能的综合”，梁锦松谈到。湾区经济非常重要，全球约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目前，世界知名的有三大湾区，它们分别是：以现代金融为核心的纽约湾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旧金山湾区和以现代制造为核心的东京湾区。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蔡朝林谈到，“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市场容量最大，产业体系最为完善”。粤港澳地区有



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基地，它们分布于多个珠三角城市，IT创新（深圳）、金融（香港、深圳、广州）、专业服务（香港）、休闲娱乐（澳门和珠海），以及航运（整个区域）。梁锦松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城市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功能应该是三大湾区的综合，有望打造成一个集科技湾区、金融湾区以及产业湾区于一体的综合湾区。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赵晓斌说，制造业是中国的命门，当前中国面临现代制造业的升级转型，粤港澳大湾区的首要战略定位应是制造业，其次才是支持创新和增长的科技、金融。

“到2030年大湾区人口有望达8800万，GDP规模或上升至近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湾区。”邢自强预计。

粤港澳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创新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纵观全球主要湾区的发展，金融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引擎作用。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以金融为纽带，分别形成了“金融+服务”、“金融+科技”、“金融+产业”为特色的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和发展模式。亚洲金融智库《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指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空

间分布已经逐步从香港的一城独秀发展到以香港、深圳和广州为核心集聚区的“中心+外围”结构。梁锦松说，需要思考香港、深圳、广州在金融方面如何错位互补。

投资银行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融通资金需求、促进资本形成、推动企业并购、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科技创新、引导风险管理等作用。对标国际一流投资银行，我国投资银行处于发展初级阶段，资产规模偏小，业务模式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创造价值能力不足，缺乏复杂的、专业的资产配置能力，没有实现基于核心能力的差异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内地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连接的关键区域，以及其独有的“一国两制”的三套监管体系的发展环境，为中国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投资银行能力建设，在金融业态发展程度多样化的多层次结构中，加强投资银行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少波建议，粤港澳大湾区要着力打造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风投创投中心，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并且，要顺应越来越强烈的财富管理需求，着力打造全球的财富管理中心；把握金融科技趋势，着力打造金融科技中心；着力打造金融监管合作和不同监管体系融合的试验区。

“人民币国际化必将是粤港澳大湾区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枢纽的一个核心内容。”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周诚君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具有优势，香港已经有了全球最好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基础设施，广东的相关基础设施也需相应配合跟上。

在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天然优势，可以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金融服务基地。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罗扬说，广东是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拥有大量优质高端的科技制造业企业，可借助在行业内深耕多年的专业化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产业投资人的作用。香港作为资本市场资金量巨大、金融服务功能全面的地区，是能够扮演“一带一路”大型项目金融媒介服务和资金池的角色。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沟通和合作的桥梁，有利于资金方更好地了解来自葡语国家的项目，也能够一定程度上为项目提供征信支持。

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王沅认为，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要促进可持续融资，注重绿色金融。要尽可能地让企业和市场主体在“一带一路”的每一笔投资都是贯彻 ESG 原则的，即是尊重环境的、讲社会责任的、基于良好公司治理的。要提高透明度，如果对哪个项目进行融资，要向世界银行一样用国际竞争性投标的方式来承保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关键在于互联互通

欧洲区域经济整合有五个经验：领导力强、决策一致、产业互补、市场配置资源、持续扩大的内外部需求。罗兰贝格亚洲区联席主席戴璞（Denis Depoux）说，从欧洲的角度看，区域经济整合是不容易的，有很多的障碍，不仅要有政策上的支持，要有计划，还要有运气，还需要市场的自由力量，也要在不同的区域内有分工。莱茵河三角洲的成功，不仅有协调的发展，而且还有企业的驱动力，背后也有政府的支持，但是主要由大的旗舰公司和企业所推动。东德和西德的整合成功，有政府的积极参与，有很好的规划，当然也要促进自由市场发挥作用，而且要进行非常痛苦的重组工作。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处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背景下，如何最大限度地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效便捷融通，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关键。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院长陆军谈到，大湾区已经讲了好几年，现在应该进一步加快，让湾区互联互通，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胆子还不够大。要踏踏实实进一步推进大湾区之间的互联互通，深耕细作，为大湾区内部的深度融合创造条件。

蔡朝林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解决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统筹规划三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互联互通。现在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建设，2018年9月广深港高铁开通，不过这还远远不够。而且，互联互通绝不仅仅是交通基础设施，其核心和关键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如何有序自由流动。从便利度看，现在人流、物流便利度越来越高，资金流还不够，信息流最薄弱。其次是协同发展。11个城市各有优势、各有特点，怎样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又有序竞争。三是统筹规划。需要发挥中央政府、省市各级政府的作用，拧成一股绳，加速发展。

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也谈到，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中最重要的是香港、深圳和广州，三个城市经济规模不相上下，需要使他们形成一种合作的力量，而不是一种竞争的、排斥的力量。

此外，梁锦松还提出，大湾区发展需重视引进全球人才。全球三大湾区，除东京湾区外，其他两个湾区的国际人才比例都很高。需要思考如何改善生活环境，让来自全球的人才能够落户。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原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尼古拉斯·霍普（Nicolas Hope）对此表示赞同。“为什么硅谷、波士顿等地区蓬勃发展，第一是人才”，霍普主任强调。●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联合出版方

CENTRAL BANKING

国际金融论坛（IFF）中国报告



国际金融论坛（IFF）自2015年起，每年联合英国《中央银行》杂志共同发布中英文双语《IFF中国报告》(The IFF China Report)。

报告通过专题研究、专家访谈和约稿、案例分析等形式，对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领域的重大或争议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深度讨论及总结，并为国家决策层和国际观察界提供独立、客观、务实的政策分析与建议。

2015-2019

北京·广州·上海·香港·华盛顿·伦敦

全球发布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是总部设在中国北京的、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
2003 年 10 月由中国、美国、欧盟、联合国等 20 多个国家、地区及相关
国际组织的领袖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
研究机构。作为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合作及战略智库平台，
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 (Finance 20)”。

联合出版方

**CENTRAL
BANKING**